
蘇軾研究

2015年第2期（总第41期）

（季刊）

卷首语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其一）

苏轼出生于耕读人家，他描写农村的诗文令人醉。他写稻田：“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垂珠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垅间，蚱蜢如风雨。”他写麦熟春耕：“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滋露酣娇黄。汪汪春泥已没膝，剗剗秋谷初分秧。”他常以农夫自称：“余本田家”、“我是识字耕田夫”、“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中说：“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躬耕陇亩虽是无奈之举，却给苏轼带来了许多快乐，是他在苦难岁月中的生活保障，更是他坎坷人生中的点点星光。

在本期杂志中，颜正源的《田舍翁苏东坡考论》、李常生《苏轼买地考》、郑秉谦《谈苏轼贬逐期中的“回归民间”》等均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苏轼生命中关于归田、躬耕、归隐等主题，相信读者能从中得到启发。

蘇軾

研究 SUSHI YANJIU

2015年第2期（总第41期）

（季刊）

- 编辑出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
《苏轼研究》编辑部
- 委印单位：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 主管单位：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
- 主 编：张志烈
- 副 主 编：宋明刚 方永江
- 责任编辑：刘清泉
- 编 辑：袁 丁
- 编 务：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12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h.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第 03—006 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华信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 年 6 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目 录

□苏学论坛

- 苏东坡的花木情怀（二） 王影聪 / 4
- 田舍翁苏东坡考论 颜正源 / 8
- 苏轼买地考 李常生 / 17
- 谈苏轼贬逐期中的“回归民间” 郑秉谦 / 23
- 飞鸿 孤鸿 归鸿 张学松 / 27
- 由“鸿”意象看苏轼流寓心态变迁
- 苏轼在密州的儒释道情结初探 王琳祥 / 29
- 风流文采磨不尽 许植基 / 36
- 苏轼和王诜
- 苏东坡与章子厚的交情 葛祥邻 / 41
- 古代朝鲜文人拟次苏轼辞赋论析 杨昊 / 45
- 论苏轼小史高俅 邹同庆 / 53
- 习近平用典青睐苏东坡 涂普生 / 57

□顾问：李 静 宋朝华 王影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乃昌
刘尚荣 苏 灿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永江 木 斋 王友胜
王希龙 王晋川 刘川眉
刘清泉 孙开中 李景新
冷成金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陈 弼
宋明刚 周裕锴 胡先酉
涂普生 康 震 韩国强
赖正和 蔡心华 熊朝东
潘殊闲

□诗文鉴赏

读《东坡志林》(八)

徐 康/60

□研究史话

[韩] 洪瑀钦/74

□新书评介

永远的苏东坡

张志烈/64

熊朝东/76

——《寻访东坡踪迹》序

中国文化的大雅之音

王书华/68

□苏学专家

宋明刚倾情三苏文化

熊朝东/76

□本期关注

采访徐新民侧记

陆明德/69

刘清泉/78

一样的东坡,不同的视角

冯 扬/72

——《华夏地理》专题推介苏东坡

□苏学动态

台湾李常生眉山寻访记

苏学文/80

黄冈来眉考察研形结合的“眉山模式”

流 水/80

心香一瓣祭三苏

熊 莉/80

苏东坡的花木情怀（二）

王影聪

内容提要 本文以苏东坡吟咏竹、梅花、松、荷花、牡丹、橘橙、兰花、柳桃梨李等诗文为例，分类分析、揭示苏东坡的花木情怀和独特风韵。

关键词 苏东坡 花木 情怀

五、咏牡丹以喻华贵并寄情赠友

苏东坡喜爱百花，见花即咏，抒发情怀，尤其是在月下花前，他和朋友一起赏月观花，开怀畅饮，手舞足蹈，头上插花，欢歌吟诵，好不快乐！他很喜爱牡丹的华贵，这国色天香的牡丹，在他眼中十分华贵，花形大而美，花色多而艳，无愧花王、花魁，堪称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之国花。唐代以来，诗仙李白和白居易等吟咏牡丹已闻名遐迩，像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白居易的“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历代文人墨客都喜咏、喜画牡丹。苏东坡也不例外，吟咏牡丹的诗文不少，并有专门的论说。他在熙宁五年杭州通判任上，随从太守在吉祥寺观赏牡丹，不仅吟诗咏花，还应太守沈公之约写出了《牡丹记叙》一文。该文纪实咏花，回味悠长，是千古文宗难得的记牡丹的奇文美文，载于《苏东坡全集》，卷五十七。现录于下：

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盘彩篮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记》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见于传记与栽植培养剥治之方，古今咏歌诗赋，下至怪奇小说皆在。余既观光之极盛，与州人共游之乐，又得观此书之精究博备，以为三者皆可纪，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

盖此花见重于世三百余年，穷妖极丽，以擅天下之观美，而近岁尤复变态百出，务为新奇以追逐时好者，不可胜纪。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憇迂阔，举世莫与为比，则其于此书。无乃皆非其人乎。

然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石心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今以余观之，凡托于椎陋以眩世者，又岂足信哉！余虽非其人，强为公纪之。公家书三万卷，〔1〕1051博览强记，遇事成书，非独牡丹也。

在这篇美文中，苏东坡不仅写下了随太守沈公在吉祥寺观牡丹的盛况，记叙了沈公编纂的《牡丹记》一书问世，借牡丹以颂扬这位元老重臣的厚德和风范。既歌颂吟咏了牡丹的华贵，为万人欣赏，又颂扬了先贤友人的品德，情深意长，实为难得的咏颂牡丹的美文佳作。可惜如今的出版物中，几乎无人提及这篇名作。其实，苏东坡还写过一篇《芍药与牡丹》，不过是残篇，未全文传世，仅有不足百字留传：

吕稚卿言，芍药不及牡丹者，以重耳戴芍药一枝，比牡丹三四花间犹当着数品，盖有其地而无其花，譬如荔枝之温柑也耶！〔1〕3411

这篇残文比较了芍药与牡丹的优劣。当然，牡丹是国花、花王，而芍药是花相，在花的华贵、花的色彩和花的形状不及牡丹。然而芍药也有自己的优点，也令人神往。苏东坡说好比吃荔枝和橘柑一样，味道不同，各有千秋。也充满了辩证思想。

不过苏东坡观赏牡丹时，心情各异，常观花时吟咏诗篇，以寄情赠友！

他传世的最早的咏牡丹诗是他在凤翔任签判时写的《次韵子由岐下诗并引》组诗21首，前面加上了一个引叙。记叙了他在岐下一亭前池边咏吟花木三十余株（种），又记“又以斗酒易牡丹一从于亭之北”，其吟《牡丹》诗云：

花好长患稀，花多信佳否。
未有四十枝，枝枝大如斗。〔1〕67

这是他第一首问世的牡丹诗，可见其他的惊奇，并将这景这形这花的感受给了兄弟子由。此后，苏东坡又在各地供职时，见了不同颜色，不同季节时盛开或将谢世的牡丹，也吟了不少诗以寄情、以赠友！如《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大年》、《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韵，复次一首送赴阙》、《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道》、《同状元行

老学士秉道先辈游太平寺净土院牡丹中有淡黄一朵特奇为作》、《常州太平寺观牡丹》等。在苏东坡的赏牡丹诗中，都是佳作，许多诗句朗朗上口，颇有韵味。像“霏霏雨露作清妍，烁烁明灯照欲然”，“天葩尚青萼，国色待华颠”，“牡丹松桧一时栽，付与春风自在开”，“一朵淡黄微拂掠，鞋红、魏紫不须看”，“丹青欲写倾城色”，“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他吟黑牡丹时吟“花心起墨晕，春色散毫端”，“独有狂居士，求为黑牡丹。兼书平子赋”，把画牡丹的神韵变成了吟牡丹的实景。他吟《堂后白牡丹》更有韵意：

城西千叶岂不好，笑舞春风醉脸丹。
何似后堂冰玉洁，游蜂非意不相干。^{〔1〕352}

在苏东坡眼中的牡丹都留下了诗篇，至少不下于20多首，都是让人回味无穷的诗句。同时，他还在密州时，写了一首《雨中花慢》的词以吟咏牡丹。并写了一段引言：

初至密州，以累年旱蝗，斋素累月。方春，牡丹盛开，遂不获一赏。至九月，忽开千叶一朵。雨中特为置酒，遂作。

今岁花时深院，尽日东风，荡扬茶烟。但有绿苔芳草，柳絮榆钱。闻道城西，长廊古寺，甲第名园。有国艳带酒，天香染袂，为我留连。

清明过了，残红无处，对此泪洒尊前。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暇余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态，付与明年。^{〔1〕1151}

读罢该词，不由自主地赞叹这首词乃咏吟牡丹的千古绝唱！这是咏秋牡丹，还有苏东坡咏的冬牡丹一首《雪后》，便欲与同僚寻春，一病弥月，杂花都尽，独牡丹在尔，刘景文左藏和顺懒黎诗见赠，次韵答之：

残花怨久病，剩雨泣余妍。
不见双旌出，空令九陌迁。
知君苦寂寞，妙语嚼芳鲜。
浅紫从争发，浮红任蚤蔫。
天葩尚青萼，国色待华颠。
载酒邀诗将，臞儒不是仙。^{〔1〕788}

性情中的苏东坡，咏吟牡丹真是绝了，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心情，不同的眼光，把这国色天香的牡丹情怀，一往情深地留给了后人细细品味，妙哉！

六、咏海棠等花以思乡并述超然情怀

苏东坡喜咏花妍，千姿百态，不仅咏牡丹，还吟了他同样喜爱的芍药，他有咏《芍药》诗：“倚竹佳人翠袖长，天寒犹著薄罗裳。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时世妆。”其实牡丹也叫木芍药，所以，

他又时常把牡丹和芍药一块来吟咏！“杂花狼藉占春余，芍药开时扫地无。两寺妆成宝璎珞，一枝争看玉盘盂”、“应笑春风木芍药，丰肌弱骨要人医”、“芍药樱花两斗新”、“殷勤木芍药，独自殿余春”等。不过，苏东坡对芍药的吟咏虽有但不多。而他看重的花木中，其海棠的地位在他心中重于芍药。他吟“海棠真一梦”，这梦自何方？这是苏东坡梦到家乡。因为家乡就有“海棠香国”之称。苏东坡在“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先暂居定惠院，忽然有一天，他发现在寓所东边的山坡上有一株海棠花，兴奋不已，特写诗记叙这个事情并作了长诗以怀乡抒情！这就是他的《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一诗：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
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
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
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
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遙自扪腹。
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
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
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鵠。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1〕499}

这首七言长诗是苏东坡少有的，长28句，充分表达了他的爱海棠、思家乡的感人情怀。清代才子纪晓岚是这样评价该作的：

初白未读前半，觉似《海棠曲》矣，妙在先生‘食饱’一转。此种诗境，从少陵《乐游园》得来，同其神理，而化其畛畦，故为绝作。”纪晓岚又评价苏东坡“纯以海棠自寓，风姿高秀，兴象微深，后半尤烟波跌荡。此种真非东坡不能，东坡非一时兴到亦不能。^{〔1〕500}（诗注）

这就是说，苏东坡的超然情怀和性情中人之本性，有机融合于一身，见到杂草中的一枝独秀，见到家乡特别的海棠一株，他可即兴而吟，即兴而作长诗咏怀，非东坡莫属！在该诗的前半部分，他吟咏了海棠花开在何处，为何在此处？后半部分是他的心情与思乡情怀！他在思考，家乡的海棠为何会在此？当地人又不看好这一家乡名花？而且这种花不易，千里移栽，是何到此？哦！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是鸿鵠衔来海棠种子，落户黄州。似乎是特意来迎陪我这位西蜀乡友的，看来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样的乡友，同样的命运。不过虽如此，但我们都都要大放异彩，珍爱时光，把美好的人生留给黄州，留给人间！

不仅如此，苏东坡在黄州还专门作咏颂海棠一词一诗，以赞美之。以至在后来还专门托亲友从家乡移来三株海棠种植在阳羡（今江苏宜兴）他的家园之中。时隔近千年，如今宜兴的“天远堂”中，这株千年海棠枝繁茂盛，当地人称有这株海棠的园子的苏府“海棠园”。可见苏东坡与海棠之情怀！

在品味苏东坡咏吟海棠的一词一诗，足以见证他的海棠情怀。词乃《诉衷情·海棠》：

海棠珠缀一重重。清晓近帘栊。胭脂谁与匀淡，偏向脸边浓。看叶嫩，惜花红。意无穷。如花似叶，岁岁年年，共占春风。^{〔1〕 1167}

苏东坡上半片咏海棠外在体态秀美，下半片咏海棠的内在淳美。尽情抒发他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高雅品格和情怀，这种超然情感至今让我读之回味无穷。再看他的另一首《海棠》诗：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1〕 567}

诵读该诗，朗朗上口，嫣然动人，语言浅显却意境幽远。“东风”、“崇光”、“香雾”、“高烛”、“红妆”等明丽的意象中，给我们展示一株夜间海棠的秀美华丽的姿身，以及东坡对它的特别钟爱，夜深人静之时，他还捧着红烛，仔细观赏，反复品味，悠然吟咏，可以感受、想象到苏东坡当时的达观、潇洒的情怀！

此后，苏东坡也时常有咏吟记颂海棠的诗句，像“柯柳海棠吾有诗”、“卧开桃李为谁妍”、“卧闻海棠花”、“海棠真一梦”等等，充分展示了他对海棠、对家乡、对人生的一往深情！

七、咏橘橙、菊花、幽兰以抒天姿高洁之情怀

苏东坡与友交往，犹以诗会友，以诗词相赠，许多诗词的吟咏又即兴咏花咏木乃至所见植物以抒怀寄情。我尤其欣赏他的诗《赠刘景文》，以四句诗咏好几种花木，鼓励朋友，堪为绝妙佳作：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1〕 807}

苏东坡咏橙黄橘绿，咏了荷花和菊花不在时，唯橙黄橘绿到了丰收时节。望刘景文在家丧六口人之时，要树立信心，人生有难有困惑，但前景是美好的，活着的人总要生活下去，总要给已故家人以安息九泉顽强地活下去并生活得好，总会走出困境，获得新的硕果与希望！

其实苏东坡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困难之时，总是旷达超然。他喜欢咏橘，他写过一篇百字文说《楚颂帖》，实为咏橘的品性：

吾来阳羡（宜兴），船入荆溪，意思豁然。
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王逸少云：“我卒当以乐死。”殆非虚言。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

橘栽至易得。暇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书。^{〔1〕 3287}

这篇仅有 105 字的小品文，是苏东坡从黄州去汝州途中，而避居住靠近京师，到了常州阳羡（今宜兴）时所作。他共引用了王羲之的一句“我终将快乐而死”的名言，又提及他会嫁接果树，想在阳羡买一小园，种上柑橘，并建一亭子，并取名“楚颂”，将屈原的“橘颂”之情留在此间。表明自己也有屈原颂橘“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和“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的可贵精神。也就是在此时此地，他还吟颂橘有浣溪沙词二首：

其一，《浣溪沙·咏橘》：

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
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1〕 1172}

其二，《浣溪沙·端午》：

几共查梨到雪霜。一经题品便生光。木奴何处避雌黄。
北客有来初未识，南金无价喜新尝。含滋嚼句齿牙香。^{〔2〕 705}

这两首同韵同词牌的咏橘词，是苏东坡的有感而发，也附和了他的《楚颂帖》，写出了他对橘的喜爱和神往，表现了他在阳羡买田、种橘，将此地作为自己安生之地，视作故乡的情怀！在他诗词中，还有不少吟橘柑的佳句：“藤梢橘刺元无路”、

“朱柑绿橘半甜时”、“金橙纵复里人知”、“俯仰随人如橘槔”、“野橘香清未过淮”、“卢橘杨梅尚待酸”等，使苏东坡对这一水果的情有独钟的表白充分尽情。“秋风吹梦过淮水，想见橘柚垂空庭”、“西风初作十分凉，喜见新橙透甲香”、“诏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怀中双橘红”、“手香新喜绿橙槎”。

苏东坡也咏菊，并且写了好几篇关于菊的文章。他在密州时，写了《后杞菊赋并叙》；在汴梁写过《菊说》；在海南儋州还写了《记海南菊》。同时，在苏东坡的诗词中，咏菊的句子颇多。有时候也同咏其它花木时作为帮衬，或作为比较，佳句不少。苏东坡咏菊诗句中有“菊花人貌自年年”、“髻重不嫌黄菊满”、“觉来已茫昧，但记说秋菊”、“野菊生秋涧，芳心空自知”、“菊衰蛩亦蛰，与汝岁相期”、“殷勤理黄菊，未遣没蓬蒿”、“湖边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争煌煌”、“细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人竞春兰和笑菊，天教明月伴长庚”、“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临行挽衫袖，更赏折残菊”、“独依古寺种秋菊，要伴骚人餐落英”、“遥知重阳酒，白羽落黄菊”、“金罍浮菊催开宴，红蕊将春待人笑”、“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黄菊为谁开”等等。

还吟有《寒菊》诗：“轻肌弱骨散幽葩，真是青裙两髻丫。便有佳名配黄菊，应绿霜后苦夫花。”^{〔1〕}
¹⁰⁹⁸苏东坡还将菊花仔细分析，考证它的季节及生长与开花等。像《菊说》一文所记“而菊有黄花，尤不失毫厘。近时却下菊品至多，皆智者以他草接成，尤不失毫厘。近时上菊品至多，皆智者以他草接成，不复与时节相应。始八月，尽十月，菊不绝于市，亦可怪也。”^{〔1〕}³⁴⁰³再有《记海南菊》：

菊黄中之色香味和正，花叶根实，皆长生药也。北方随秋之早晚，大略至菊有黄花乃开。独岭南不然，至冬乃盛发。岭南地暖，百卉造作无时，而菊独后开。考其理，菊性介烈，不与百卉并盛衰，须霜降乃发，而岭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洁如此，宜其通仙灵也。吾在海南，艺菊九畹，以十一月望，与客汎菊作重九，书此为记。^{〔1〕}³⁴⁰⁵

这就是苏东坡对菊的考证和情怀。不仅如此，他在密州时，还有一段食杞菊的故事，并专门记下了这一故事，题为《后杞菊赋并叙》：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不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谬。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1〕}¹¹⁸⁷

这个故事，记叙的是身为密州太守的苏东坡缺食到了何种地步，与通判一起，每日到旧城墙废弃的园圃寻食杞菊。开始并不相信唐代陆龟蒙（天随子）写的《杞菊赋》之事是真的，以为是唐人作秀。后在密州，饱受饥饿之苦，以杞菊为充饥之物，故而信之，所以写了唐人陆龟蒙《杞菊赋》的续篇，称之为《后杞菊赋》。以此咏怀大自然的恩赐，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你在此能否感觉到苏东坡在密州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气势是空着肚子，吃过杞菊而为、而作的吗？这就是性情中人的苏东坡！

不仅如此，苏东坡还吟咏兰花、兰草以喻高洁。以兰的高洁咏吟诗词赠友、赞友，或以诗咏抒怀，珍视人生。如“手栽兰与菊，侑我清宴终。”他的《浣溪沙》一词写的妙，并在词前还加了一引：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1〕}¹¹⁷⁰

再有《点绛唇》：

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江村海甸。总作空花观。尚想横汾，兰菊纷相半。楼船远。白云飞乱。空有年年雁。^{〔1〕}¹¹⁶⁶

苏东坡的咏兰情怀还与友人题画比较中以深表，他在给杨次公这位朋友题赠诗二首中意韵深长：

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

时闻风露香，蓬艾深不见。

丹青写真色，欲补《离骚传》。

对之如灵均，冠佩不敢燕。

——《题杨次公春兰》^{〔2〕}³⁵⁰

蕙本兰之族，依然臭味同。

曾为水仙佩，相识《楚辞》中。

幻色虽非实，真香亦竞空。

云何起微馥，鼻观已先通。

——《题杨公蕙》^{〔2〕}³⁵¹

这就是他的兰花情怀，他眼中的兰花是高洁幽香的，正所谓：“人竞春兰笑秋菊，天教明月伴长庚”，“幽兰空觉香风在，宿草何曾泪叶干”，“菊有芳兮兰有秀”，“明朝端午浴芳兰”等。

注释

〔1〕 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2〕 苏轼：《苏东坡全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

（王影聪，眉山市政协主席、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田舍翁苏东坡考论

颜正源

内容提要 苏东坡为田舍翁，有贬谪、退隐、终老三型。在黄州、阳羡、常州的生活状况各异。作为田舍翁，有农夫思想出现，并烙有陶渊明、先秦农家的印记。

关键词 苏东坡 田舍翁 生活状况 农夫思想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说：“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的确，有重要的遗漏——苏东坡自称的“田舍翁”这一角色。苏东坡在《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一》中说：“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田舍翁”一词出自《宋书·高祖纪》：“大明中，坏上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凯盛称上俭素之德，孝武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以为过矣。’”宋孝武帝刘骏自称“田舍翁”非实指也，乃类比之谦称。苏东坡借此语典，说出了真相——一个有田地有房舍的老翁。苏东坡曾说“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虽为搢绅，奉养犹农夫。”（《跋李伯时卜居图》）还说：“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题渊明诗二首》）“田家、农夫、世农”皆指农民也。“田舍翁”者，老农民也。

一、苏东坡一生三次为田舍翁

苏东坡一生三次为田舍翁，时间有长有短，性

质也有差异。

第一次可以称为贬谪型田舍翁。时间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到元丰七年（1084），苏东坡从45岁到49岁，长达五年。

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罪名乃其所创作之诗歌“显涉讥讽”“谤讪君上”，陷入一百余天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至同年十二月底才开释，以“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之名义来到黄州。“员外郎”在宋代乃贬谪之官也。“团练副使”，从八品，俸禄微薄，难以维生。“不得签书公事”，乃一闲官也。“本州安置”，还受到监管，失去自由，实为软禁也。为了二十余口家小的生计，不得不躬耕东坡，充当起田舍翁来了。

第二次可以称为退隐型田舍翁。时间在元丰八年（1085）五、六月间。苏东坡已五十岁矣。

据南宋周必大《题楚颂帖》云：“公以元丰七年，量移汝海，九月间抵宜兴。闻真通观侧郭知训宅，即公所馆。自此过泗，遇岁除。八年正月道中，上书乞归常。三月六日至南京，被旨从所请，回次维扬，又归宜兴。《留题竹西三绝》，盖五月一日也。”诗中有“此去真为田舍翁”句，可推测苏东坡以为五年黄州田舍郎的生涯，乃不真，即伪也、假也，无可奈何之选择也。而卜居常州，乃平生所愿。他在《乞常州居住表》中说：“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餧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又《到常州谢表二首·一》云：“已分没身，寄残骸于魑魅；敢期择地，收暮景于桑榆……念此菅蒯之微，庶几簪履之旧。俾安田亩，稍出缧囚。饱食无思，但日陶于新化；杜门自省，当益念于往愆。”在皇帝面前，还有一种“杜门自省”的惭悔，但“敢期择地”，却是委婉中藏有躬耕田亩、终老常州的强烈愿望与决心。所以他在《楚颂帖》中说：“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慨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但是，天不遂人愿啊，神宗一

死，政局大变。苏东坡又很快上调朝廷了。但子孙还在此，田庄还在此，真是“家在江南黄叶村”啊。

第三次可以称为终老型田舍翁。时间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七月间。苏东坡已是66岁了。

政局又一次大变，哲宗死，赵佶登基，大赦天下，苏东坡别海南而北上，准备依在河南的弟弟苏辙而居。但徽宗重用奸臣，苏东坡心有余悸，决心远离京城开封，再次归老常州，这里还有他的子孙、他的田庄、他的好友与亲戚。他在与黄庭坚的信中说：

“行计屡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复入汴出陆。又闻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诿之，已决意旦夕渡江过毗陵矣。”（《与黄庭坚书五首·一》）在与弟弟的信中说：“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尔）。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与子由弟十首·八》）但由于中了暑毒，病延之七月二十八日，便溘然而逝。治田退隐闭户养性不成，很快就终老常州了。

二、苏东坡三次为田舍翁的生活状况

（一）黄州贬谪时期的田舍翁生活状况

苏东坡为田舍翁并非自贬谪黄州之初，而是在元丰四年申请领取一块荒地（即后来自命为“东坡”的乡野之地）后。他在与章惇的信中说：“（黄州）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为了解决全家人的“饥寒之忧”，不得不躬耕陇亩，“便作村舍翁”了。（《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二》）

1.农耕状况

据范成大《吴船录》载：“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再据陆游《入蜀记》所言：“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

旷开豁。”苏轼自叙道：“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东坡八首并叙》）“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与章子厚二首》）但这块五十亩的故营地，并非良田，“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乃“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

所以，必须付出大量的“垦辟之劳”。“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常常是“筋力殆尽，释耒而叹”。幸运的是，“家僮烧枯草，走报暗井出。”虽是“微泉”，也可浇灌庄稼了。

首先，种植稻与麦，解决“乏食”之“困匮”。“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东坡八首·其四》）

苏东坡以一个农夫的眼光与爱心来对待水稻生长情况：“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黄昏月出，露珠起于其根，累累然忽自腾上，若推之者，或缀于茎心，或缀于叶端。稻乃秀实，验之信然。”（《与子由弟十首·一》）种麦之成功来源于能虚心接受一位农夫的指导：“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父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东坡八首·其五》）苏东坡曾记一件与种麦有关的物候趣事：“江湖间，有鸟鸣于四五月，其声若云麦熟即快活。今年二麦如云，此鸟不妄言也。”（《书赠徐大正四则》）此乃种麦者苏轼观察农时、关心作物而有得也。并写诗赞曰：“去年麦不熟，挟弹规我肉。今年麦上场，处处有残粟。丰年无象何处寻，听取林间快活吟。”（《五禽言五首》）

其次，广植果木，如桑、枣、松、橘、茶、竹，还有蔬菜。如《问大治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云：

“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庶将通有无，农末不相戾。春来冻地裂，紫笋森已锐。牛羊烦呵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齿发日夜逝。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苏东坡盼茶心切，茶树未种，但已想象“紫笋森已锐”“他年雪堂品”了。如种元修菜于东坡之下：“彼美君家菜，铺田绿茸茸。豆菜圆且小，槐芽细而丰。种之秋雨余，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

虫……春尽苗叶老，耕翻烟雨丛。润随甘泽化，暖作青泥融。始终不我负，力与粪壤同……悬知东坡下，培塿化千钟。”（《元修菜》）此菜，即“吾乡之巢”。而巢菜，据唐代陆龟蒙《诗序》云：“蜀菜有两巢，大巢即蛇豆之不实者，小巢生豆稻畦中，一曰野蚕豆。”此菜之叶之豆，皆可食用也。因而苏东坡有“此物独妩媚，终年系余胸”的感受。

2. 居住状况

据陆游《入蜀记》云：“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龟头曰‘居士亭’，亭下面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堂中有苏公像，乌帽紫裘，横按筇杖，是为雪堂。”此堂落成于元丰五年二月。苏轼《雪堂记》云：“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

另外，承蒙淮南转运副使蔡承禧的照顾，在临皋亭附近造屋三间，苏轼题名曰“南堂”，与雪堂遥相呼应了。他说：“临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间，极虚敞便夏”。（《与蔡景繁十四首·九》）并题诗五首，其中云：“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此屋可作卧房也。“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此屋可作书斋、丹室也。“更有南堂堪著客，不忧门外故人车。”此屋可为客房也。

穿着状况 苏轼贬谪黄州五年，所谓官职乃团练副使，从八品也。他在词作《满庭芳》中云：“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据《新唐书·舆服志》云：“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宋承唐制，从八品之团练副使穿深青之官服也。但苏轼从事农业生产并不着官服，而是百姓之衣服。苏东坡在《书蜀公约邻》中说：“许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浪于东坡之上，岂复能事公卿哉！”在词作《定风波》中云：“一蓑烟雨任平生。”在词作《调笑令》中云：“渔父，渔父，江上微风细雨。青蓑黄箬裳衣，红酒白鱼暮归。”蓑衣，即用草或棕制成的衣裳，当雨具用。箬（箬）笠，乃以箬（箬）之竹叶，编成的斗笠（帽子）。苏东坡多次使用“蓑衣箬笠”，主要源自当田舍翁的亲身经历，另外也有历史文化之传承，如《诗经·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柳宗元《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张志和《渔父》：“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苏东坡在《与李之仪信》中说：“扁舟草履……与樵渔杂处。”词作《定风波》云：“竹杖芒鞋轻胜

马。”苏辙《栾城集墓志铭》云：“公幅巾芒屨，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芒，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叶条形，常用来编织草鞋。草履，芒屨，皆为草鞋也。幅巾，乃古代男子束发用的丝巾。此表不戴官帽也，一副田父野老的打扮啊。竹杖，本是极普通的辅助行走的手杖，质地即南方随处可见之毛竹。此表苏东坡已届老年了。

饮食状况 东坡五十亩土地，种植的稻麦，已基本解决全家人的“乏食”之忧愁。如有全家吃二红饭之事：“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乃课奴婢春以为饭，嚼之啧啧有声。小儿女相调，云是嚼虱子。日中饥，用浆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气味。今日复令庖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样二红饭也。’”（《二红饭》）此饭，乃麦粉与豆粉之杂合之饭。因大麦、小豆皆为红色，故名也。一旦稻米有积余，苏东坡也亲手试着制酒。他在《饮酒说》中云：“予虽饮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遂不免闭户自醡。麹既不佳，手诀亦疏谬，不甜而败，则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叹，知穷人之所为无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但客不喜尔，然客之喜怒，亦何与吾事哉！”他制酒的标准很低，能过口、能醉人就可以了，不在乎别人的“喜怒”。

苏东坡不怕失败，喜欢尝试。西蜀道士杨世昌给他制蜜酒的方子，他即实践。他说：“蜜酒法，予作蜜格与真一水乱，每米一斗，用蒸面二两半，如常法，取醅液，再入蒸饼面一两酿之。三日尝，看味当极辣且硬，则以一斗米炊饭投之。若甜软，则每投，更入面与饼各半两。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酿者斟酌增损也。入水少为佳。”他又作《蜜酒歌》赞曰：“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醕醕清。”蜜酒制作，大功告成。

“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记载了自己喜欢的两种饮食佳品。据《竹坡诗话》云：“东坡在黄州时，尝赴何秀才会，食油果甚酥。因问主人，此名为何，主人对以无名。东坡又问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为名矣。’”又：“潘长官以东坡不能饮，每为设醴。坡笑曰：‘此必错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诗求之。”饼名“为甚酥”，酒

名“错著水”也。

苏东坡在黄州还发明了两道名餐——东坡鱼羹与东坡肉。

他的《煮鱼法》云：“子瞻在黄州，好自煮鱼。其法，以鲜鲫鱼或鲤治研冷水下入盐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浑葱白数茎，不得搅。半熟，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此即现代之奶汁鲫鱼汤。

他的“东坡肉”更是举世闻名啊。《猪肉颂》曰：“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东坡菜羹，也是苏家日常饮食。“东坡羹，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芥，揉洗数过，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许，涂釜缘及一瓷碗，下菜汤中，入生米为糁，及少生姜，以油盈碗覆之，不得触。触则生油气，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饭如常法，既不可遽覆，须生菜气出尽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辄下。又为盈碗所压，故终不得上。不尔，羹上薄饭，则气不得达，而饭不熟矣。饭熟羹亦烂可食。若无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罨，熟赤豆与粳米半为糁。余如煮菜法。”介绍详尽、适用，操作简便。

茶水，也是苏东坡的心爱。可惜黄州不出产茶，更无名茶。据《遗爱亭记》所云：“每岁之春，（徐君猷）与眉阳子瞻游于安国寺。饮酒于竹间亭。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安国寺茶树不成林啊。又据《寄周安孺茶》云：“自尔入江湖，寻僧访幽独。高人固多暇，探究亦颇熟……好是一杯深，午窗春睡足。清风击两腋，去欲凌鸿鹄。”东坡乃过来人也，上至贡茶龙凤团茶，下到湖州紫笋雪芽茶，皆品赏过。而在黄州，却能食无品之苦茶，安之若素。

交游状况 苏轼初贬黄州，曾自述：“念以重罪废斥，不敢复自比于士友间，但愧缩而已。”

（《与蔡景繁十四首·一》）“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答李端叔书》）后因存“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处世之心，乃以“箪瓢鸡黍”“躬耕渔樵”为适，“遂能安之”，“淡泊自持”，“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结识了一些平民百姓。黄州三子，即是苏东坡交游的有代表性人

物。《东坡八首·其七》云：“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家有一亩竹，无时容叩门。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飧。可怜杜拾遗，事与朱、阮论。吾师卜子夏，四海皆弟昆。”潘子者，有疑其名丙，曾举进士而不调，善酿酒醇美，乃作酒店于樊口。苏东坡常棹小舟，径至店下。郭生，乃名兴宗，侨居黄州，以卖药为生。古生，名耕道，新平人，曾考取进士。因古道热肠，苏东坡疑为唐代侠客古押牙之后人也。古家有竹林一亩，苏东坡常款门而游，并留下《书赠古氏》：“古氏南坡修竹数千竿，大者皆七寸围。盛夏不见日，蝉鸣鸟呼，有山谷气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数亩，种桃李杂花。今年秋冬，当作三间一龟头，取雪堂规模。东荫修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为一郡之嘉观也。”苏东坡爱竹，曾写有“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的诗句。眼下东坡初成，幼竹未生，只可扣古家之门而赏绿筠墨君了。黄州三子，为垦辟荒地东坡，与苏轼简直实行“三同”了——不是已“劳饷同一飧”了吗？

（二）阳羡退隐时期的田舍翁生活状况

元丰七年（1084）三月，苏东坡接到宋神宗手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诰命特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东坡一则以喜：终于“量移”了，得到皇帝的恩赦了；一则以愁：“汝州别无田业可以为生，犬马之忧，饥寒为急。”是年八月，在真州遇到同科进士、常州人蒋之奇。蒋之奇满口答应为其求田问舍，通过阳羡知县李去盈，买下官田（一曹姓人抵当官府的田庄）——黄土村。苏东坡于是两次上书皇帝，“乞常州居住”。元丰八年（1085）二月，接到朝庭调令，同意“常州居住”。但因神宗皇帝去世，举国哀悼，等到五月才动身南归常州。苏东坡又给皇帝、皇太后分别上书《到常州谢表》：“臣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讫者。”并表达了甘心情愿做田舍翁的怀抱：“俾安田亩”，“耕川凿井，得渐齿于平民”，“已忘形于田野”。

1. “东坡田”状况

南宋词家、宜兴（即阳羡）人蒋捷有《东坡田》一诗：“老去红灰酒瓮前，向来青草瘴江边。卜居自为溪山好，不是区区为买田。”可见到南宋时，苏家在宜兴黄土村的“东坡田”还存于子孙后代的

手中。

苏东坡《书田》一文曰：“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访问，终不可得。岂吾道方艰难时无适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虽一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耶？”此文当写于元丰七年（1084），在长江沿岸求田问舍之时。而同科进士、时任江淮荆浙发运副使蒋之奇伸出援手，为其谋宜兴田事，购得黄土村之田庄。而到哲宗元祐二年九月，苏东坡在汴梁作《和王晋卿》一诗，其中道：“上书得自便，归老湖山曲。躬耕二顷田，自种十年木。”此乃回顾归隐阳羡黄土村之事。一文一诗皆提到“二顷稻田”“二顷田”，这不仅印证蒋捷诗中“东坡田”确有其事，而且解开了东坡田的面积——二顷，即二百亩的历史悬案，更可证明东坡说过的“岁可得百余硕，似可足食”（能养活全家二十余口）的话。

在苏东坡上书《乞常州居住表》之前，他已经亲往阳羡察看黄土庄了。元丰七年（1084）十月二日，他写有《楚颂帖》，说：“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暇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可知，苏东坡于二百亩稻田之外，还有计划购买一小园，种植三百本柑橘。

2. “东坡别墅”状况

苏东坡在阳羡黄土村“买得一小庄子”（《与王定国四十六首·十六》），据韩元洁《苏岘墓志铭》曰：“始文忠公爱阳羡山水，买田欲居，仅数百亩，屋数楹也。”这数楹之房屋，后人称之为“东坡别墅”。如明代王徽《东坡别墅》诗云：“当年学士最风流，卜筑林塘事事幽。一片遗墟残照里，湖光山色不胜秋。”经过宋末元初与元末明初的两次兵燹之难，“东坡别墅”已成“一片遗墟”了。

苏东坡有多首诗歌写到黄土村四周的地理环境。如《踏莎行》云：“山秀芙蓉，溪名罨画，真游洞穴沧波下。”满山遍野皆是木芙蓉，秋色如秀啊；阳羡溪水纵横、清澈，如色彩丰富的罨画；善卷、张公之洞窟，沧波平静，如同仙境。如《蝶恋花》云：“云水萦回溪上路。叠叠青山，环绕溪东注。月白沙汀憩宿鹭，更无一点尘来处。”黄土村四围，云水萦回，青山环绕，溪流清白，沙汀鹭宿，一派清幽宁静、超越凡尘的境界。如《浣溪沙·咏橘》云：“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林光。竹

篱茅舍出青黄。”“东坡别墅”可能有“竹篱茅舍”，但秋末冬初的霜橘，新苞绿叶，一片青黄，掩映其间。

3. 品尝太湖美食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此诗句本是苏东坡初到常州的感受，点出了太湖流域土地湿润，出产阳羡稻米。此种米，圆润、纯白，胜过珍珠，香糯可口，深得苏东坡的喜爱。

苏东坡在阳羡还品尝过一种江南美食——千里尊羹。他在《忆江南寄纯如五首·二》中说：“湖目也堪供眼，木奴自足为生。若话三吴胜事，不惟千里尊羹。”宜兴邻县有溧阳，县西有尊湖，又名千里湖，所以说千里尊羹，可谓常州名菜佳肴了。多年后，他还认定千里尊羹乃三吴（东吴苏州、中吴常州、西吴湖州）之胜事，超过湖目（莲子）、木奴（柑橘）。

“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浣溪沙·咏橘》）此词下阙写出自己初尝柑橘的生理、心理反应：柑橘初破，香雾弥漫，倍感惊奇；鲜汁流齿，冷清酸甜，又觉心怯。而吴姬破柑橘而残留的香味，竟然三日不散也，此也一奇啊。

“一双罗帕未分珍，林下先尝愧逐臣。露叶霜枝剪寒碧，金盘玉指破芳辛。清泉漱漱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坐客殷勤为收子，千奴一掬奈吾贫。”东坡虽为“逐臣”，却近水楼台先得月，品尝到新鲜的柑橘。柑橘先从霜枝上剪下来，再选出精品摆放在金色的盘子里，由女佣吴姬破开。苏东坡品尝着，感到鲜汁如清泉流过牙齿，香味如雾气喷散到人的脸面。经历真是愉悦而甜蜜啊。

“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此乃苏东坡在元丰八年（1085）冬季北返朝廷后次韵同朝为官的常州人胡宗愈诗中的两句。诗里回忆了常州的两种美食——阳羡雪芽茶与惠山二泉水。无锡惠山距离黄土村较远，取乳水不易，东坡曾改用当地金沙泉来烹煮雪芽茶。

据孙奕《示儿编》云：“东坡居常州，颇嗜河豚。”又据邵博《邵氏见闻后录》云：“东坡盛称河豚之美，吕元明问其味，曰：‘值那一死。’”

4. 结交常州平民好友

作为北宋的士大夫，能与苏东坡交游的常州人，也是士人身份，如胡宗愈、蒋之奇、单锡、钱公辅、钱世雄、胡仁修、邵民瞻、蒋公裕以及报恩

寺长老等亲朋好友。而作为田舍翁，苏东坡却也能与平民交游。据《重刊宜兴县续志》，苏东坡曾结交过一位当地平民——慕容晖。“晖父惟良，领州刺史，因家阳羡。晖嗜酒好吟，不务进取。所居有双楠并植，枞枞如。盖尝从苏轼游，轼目为双楠居士。”又据《咸淳毗陵志·古迹》：“双楠轩，在县城南，慕容晖所居，状如偃盖，东坡为命名。”苏东坡能为“慕容晖所居”题名“双楠轩”，可见两人关系密切，来往频繁。

元丰七年（1084），苏东坡填词《浣溪沙》赠之：“倾盖相逢胜白头，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卖剑买牛吾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愿为同社宴春秋。”此词透露出：一是苏东坡已经买下黄土村田庄，又能得到朝廷的恩准，分外高兴；二是眉山故乡已不能回去，常州宜兴已成为“第二故乡”，归隐养老，心愿足矣；三是与慕容晖认识，时间虽短，但相知颇深；四是与慕容晖卜邻而居，可以醉酒吟诗。

到了初冬，东坡又同韵填词赠之：“炙手无人傍屋头，萧萧晚雨脱梧楸。谁怜季子敝貂裘。顾我已无当世望，似君须向古人求。岁寒松柏肯惊秋。”在词中，苏东坡把自己比作战国时的季子（苏秦），在生活贫穷，困难之际，能得到慕容晖的鼎力相助，表示由衷的谢意。同时，又用“岁寒松柏”来称赞慕容晖的高贵品格：不慕功名，不务进取，躬耕陇亩，甘做居士。

元丰八年（1085）夏，苏东坡定居黄土村，但时间短暂，因接到朝廷起用的圣旨。在告别之际，东坡造访了“慕容晖所居”，根据其居住环境的特点，题名“双楠轩”，并题诗一首，以作留念：“南轩前头两佳木，先生抚玩常不足。尤爱薰风五月初，白银花开光照屋。”苏东坡一方面对慕容晖甘为双楠居士的思想行为表示赞赏；一方面又劝勉慕容晖走应举科考之途，成就进士功名，光大门庭。其实，这反映了苏东坡的矛盾心理——仕进与隐退。他不能自拔自救，又何能“他拔他救”呢？

（三）常州终老时期的田舍翁生活状况

北宋元符三年（1100）四月二十一日，苏东坡接到诏书：“苏轼以琼州别驾、廉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六月二十日，登州渡海北归。到十一月十五日，又得到消息：“苏轼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他在复孙叔静的信中说：“玉局之除，已有训词，似不妄也。得免

湖外之行，余生厚幸。至英，当求人至永请告敕，遂渡岭过赣归阳羡，或归颍昌，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后因政局变化，加上好友钱世雄已为他借得常州顾塘桥孙家宅（孙氏馆），便决定回归常州了。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苏东坡已将常州作为他的休息终老之地了。

1.“东坡别墅”与“东坡田”还在阳羡

从元丰七年（1084）买田庄于阳羡黄土村，到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又一次被贬岭南惠州，已相隔十年之久。苏家在阳羡还留有田庄吗？有。

《书六赋后》云：“予中子迨，本相从英州，舟行已至姑熟，而予道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可复以家行。独与少子过往，而使迨以家归阳羡，从长子迈居。迨好学知为楚词，有世外奇志，故书此六赋以赠其行。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东坡居士书。”

《书润州道上诗》云：“‘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只有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仆时三十九岁，润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后二十年，在惠州守岁，录付过。”东坡三十九岁时，乃熙宁六年（1073），“后二十年，在惠州守岁”，乃绍圣元年（1095）。“润州道上诗”，原题为《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旧诗新录，存寓意也。守岁而悲苦，乃对远隔千山万水、避难居住于常州阳羡之苏迈、苏迨等家人的“思归”之情啊。此也可印证苏东坡有田庄、有亲人仍在阳羡。

《题秧马歌后四则·其一》云：“惠州博罗县令林君抃，勤民恤农，仆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制作阅试，以谓背虽当如覆瓦，然须起首尾如马鞍状，使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几半天下，独未知为此，而仆又有薄田在阳羡，意欲以教之。适会衢州进士梁君琯过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详，归见张秉道，可备言范式尺寸及乘驭之状，仍制一枚，传之吴人，因以教阳羡儿子，尤幸也。本欲作秉道书，又懒，此间诸事，可问梁君具详也。试更以示西湖智果妙总禅师参寥子，以发万里一笑，尤佳也。绍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轼书。”

以上三文，皆言东坡贬谪岭南惠州时，苏迈、苏迨等家人皆在常州阳羡黄土村，稼穡是力，躬耕

自给，安度岁月。东坡为父，教二子学用秧马之农具，乃远距离指导农业技术也。

2. 苏东坡的终老之地——孙家宅

孙家宅，也称孙氏馆，后又称藤花旧馆，位于常州前北岸。孙家宅后门紧靠大运河之支流——白云溪，溪上架设石拱桥——顾塘桥。溪之两岸，遍插杨柳。孙家宅占地 500 平米，分外庭与内厅两部分，外庭种植紫藤、海棠、青竹等花木，并有洗砚池一方、水井一口（此古井，据专家考证，乃苏东坡生活时代之遗物）。内厅有七间，其中正厅与两侧厢房三间：正厅阔 4.5 米，左、右厢房各阔 3.8 米；东西侧厢四间，东侧厢二间合阔 5 米；房屋为特大六架型，进深达 10 米；整座内厅长约 22 米，占地约 220 平米，建筑气势宏大。据清康熙版《常州府志·古迹》云：“孙氏馆在白云尖，苏文忠公存歿之地，今顾塘桥东刘氏所居，轩北有石洼渟泓，相传为文忠洗砚池。”又据《武阳志余》云：“香海棠在顾塘桥北方氏宅，传为东坡手植。”

3. 东坡懒版

据南宋常州人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云：“东坡北归至仪真得暑疾，止于毗陵顾塘桥孙氏之馆，气浸上逆，不能卧。时晋陵邑大夫陆元光获侍疾卧内，辍所御懒版以献，纵横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为便，竟据是版而终。后陆君之予以属苍梧胡得辉为之铭曰：‘参没易箦，由殮结缨。毙而得正，匪死实生。堂堂东坡，斯文栋梁。以正就木，犹不忍僵。昔我邑长，君先大夫。侍闻梦奠，启手举扶。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诒万子孙，无曰不祥之器。’”此懒版，说法不一：或曰靠背，或曰交床，但确是见证宋代大文豪仙逝之遗物啊。

4. 田舍翁之装束

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云：“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

常州千万人随观的不是戴官帽穿官服，而是一副田舍翁（以疾告老，微官退仕）打扮——着小冠，披半臂的东坡居士。此小冠或即“龟冠”。据宋代诗评家、常州江阴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云：“东坡在儋耳时，余三兄讳延之，自江阴担簦万里，绝海往见，留一月……尝以亲制龟冠为献，坡受之，而赠以诗云：南海神龟三千年，兆叶朋从生爱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钻七十二。谁能用尔作小

冠，岣嵝耳孙纫其制。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今集中无此诗，余尝见其亲笔。”东坡将龟冠称作小冠。归毗陵时，或着此龟冠，既遮阳又透风，又含感谢常州百姓的意思。

5. 生死好友钱世雄

常州人钱世雄，本官宦人家。其父钱公辅，中进士甲科，在朝为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排挤出朝为江宁府知、扬州太守，后病逝，年仅五十二。当时，钱世雄在杭州为苏轼属下，请求苏轼为其父作哀词，苏轼允之。从此，苏、钱两人结为生死之交。钱世雄在绍圣二年，因帮助过苏轼而下狱，被罚铜二十斤并免去官职，成为布衣了。但他在苏东坡北迁中，出力最多，也最成功。是他，为东坡借得孙氏馆；是他，亲往镇江迎接患病的东坡；是他，受东坡之托，收藏《易传》、《书传》、《论语说》；是他，进神药给东坡治病；是他，给东坡送饮料（和饮子）与点心（蒸作）……

东坡《与钱济明十六首·十五》曰：“家有黄荃画龙，拔起两山间，阴威凛然。旧作郡时，常以祈雨有应，今夕具香烛试祷之。济明虽家居，必不废闵雨意，可来燔一柱香否？旧所藏画，今正曝凉之，只今来闲看否。”这是请钱世雄来孙氏馆共同举行祷雨仪式：挂黄荃的著名龙画，夜晚上香祈祷。此事据说有应有灵啊。

东坡还书写《跋桂酒颂》、《江月》，赠与钱世雄。

据《春渚纪闻·卷六》引述钱世雄《跋施纯叟藏东坡帖后》云：先生迁孙氏馆，日往造见，见必移时，慨然追论往事，且及人，间出岭海诗文相示，时发一笑，觉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此可见两人关系密切之一斑。

据《石门文字禅》云：“钱济明侍其旁，白曰：‘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语也不受。’遂化。”钱世雄是目睹东坡谢世的常州唯一见证者。

七月二十八日，东坡仙逝。终年六十六岁。

东坡《与钱世雄书》曾说：“若遂此事（指归田常州、借居孙氏馆），与公杖履往来，践《哀词》中始愿也。”此《哀词》即东坡于熙宁七年（1074）三月为悼念钱世雄之父而制的《钱君倚哀词》。“杖履往来”，完全是田舍翁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密切关系了。而践《哀词》始愿，是指“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誓）将此焉止息。”（我走遍天下却找不到

回归之路，我看重常州这片土地，将在这儿安息）建中靖国元年（1101），离熙宁七年已经二十六年了，苏东坡从海南流放回来，选择常州作为他的安息之地、终焉之地，决然不是偶尔的权宜之计，而是具有四十四年的深思熟虑。从嘉祐二年（1057）的“琼林宴”与常州进士蒋颖叔、单锡订下“鸡黍之约”到元丰七、八年上表乞居常州、归隐阳羡黄土村，一桩桩、一件件，都刻骨铭心。钱世雄为苏东坡养病休息而借得之孙氏馆，竟然见证了当初《哀词》中“将此焉止息”的“诗谶”（预言）了。

三、苏东坡的田舍翁思想

一般而言，苏东坡的思想被定位在儒、道、佛之兼容上。而从田舍翁的角度来研究他的农家思想，并不多见。

苏东坡的农家思想集中到一点，便是“躬耕而食”。北宋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苏轼著《放鹤亭记》一文，借赞扬云龙山人张天骥的“隐居之乐”，抒发了身为徐州太守的“归去来”的情怀。此文在末尾点出：“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黄冠、草履、葛衣”，完全是农夫（田舍郎或翁）的装束。“躬耕而食”，更是表露了苏轼的农夫意识与价值观念。“躬耕而食”的意识与观念，在“乌台诗案”后的三次为田舍翁的生涯中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东坡八首·其一》）
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东坡八首·其二》）

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
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
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东坡八首·其四》）
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
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蒼。
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

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江神子》）

东坡初垦时，苏轼“躬耕其中”，“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仅希望能免“饥寒之忧”。等到稻麦丰收，又觉得须“作太饱计”了。这是一种自食其力、自足为乐的价值观念。

田舍翁苏东坡的农夫思想与他在东坡五十亩荒地上“捐筋力”分不开，所以他对“力耕”深为

赞同。在《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中说：“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诗歌将众目腐儒与东坡四邻作对比，在腐儒眼中受鄙视的“力耕”，在苏轼眼里却是抗洪掘渠的必需“人力”。他对自己的“力耕”还“自愍其勤”，这与儒、道两家有别。

此农夫思想，直接来自陶渊明，间接来自先秦农家。

《书渊明诗》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自求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词此难。四体诚乃瘦，交无异患干。盥息茅檐下，牛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陶彭泽晚节躬耕，每以诗自解，意其中未能平也。晚寓黄州二年，适值艰岁，往往乏食，无田可耕，盖欲为彭泽而不可得者。此二篇最善，偶亲录之。元丰四年八月十六日，轼。”

苏东坡认为“此二篇最善”，是因为他在躬耕东坡的农业实践中，已成为一个田舍翁，并从陶诗中深切地体会到农夫的生活意识与价值观念。上文中的第一篇，乃陶诗《归园田居》之三，是陶翁退隐归耕的真实写照。早出晚归，异常勤恳。非常符合苏轼在东坡五十亩土地上的“垦辟之劳”。第二篇，原题为《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人生归有道”的“道”乃先秦农家之道也。“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把自力谋求衣食、达到生活安乐作为人生的“端”（即第一件大事），此乃陶翁的农夫（即田舍翁）的生活意识。他把退隐躬耕作为“常业”，就必须“肆微勤”（尽力地去干即使是收获菲薄的劳作）。如果不吃“田家苦”，就会“弗获”，就不可能找到“盥息茅檐下，牛酒散襟颜”的人生乐趣。最后，陶翁以何苦不乐而为之的心情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萧统《陶渊明集序》云：陶翁“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种苦乐观、荣耻观，其价值认同与儒、道两家皆不相近也。儒家重视农业，但不主张君子士人亲自去耕作；而道家老、庄，却废弃人事人理人情，主张脱离农业生产。陶翁对躬耕的苦乐荣耻的价值观念却来自力耕思想。清人沈德

潜说：“《移居》诗曰：‘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此云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云贫居依稼穡，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异于晋人如此。”异于儒、道两家亦如此也。苏东坡对陶翁之“力耕”思想也是认同并践行的。宋代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载：“东坡称陶靖节诗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识此语之妙也。仆居中陶，稼穡是力，秋夏之交，稍旱得雨。雨余徐步，清风猎猎，禾黍竞秀，濯尘埃而泛新绿，乃悟渊明之句善体物也。”暂撇开艺术，就农耕而言，东坡与陶翁在“稼穡是力”的农夫价值观念上也是趋同的。（上文对陶诗的评价，乃参考了魏耕原教授《陶渊明论》。）

苏东坡的农夫思想还有一点与陶渊明相近。

东坡诗《鱼蛮子》云：“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空虚未可知，会当算舟车。蛮子叩头泣，勿语桑大夫。”农夫种田，每年要上缴“赋租”。渔夫不种田，可免去“赋租”吗？从“蛮子叩头泣，勿语桑大夫”中可知，宋代自实行王安石变法，官府也学汉代桑弘羊，推行榷利之法，“吏坐市列，贩物求利”。渔夫安能逃脱法网吗？能逃，则还要“叩头泣”吗？由此可见，苏东坡具有农（渔）夫思想，不主张向农家征收赋租。此种思想在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就存有：“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意即春蚕秋粮均无王税）

苏东坡的田舍翁（农夫）思想上接陶渊明，而陶渊明又上接先秦农家。农家著作已失传，仅在《孟子》一书有少许留存。农家许行之弟子陈相在与孟子论战中宣传过乃师的农家思想：一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即主张躬耕而食，贤者含帝王也应一并自食其力，那就无必要征收王税了）；二是反对“厉民以自养”（即反对剥削制度）；三是“市价不二，国中无伪”（即主张商贸交易公平诚信）。可见，陶、苏两家仅与先秦农家思想部分相近而已。

四、余论：耕读人家，一脉相传

写完上文，还有一点余想：常州阳羡（宜兴）黄土村的苏氏家族，在后世的沧桑岁月中还能代代相传吗？

据南宋韩元吉《苏岘墓志铭》云：“始文忠公爱阳羡山水，买田欲居，仅数百亩，屋数楹也，而

家于许昌。至离乱，驾部即世，欧阳夫人始居阳羡。”驾部苏迨卒于靖康之难，其夫人欧阳氏与其子苏箕及孙辈皆居宜兴。

据苏山（苏轼曾孙、苏迈之孙、苏符之子）《苏符行状》云：“方先公在秦亭，家留居颍昌，遇靖康兵祸，先夫人与七子俱没虏中。”再据南宋《周省斋集》云：“大府寺丞苏岘叔子，东坡曾孙，而过子孙。居颍昌，陷金。尚书符奉使时以归，今为驾部迨之后。昔东坡买田阳羡，凡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故岘居此。”

苏过后代苏岘留有六子一女。据《苏岘墓志铭》云：“男六人：柟，迪功郎，严州桐庐县尉；格，以继季真而夭；石，以继族兄奕；世，迪功郎；极，将仕郎；移、杞，皆力进士，欲自奋。公有遗泽，相逊而未承也，公之教为可知矣。女一，适施概。柟等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公宜兴县芙蓉山南平之原。”

据《毗陵苏氏宗谱》载：“而吾常之有苏氏则自大宋嘉祐间眉山讳轼，字子瞻，号东坡，官至礼部尚书，年及五十，奏居常州，终老于是，子孙遂入籍于毗陵，此毗陵苏氏之始也。”又载：“厥后东坡公长子伯达之裔迁于毗陵之西前舍居焉，凡四乡之有苏氏者皆伯达公之后裔。三子叔党之裔迁于毗陵之东锡邑兰溪居焉，凡郡城之有苏氏者皆叔党公之后裔。”

按常州苏氏世系排列，苏轼为一代，苏迈、过为二世，其后子孙繁衍，到现今，已到了三十六世，人口已近4000。东坡长子苏迈之三十一世孙——苏慎，目前任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副会长、常州市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他收藏江南五部《苏氏宗谱》：光绪版《毗陵苏氏宗谱》；民国版《苏氏族谱》；民国版《毗陵苏氏宗谱》；民国版《毗陵湖庄苏氏宗谱》；民国版《江阴苏氏宗谱》。俗话说“盛世修谱”，二十世纪以来，苏慎先生领导了常州苏氏后人的修谱工程，完成了五部“苏谱”的续修：《苏氏族谱（聚星堂版）》10卷；《毗陵苏氏宗谱（文海堂版）》10卷；《毗陵苏氏族谱（后塘桥分谱）》6卷；《江阴苏氏族谱（聚星堂版）》12卷；《苏氏族谱（苏州洞庭西山分谱）》8卷。

（颜正源，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苏轼买地考

李常生

内容提要 苏轼先后遭贬数次，颇美陶渊明归乡隐居之闲，时有买地常居之愿，且先后于荆渚、金陵、蒜山觅地未成。谪居黄州时，建雪堂，躬耕“东坡”；居惠州时，欲久居于“白鹤峰”上；至儋州后，城南买地，建房五间长住。元丰年间，宜兴买地数块，后子孙依此田地，长居繁衍。今考苏轼买地渊源、地址以及该土地现况，仅作为弥补苏轼研究之不足。

关键词 苏轼 买地 考察

一、苏轼对移居江南的感情起于进士及第

嘉祐二年(1057)丁酉，苏轼二十二岁。

三月十一日，苏轼、苏辙皆进士及第，于琼林苑宴⁽¹⁾，与蒋之奇约卜居阳羡。

元丰七年(1084)八月，苏轼作《次韵蒋颖叔》于真州。诗云：“月明惊鹊未安枝，一棹飘然影自随。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蒋诗记及第时琼林苑宴坐中所言，且约同卜居阳羡。)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二、黄州耕地于东坡，建雪堂

元丰四年(1081)二月。于黄州。

苏轼作《东坡八首》于黄州。云：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公幅巾芒屨，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江城子》云：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掘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依苏轼文，并未述及，东坡土地是买？还是免费取之官府？但已可显见，在乌台诗案后，东坡已有厌恶官场之心，并欲学渊明归田园之梦于乡野买地建屋久居之渴望。苏轼买地后，再开始建雪堂，时而居之，躬耕而食，享受田园生活之乐。此地在何处？黄冈市地方人士多有争议，至今无决。

三、欲买地于荆渚

元丰六年(1083)，于黄州。

苏轼《答范蜀公十一首》其三云：

蒙示谕，欲为卜邻，此平生之至愿也。寄身函丈之侧，旦夕闻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风物之美，足以终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数百千，已令儿子持往荆渚，买一小庄子矣。恨闻命之后。然京师尚有少房缗，若果许为指

挥从者干当，卖此业，可得八百余千，不识可纳左右否？所赐手书，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庆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异日必能陪从也。

八月二十二日纪事引苏轼与张方平简：“已令儿子往荆南买一庄子。”然苏轼此后未提及荆南有田，田当未买成。

荆南，又称南平、北楚，辖荆、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五代十国荆南统治范围包括今湖北的江陵、公安一带。

四、欲买田于金陵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八月。

苏轼作《与王荆公二首》第二简云：

某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公执事。某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别来切计台候万福。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屨，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无以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以一二数也。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秋气日佳，微恙颇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写此诗时，轼应在金陵见过王荆公。王安石劝苏轼久居于金陵，轼或亦有意在金陵买地，然最终并未成行。

五、欲买地于润州蒜山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九月，苏轼于润洲作《蒜山森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元长老》云：

魏王大瓠无人识，种成何翅实五石。不辞破作两大樽，只忧水浅江湖窄。我材濩落本无用，虚名惊世终何益。东方先生好自誉，伯夷、

子路并为一。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与稷。暮年欲学柳下惠，嗜好酸咸不相入。金山也是不羁人，早岁闻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傍人笑倒山谓实。问我此生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

《苏轼文集·卷七十一》有诗《书浮玉买田》云：

浮玉老师元公，欲为吾买田京口，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归，无乃食言于神也耶？

苏辙《栾城集·卷十四》有诗《和子瞻次孙觉谏议韵题邵伯闸上斗野亭见寄》云：

扁舟未遽解，坐待两闸平。浊水污人思，野寺为我清。昔游有遗咏，枯墨存高巵。故人独未来，一樽谁与倾。北风吹微云，莫寒依月生。前望邦沟路，却指铁瓮城。茅檐卜兹地，江水供晨烹。试问东坡翁，毕老几此行？奔驰力不足，隐约性自明。早为归耕计，免慚老僧荣。（僧荣，斗野主人也。子瞻将卜居丹阳蒜山下，此亭正当归路，故云尔。）

苏轼被贬黄州，打击甚重，看透政治，实想买地耕作，学渊明归隐，因此与安石见面后，先欲买地于建康。前二文，书写欲于蒜山买田之时。此时，苏轼尚未在宜兴购地，人在润州，得知蒜山有地，产权且属金山寺所辖，因此与金山元长老洽谈，元长老即佛印禅师。然后后，苏轼即在宜兴买地，此计划作废。^②

六、买田于宜兴

神宗元丰七年（1084）。

《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与王定国四十一首》第十六简云：

某启。今日景繁到泗州，转示十月二十三日所惠书并新诗六首、妙曲一首，大慰所怀。河冻胶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终日喜快，滞薄冰释，幸甚！幸甚！某在扬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得耗，奏邸拘微

文，不肯投进，已别作一状，遣人入京投下。近在常州宜兴，买得一小庄子，岁可得百余硕，似可足食。非不知扬州之美，穷猿投林，不暇择木也。黄师是遣人往南都，故急作此书，仍和得一诗为谢，他未暇也。新济甚浅，冻不可行，旦夕水到即起，恐须至正初方有水也。不知至时公在宋否？某若得请，或附宣献公舟尾南来，不尔，遂泝水至西都，出陆赴汝也。然欲葬却乳母（子由乳母）。乃行。即南都亦须住一月。入夜，倦迫，不尽意。惟万万自重。

此书应作于泗州，乃苏轼离黄后所作。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一日苏轼至泗州，神宗元丰八年（1085）正月四日离泗州。此诗所述，应为苏轼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至常州宜兴所购置之田地。

另，《苏轼文集·卷五十三·与潘彦明十首》第一简云：

别来思念不去心，远想起居佳安，眷爱各无恙。不见黄榜，未敢驰贺，想必高捷也。某两曾奉书，达否？屡梦东坡笑语，觉后惘然也。已买得宜兴一小庄，且乞居彼，遂为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试。漫发此书，不复覩缕。惟千万保爱。

《苏轼佚文集编·卷二·与蒋公裕一首》云：

轼启。近别，想体中佳胜。田事想烦经画，今遣侄孙费钱赴州纳，有所买牛车等钱，本欲擘画百緡足，今只有省陌，请收检支用。如少，不过来年正月续得面纳也。余惟万万自爱，不宜。轼顿首公裕蒋君良亲足下。十月十二日。

《苏轼佚文集编·卷四·与友人一首》云：

曹潜夫得三舟，许为多载米来，不敢指定石数，但请问潜夫，看可带多少，即依数发来。切望留意，少济都下所阙也。丁卯年租米数，且便一报。为冗迫，不及写单家兄弟事，且致意致意。轼又上。

兼托曹潜夫买少漆器，仍于公裕处支钱，乞依数付与。诸事不免一一喧聒。向时侄孙带不尽米，知寄在强景仁家，如未曾寄与人来，可便付潜夫也。

苏轼宜兴买田约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九月，前面书札叙述由蒋公裕先生作为管理人，处理相关事宜。与王定国书更说明，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

里。苏轼买田后，当年在许多诗文中均有提及。

另，《苏轼文集·卷五十二·尺牍·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三十四云：

张公所戒，深中吾病，虽甚顽狠，岂忍不听，愿为致此意也。公向令作《滕达道埋铭》，已诺之，其家作行状送至此矣。又欲作《孙公神道碑》，皆不敢违。只告密之，勿令人知是某作，仍勿令以润笔见遗，乃敢闻命。来诗甚奇，真得冲替气力也。呵呵。故后诗未及和。朝夕别遣人，并致糟淮白，所欲宜兴田。某岂敢有爱于此等，然此田见元主昏赖。某见有公文在浙漕处理会，未见了绝，当亦申都省也。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于亲情蒋君勾当尔。不知在公时，蒋能如此干否？更筹之。

《苏轼词集·菩萨蛮》云：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造物游。有书仍懒著。且漫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

《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答秦太虚七首》其五：

某启。别后欲奉书，纷纷无暇，且谓即见，无所事书，而日复一日，遂以至今。叠辱手教，具闻动止甚慰。某宜兴已得少田，至扬附递，乞居常，仍遣一侄孙费钱往宜兴纳官（盖官田也），须其还，乃行。而至今未来，计亦无他，特其子母难别尔。见舣舟竹西待之，不过更三两日必至，必能于冬至前及见公也。小儿子不历事，亦微忧，故不欲舍之前去。迟见之意，殆以日为岁也。传神奇妙之极。贊若思得之，当奉呈也。余非面不尽。不一一。

此书应写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于十月十九日在扬州上《乞扬州居住表》，故应在冬至（十一月十五日）前。此书写买官田，是否另买官田？不得而知。苏轼于元丰七年四月离黄赴汝，约九月在常州宜兴买得庄田。

《苏轼佚文汇编·卷一·乞常州居住表》载：

臣先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餧粥，欲望圣慈，特许于常州居住。

《乞常州居住表》叙明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月十九日，当时苏轼在扬州。

另《苏轼文集·卷二十三·到常州谢表二首》

其一：

臣轼言。先蒙恩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寻上表乞于常州居住。奉圣旨，依所乞，臣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讫者。

《周益公文集·卷十七·书东坡宜兴事》有载：“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正月四日，乃行道中，上书乞归常。三月六日至南京，被旨从所请，回次维扬，有归宜兴。留题《竹西三绝》盖五月一日也。”

《同孟震游常州僧舍诗》云：“湛湛清池五月寒。”而谢表谓：“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讫为五月无疑。当时哲宗年幼嗣位，尊英宗皇后高氏为太皇太后，权同听政，故轼书两首谢启，前者呈哲宗，后者呈太皇太后。依周必大的解释，苏轼应于出黄后至宜兴二回，第一次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买地，第二回于宋哲宗元丰八年(1085)再归宜兴。另，竹西寺在扬州，非宜兴，此处或有误。

《栾城集·次韵子瞻和陶渊明杂诗十一首时有赦书北还》其十：“吾兄昔在朝，屡欲请会稽。誓将老阳羨，洞天隐苍崖。(兄已买田阳羨，近张公善卷西洞天。)时事乃大谬，宁复守此怀？区区芥子中，岂有两须弥？举眼即见兄，何者为别离？尻舆驾神马，孰为策与羁。弭节过蓬莱，海波看增亏。”此诗应作于苏轼北归以后。

明沈敕编《荆溪外纪》有苏轼所撰《初归阳羨，子由从歙县来，与邵梁父子、单锡兄弟同游张公洞，惜别子由》云：“鸭头春水浓如染，水面桃花弄春脸。衰翁送客水边行，沙衬马蹄乌帽点。昂头问客几时归，客道秋风黄叶飞。系马绿杨开口笑，傍山依约见斜晖。”另苏辙所撰《张公洞》云：“乱山深处白云堆，地坼中空洞府开。茧瓮有天含宇宙，瑶台无路接蓬莱。金芝春暖青牛卧，珠树月明黄鹤回。此日登临兴何限，春风吹绽碧桃腮。”

宋傅藻《东坡纪年录》述苏轼于元丰八年七月有至常州。

另依孔凡礼考证，轼于元丰七年(1084)十月六日即至常州。元丰八年(1085)七月下旬自常赴登。轼至常州两次以上。

又，孔凡礼《苏辙年谱》有述及，辙于十月下旬过苏州、过京口、过扬州，未述及至宜兴张公洞一事，且轼已于七月下旬自常赴登，时日不对，子瞻、子由有关“张公洞”诗待考。

张公洞与善卷洞属不同位置，但直线距离接近十二公里，道路距离约十五公里。“近张公善卷西洞天”表示苏轼土地距此二地不远。目前在宜兴，苏轼于此附近买地区域已不可考。

对于东坡买田，周必大又有下述：“东坡初买田黄土村，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讼，有司已察而斥之，东坡移牒以田归之。”显然东坡买黄土村之田，并不顺当，后有纠纷。且依宗典于《苏氏卜居宜兴考》有云：“苏轼初买宜兴田应在熙宁七年。”

《苏轼文集·卷三十六·辨黄庆基弹劾札子》云：

……庆基所言臣强买常州宜兴县姓曹人田地，八年州县方与断还。此事元系臣任团练副使日罪废之中，托亲识投状依条买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后来姓曹人却来臣处昏赖争夺。臣即时牒本路转运司，令依公尽理根勘。仍便具状申尚书省。后来转运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赖，依法决讫，其田依旧合是臣为主，牒臣照会。臣愍见小民无知，意在得财。臣既备位侍从，不欲与之计较曲直，故于招服断遣之后，却许姓曹人将元价收赎，仍亦申尚书省及牒本路施行。今庆基乃言是本县断还本人，显是诬罔。今来公案见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验。

孔凡礼于《苏轼年谱·卷二十三》中述及两事：一是自黄州团练副使迁至汝州团练副使，不得谓之起复，仍为“罪废”官司后，田仍归苏轼。二是此处所云购地，并非能作为置田黄土村之据。

周必大又在《书东坡宜兴事》一文中提及：“今公之曾孙犹食此田，启曹氏理屈不复赎耶？抑当时所置，不止此也？”又《游山录·卷二》亦载，于乾道丁亥(1167)七月辛丑纪事，见苏轼曾孙峴于宜兴。

南宋《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古迹》载：

苏东坡别业在县北滆湖塘头。嘉祐初，蒋颖叔有卜邻之约……其孙峴因家焉。

南宋《咸淳毗陵志·卷十八·人物》载：

苏轼，嘉祐二年与蒋颖叔连名策第。宴琼林日，坐相接，遂约卜居阳羨。邑人单锡亦同年进士，轼以甥女妻之，属以问田。后谪黄州、移临汝，上章乞居阳羨，谢表有云：“买田阳羨，誓毕此生。”尝托邵民瞻买宅一区，为缗

钱五百。将挈居，偶与邵步月村落，闻老妪哭声甚哀，异而问之。答曰：“吾家有一居，相传百年。今吾子不肖，售诸人，所以悲耳。”扣其居，即邵所得。亟取券对妪焚之，竟不索直。自是亦不复问舍，寓于顾塘桥孙氏之室而歿。其风谊如此。

宜兴漕桥镇“黄土寺”有记：宋朝时称“法性寺”，据当地老人回忆，在寺中曾有宋朝苏东坡大学士题写“法性寺”牌匾，惜毁于战火。在过去商务印书馆的《辞海》中有“红友”记载。书上说：“苏东坡途经黄土寺，乡人敬之，以土产黄酒敬之，东坡赞，并取名红友。”

宋费衮《梁溪漫志》题《东坡卜居阳羨》载：

建中建国元年，东坡自儋北归，阳羨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之游，独仕人邵民瞻从学于坡，坡亦喜其人，时时相与杖策过长桥，访山水为乐。邵为坡买一宅，为缗五百，坡倾囊仅能偿之。卜吉入新第，既得日矣。夜与邵步月，偶至村落，闻妇人哭声极哀。坡徙倚听之，曰：异哉，何其悲也！岂有大难割之爱，触于其心坎？吾将问之。遂与邵推扉而入，则一老妪，见坡，泣自若。坡问妪何为哀伤至是，妪曰：“吾家有一居，相传百年，保守不敢动，以至于我。而吾子不肖，遂举以售诸人。吾今日迁徙来此，百年旧居，一旦诀别，宁不痛心！此吾所以泣也。”坡亦为之怆然。问其故居所在，则坡以五百缗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抚，徐谓之曰：“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即命取屋券，对妪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还旧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回毗陵，不复买宅，而借顾塘桥孙氏居暂憩焉。是岁七月，坡竟歿于借居，前辈所为类如此，而世多不知，独吾州传其事”云。

依照周必大及孔凡礼所述，苏轼在宜兴买田时间为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九月，且买田一次。买田地点约为黄土村曹氏之地，直到乾道丁亥(1167)七月，仍见苏轼曾孙屹于宜兴使用。然依苏辙的论述，子瞻买田处近张公洞、善卷洞；另《咸淳毗陵志》载，苏东坡别业在县北滆湖塘头。依宜兴地理观之，滆湖塘头在宜兴北方临滆湖处，而张公洞、善卷洞位于宜兴南方。另宜兴北方现今有黄土寺

村，亦有黄土寺。依上所述，苏轼买地处应有三处即：

宜兴北方的黄土村(现有黄土寺村)。此处离宜兴闸口镇闸口村最近，闸口村为苏轼好友邵民瞻的居处，该村有苏轼撰“天远堂”匾额，至今仍存。另有苏轼手栽海棠树，旧根已亡，新根再起。且黄土寺有苏轼游历传说。黄土寺村的黄土寺离闸口村邵民瞻故居仅五公里，路途不远。前述黄土寺村聚宜兴市区约二十一公里，也符合周必大所言：“黄土去县五十五里。”另“黄土寺”亦记载：“苏东坡途经黄土寺，乡人敬之，以土产黄酒敬之，东坡赞，并取名红友”亦与周必大所云相符。黄土寺与邵民瞻住居闸口村约五公里。

滆湖附近的塘头。南宋《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古迹》载：“苏东坡别业在县北滆湖塘头。嘉祐初，蒋颖叔有卜邻之约。……其孙屹因家焉。”塘头村在宜兴北方滆湖东侧，南新西侧的“塘头村”此地距离宜兴市区约十五公里，距离邵民瞻的闸口村约八公里。

张公洞善卷洞附近土地。张公洞与善卷洞离宜兴市区约为十八至二十公里。单锡家住宜兴湖㳇镇单家巷，离张公洞仅三公里余，据善卷洞十五公里余。依苏辙《栾城集·次韵子瞻和陶渊明杂诗十一首时有赦书北还》其十云：“吾兄昔在朝，屡欲请会稽。誓将老阳羨，洞天隐苍崖。(兄已买田阳羨，近张公善卷西洞天。)”显然于近张公洞、善卷洞处亦有买田。因此处据单锡家不远。依宜兴前档案局长汤虎君先生考证，此地应在宜兴善卷洞深山里的“黄土村”，汤虎君先生认为该地据蒋之奇、单锡家比较近。

依上述分叙，苏轼在宜兴买地应有二至三处。汤虎君先生认为两处，即滆湖附近的南新塘头村，另一为善卷洞山区的黄土村。此事多有待考之处。宋费衮所题苏轼于建中建国元年，东坡自儋北归后至宜兴买田，当有误，因此时轼已病焉，自润州至常州已卧不能起，何来至宜兴买田之理？

也有传说，丁蜀镇之东坡书院也为东坡购地处，然没有充份的文献证据。而今塘头村之村民，亦不知有苏家买地之事。

七、卜居惠州白鹤峰

绍圣三年(1096)甲戌，轼六十一岁，惠州贬所。

《诗集》卷四十苏轼绍圣三年(1096)三月作于惠州《和陶移居二首》云：

去岁三月，自水东嘉祐寺，迁居合江楼。
迨今一年，多病鲜欢，颇怀水东之乐。得归善
县后隙地数亩，父老云：此古白鹤观也。意欣
然，欲居之，乃和此诗。
昔我初来时，水东有幽宅。
晨与鴟鵟朝，暮与牛羊夕。
谁令迁近市，日有造请役。
歌呼杂闾巷，鼓角鸣枕席。
出门无所诣，乐事非宿昔。
病瘦独弥年，束薪与谁析。

润潭转崎岸，我作《江郊》诗。

今为一廛氓，此邦乃得之。
葺为无邪斋，思我无所思。
古观废已久，白鹤归何时。
我岂丁令威，千岁复还兹。
江山朝福地，古人不我欺。

《诗集》卷四十苏轼作于绍圣四年(1097)正月末的《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云：

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
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
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鋒山。^{〔3〕}
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春自往还。

瓮间毕卓防偷酒，壁后匡衡不点灯。
待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暑一壶冰。
佐卿恐是归来鹤，次律宁非过去僧。
他日莫寻王粲宅，梦中来往本何曾。

在惠州、儋州，轼多作和陶诗，一则仰慕潜之弃官归田之志，再则感叹己之不由身憾。

欲长子迈来广南东路指射差遣，欲次子迨试法
赴举。苏轼在惠州时，已觉察出自己可能无法北归，
因此觅地建居，欲接引宜兴子孙移居惠州共居。

四月八日，卜新居。盖得归善县后隙地数亩为
古白鹤观者经营之，子过亦预其事。

绍圣四年(1097)甲戌，轼六十二岁。正月末，

迈自宜兴挈两房赴惠，抵赣上。过往循州相迎。迈之来，为就仁化令任。

依孔凡礼《苏轼年谱》载：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成，自嘉祐寺迁入。新居之成，方子容(南圭)助以帑，邻里亦助作。轼于绍圣四年(1097)二月入白鹤峰居，月底，迈携媳与孙来。四月十七日，得琼州别驾；十九日与过离惠。再移昌化军儋州，别时，家人痛哭诀别。

轼贬儋州后，家人亦离惠返宜兴耕地。白鹤峰故居为后人建为祠堂，常年纪念，后被整建为卫生学校，近一年拆迁，准备恢复祠堂旧观。

八、儋州买地，起屋五间

元符元年(1098)戊寅，轼六十三岁。

《宋史本传·苏轼》载：

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
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
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
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
老游，若将终身。

《文集》卷五十六苏轼作于儋州的《与郑靖老四首》第一简云：

某启。近舶人回，奉状必达。比日起居佳
胜，贵眷令子各安。某与过亦幸如昨。初赁官
屋数间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与官员相交涉。
近买地起屋五间一灶头，在南汚池之侧，茂木
之下，亦萧然可以杜门面壁少休也。但劳费窘
迫尔。

《诗集》卷四十二《和陶和刘柴桑》云：

万劫互起灭，百年一踟躇。
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
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
稍理兰桂丛，尽平狐兔墟。
黄椽出旧柄，紫茗抽新窟。
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
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
竹屋从低深，山窗自明疏。
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
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

(下转第26页)

谈苏轼贬逐期中的“回归民间”

郑秉谦

内容提要 苏轼被贬逐于黄、惠、儋三州，适时调整心态，醉心农事，热爱田园；遍交市人野老者，融入底层社会。三贬百危而不死，根本原因在此。

关键词 苏轼 贬逐 农事 野老

中国封建时代士大夫，回归民间社会、底层社会的明显标志，一看他与土地、农事的关系，二看他与社会底层人们的关系。遭逐的苏轼，在黄州时是四十几岁的壮年，参加粮食大田劳动；在惠州时是六十上下年纪，参加菜园药圃的种植；在儋州则是六五老人，虽不直接参加农田劳动，但常留连于田头畦尾。在这三州，他都曾借得官地、民地耕种，在黄州及移汝北上途中还曾多方设法购置田庄，并最后在阳羡（宜兴）买定岁入百余石的田园。

东坡这个人，从小坡头放过牛羊，田里种过稻麦，山上种过松树，对土地农事怀有极大兴趣。他在读陶渊明诗后曾写道：“陶靖节云，‘平畴返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题渊明诗二首》）^{[1]2091}。后世人还能通过宋人笔记，看出他对这两句诗是如何的倾倒：“苏子瞻一日在学士院闲坐，忽命左右取纸笔，写‘平畴返远风，良苗亦怀新’两句，大书、小楷、行草，凡七八纸，掷笔叹息曰：‘好！好！’散其纸于左右给事者。”（《晁氏客语》）^{[2]141}从他写及牧牛的诗中，可见他对如何放好牛羊，相当熟悉：“泽中草木长，草长病牛羊。寻山跨坑谷，腾踔筋骨强。”（《书晁说之<考牧图>后》）^{[3]1966}。从他歌咏东坡的诗中，也可见他对如何促使麦子丰收一事并不陌生“农父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至于如何种松，他更了了于心，虽老农不能及：“松性至坚悍，然始生至脆弱，多畏日与牛羊，故须荒茅地，以茅阴

障日。若白地，当杂大麦数十粒种之，赖麦荫乃活。须护以棘，日使人行视，三五年乃成。”（《种松法》）^{[1]2361}他甚至用诗句来记录种松技术：“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岗。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三年黄茅下，一一攒麦芒。三年出蓬艾，满山散牛羊。”（《戏作种松》）^{[3]1027}他对嫁接果树，也能谈得头头是道：“蜀中人接花果，皆用芋胶合其隙，予少时颇能之。”（《接果说》）^{[1]2363}。

据我读书所见，在古士大夫中，很少有像他这么自幼便娴习田园，熟悉农事，并兴趣盎然的人。因此，一当他在仕途遇挫，他便会很自然地回到田园中去。他在贬黄州途中便说：“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过淮》）^{[3]1023}抵达黄州，在欣赏山水之先已觉知“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3]1032}，他也实际得很。因此，他在著名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中，写的那“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渺孤鸿影”^{[4]242}的形象，既表现自己精神生活上的特立独行，又表现自己物质生活上的飘游无根。所以早在来黄途中，到蔡州就想抵达黄州后“山城买废圃”^{[3]1020}，到歧亭又与陈慥商量在黄州对岸买田，到达后又想在州城中买竹林。当子由将把他的家属送到时，他即拟与子由商量：“此邦疑可老，修竹带泉石。欲买柯氏林，兹谋待君必。”（《晓至巴河口迎子由》）^{[3]1053}在子由将家属送到后，他又向子由说：“买田吾已决，乳水况宜酒”（《游武昌寒溪西山寺》）^{[3]1050}。但他同子由商量的结果是，黄州属淮南西路而对岸属荆湖北路，一个罪官在别路购置与躬耕田园，“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与陈季常·八》）^{[1]1567}。至于柯氏竹林终于未买下来，原因不明。

他到黄州的次年，亦即元丰四年，便由他的门客马正卿出面，向黄州太守借到散满瓦砾的故营地50亩，名之曰东坡。他们为了解决乏食问题，便种

了麦，又种了稻。他曾大书特书：“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东坡八首·引》）^{[3]1079}接着，他又在东坡种菜种茶，种树种花，自得其乐。“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问大治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3]1119}然后是种稻麦、起雪堂。到元丰六年，京东淮南转运副使蔡承禧趁到黄巡行的机会，帮他在临皋亭旁边造南堂三间。这一来，他的田园已颇具规模：“山家为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亩蔬。更有南堂堪著客，不忧门外故人车。”

（《南堂·四》）^{[3]1167}。此时起，他大胆吟咏“五亩渐成终老计”（《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3]1154}，并不断去信亲友，夸示自己接地气，生活逐渐安定。试举数例：向驻节下游不远的淮南东路提刑、友人李常说：“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蔬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与李公择十七首·九》）^{[1]1499}又向僻住故里的堂兄苏不危说：“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与子安兄》）^{[1]1829}向在京的故人、宰执章惇说：“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也。”（《与章子厚二首》）^{[1]1639}向他的密友、受诗案牵连而贬到岭外去的王巩说：“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麌糟陂里陶靖节，如何？”（《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十三》）^{[1]1520}他戏说的这个称号，用现在的网络语，便是“山寨陶潜”的意思。以上这些话，主要不是诉说穷困劳苦，而是无意中显露他融入土地与农事的高兴与乐观。

苏轼一边借耕故营地，解足“乏食”问题，一边便开始正式求田问舍，购置田庄。在他开垦东坡的次年，亦即元丰五年，他便亲到黄冈县的沙湖（螺蛳店）和邻县蕲水“相田”，但均未看中。同时，他又托如今被贬为荆南节度副使的杨绘，在荆渚一带求田。杨绘曾为他联系了多处，但均未成功。因

此苏轼在《书田》一文中感叹：“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访问，终不可得。岂吾道方艰难时无适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虽一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耶？”^{[1]2259}黄州求田未成，他在元丰七年移汝北上时，一路便继续求田问舍。他抵达真州后，曾写信给在金陵过从多日的王安石：“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屨，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与王荆公二首·二》）^{[1]1444}但不幸又未达目的。这时船已将到润州，离他拟想中的落脚点常州已不远了。他通过金山住持佛印，在旁边的蒜山求田，还是不成。至九月，终于通过宜兴人、故友兼同年、转运副使蒋颖叔所托的蒋公裕，在宜兴买到了岁入百石的田庄。于是他回头一边北上，一边连上两表，请求在常州“居住”。船抵南都商丘时，接到了他“责授汝州团练副使、常州居住”的批准书。于是他的船掉头南下，过扬州作诗云：“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一》）^{[3]1347}

他晚年又被谪惠儋，携幼子苏过独去，而安排长次二子及三房家属就食宜兴。他晚年到岭表海外，当然已不宜买田了，可是他在惠仍借了王参军半亩地种菜。另外，他还种了许多药材，但不知就是种在这半亩地上，还是另有其田？到了儋州，“再拜请邦君，愿授一廛地”（《籴米》）^{[3]2254}，种植粗粮和菜、药、花。这时他已六十开外，又是多病之身，自己难于持锄，只得依靠“蓬头三獠奴”来整治这个菜圃。但自己因爱好农事，仍然时时“游观”其地，并咏诗云：“早韭欲争春，晚菘先破寒。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早知农圃乐，岂有非意干。尚恨不持锄，未免骍我颜。”（《和陶西田获早稻》）^{[3]2315}他对这丘由前州守张中批准借予的地，感情很深厚，还曾作诗：“黄菘养土膏，老楮生树鸡（菌类）。未忍便烹煮，绕观日百回”，“一与蟹叟醉，苍颜两摧颓。齿根日浮动，自与粱肉乘。食菜岂不足，呼儿拆鸡栖”（《和陶下潶田舍获》）^{[3]2316}。

因他真心爱农田农事，因此农获在他笔下也变得异常可爱。笋蔬是“春蔬黄土软，冻笋苍崖坼”（《次韵和王巩六首》）^{[3]1127}；土芋是“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鸱（芋头）为粮，不复疫病”，“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

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诗题）^{[3]2365}；蜀中特产巢菜则是”彼美君家菜，铺田绿茸茸；豆莢圆且小，槐芽细而丰”（《元修菜》）^{[3]1161}他写农获的诗文有个特点：他虽然仍都从功利方面来认识它们，但能写得一点功利性也没有，却诗情深浓，爱意洋溢。不妨举“岁寒三友”中的竹来说一说：他中年在浙江写竹，“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于潜僧绿筠轩》）^{[3]448}，这还是古人的“不可一日无此君”。到了他老年时代在惠州写竹，则是：“岭南人，当有愧于竹。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耶！”（《记岭南竹》）^{[1]2365}这则是他苏轼贬逐期间的“不可一日无此君”了。两个不同的“不可一日无此君”，都诗意盎然。至于他描写农田美丽与作物生长的诗文，则更令心醉。他写稻田：“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垂珠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垅间，蚱蜢如风雨。”（《东坡八首·四》）^{[3]1081}他写麦熟春耕，则“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泫露酣娇黄。汪汪春泥已没膝，剗剗秋谷初分秧。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游博罗香积寺》）^{[3]2112}他写陂田深耕，则“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风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江神子》）^{[4]328}若非亲历亲为农事者，能以“蚱蜢如风雨”来示丰收，能以“净绿”、“娇黄”来示稻秧之将插、麦之将熟，能以“乌鹊喜，报新晴”来示深耕吗？

以上所举诗文，显示了东坡对农田、农事、农获的衷心喜爱，这是他回归民间的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则是他深爱底层民众，并与他们保持密切交往。宋代及其后的许多笔记，都记录了东坡这方面的故事。“子瞻在黄州与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门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避暑录话》）又：

“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与之倾尽城府，论辨唱酬，间以谈谑。”（《渑水燕谈录》）^{[2]73~74}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交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蓼花洲闲录》）^{[2]91}，人人可以作朋友。他

贬谪前期在黄州时，所交仍以过往官场人物为主，但其中本地下层百姓也颇多：其中的“光黄间异人”，就有昔为贵公子、今已“环堵萧然”的陈慥，有故县佯狂污垢的张慤子与高安狂人赵贫子。其中陈慥还算得上“士”，而张是个喜帮人干活的劳动者，赵则是个算命卜卦的清客。而每年正月二十日都陪他在东郊“女王城”饮酒的潘、古、郭三人，其中潘丙是个屡举不中的卖酒贫士，古耕道是个从不欺人的椎鲁者，郭遘则是个喜唱挽歌的卖药者，都是真正的市井人。在苏轼辟东坡时，三个人曾一起来帮苏轼干活。“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飧。”（《东坡八首·七》）^{[3]1084}潘古郭三人帮于外，而马正卿与巢谷二人帮于内。他们从苏轼于东坡，帮他开辟经营这块借来的土地。马当过“太学正”，这种太学的基层官吏，有由上面任命的，但一般均在学生中选命。有一次苏轼去太学，偶至马的住处，不巧他恰不在，苏遂在壁上题杜诗《秋雨叹》而去。马见即日辞归。后索性当了苏轼门客，从官各地，连贬黄时也跟着到了这个江城。苏轼曾说：“马梦得与仆同岁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马梦得穷》）^{[1]2297}巢谷是苏轼青少年时代同学，原名轂，为边将韩文宝部下。韩受人构陷，被诛前交他银数百两，遣他送给其子养家。他因此被通缉，后逃遁到黄州，易名为“谷”，依苏轼。他为苏轼经营东坡，并成为苏迨、苏过的老师。而苏轼自己当时身为“钦犯”，却敢于收留一个被通辑者，这也足以显示苏轼好义与勇敢的天性。正因为他的好义与勇敢，他才同黄州民间人士水乳交融，他才敢向外地朋友炫耀他当时的处境：“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桔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歧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答秦太虚七首·四》）^{[1]1536}

而到晚年岭外之贬，则由于当时哲宗“绍述”父亲变法事业心情急迫，宰相章惇对元祐重臣恨之入骨，监管严厉，苏轼已不能同官场人物有更多的

交往。他在惠、儋，除了表兄，提刑程之才外，也就只能同惠守詹范、方子容和儋守张中，同附近循州广州琼州的几位知州、通判来往，此外便是大量普通百姓了。在惠，大家素知的有林行婆与翟逢亨：“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家尚留关。”（《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3]2214}他到惠不久，便与朋友去林家看花，“主人白发青裙袂，子美诗中黄四娘”（《正月二十六日，偶与数客……》）^{[3]2101}直到他续贬海外，他还托他的友人、循守周文之转交礼物给她：“林行婆当健，有香与之，到日便送去也”（《与周文之》）^{[1]1761}在儋州，由于章惇的部下董必等的严密监守，极少有他同官场人物相交的纪录，他所交的便全是当地百姓。只要看看这些诗题：《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已上冢。予携一瓢酒，寻诸生，皆出矣。独老符秀才在，因与饮，至醉。符盖儋人之安贫守静者也》^{[3]2308}，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3]2323}，便可知他与当地百姓的密切关系了。“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愁颜解符老，寿耳斗吴翁”，这些诗都是他与当地百姓交往的实录（《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3]2324}。他爱他们，尊重他们，敬称他们为“负薪能谈王道”者（《唐允从论青苗》）^{[1]2298}。而他们也同样地报答了他：在惠，荔支圃八五老人邀他荔熟时至圃食荔饮酒。在儋，王介石等二十余学生亲为造屋。在那里，他还作过他平生最难解的一首诗《被酒独行，遍至……》，此诗记叙他遍觅诸黎，却均去扫墓，未遇，途中只遇符林，林向他谈投梭、换扇事：“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唯逢春梦婆。”^{[3]2323}此诗难解，不在于字面，而在于符林所述的秘密（投梭换扇）。符林向他讲述了秘密，而他不便将秘密公示，所以只能这样写。这事本身便说明东坡已是当地民间百姓的知心人了。苏东坡不仅回归民间，并且回归到民间百姓的心里去了。

注释

- [1]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2] 颜中其编：《苏东坡轶事汇编》，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
- [3]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 [4] 薛瑞生编：《东坡词编年笺证》，西安：三秦出版

社，1998年。

（郑秉谦，浙江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温州大学兼职教授、一级文学创作职称）

（上接第22页）

轼谪于儋州，原居官舍，后不可住，乃买地于城南“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建房五间，名曰“桄榔庵”。苏轼北归后，有地方官将原址改为堂，立先生祠。自今，原址仍在，只是围城菜地，内有碑记。

九、结论

苏轼于黄州、惠州、儋州买地建屋之时，均欲久居或终老该地，然命运安排并不顺遂，皇命再下，另作迁徙。只有宜兴买地，成为苏轼后人躬耕繁衍之地，至今苏家后代在常州、宜兴地区已有数千人。

注释

- [1] 宋乾德二年置，在汴梁城西。苑东南堆有一座假山，山上建有楼阁，山下铺设锦石，并辟有池塘。苑中大部分地段都种植岭南、江南名花。苑中以植物景观为主。宋太祖正式建立了殿试制度，即在吏部考试后，皇帝在殿廷之上主持最高一级的考试。所有及第的人于是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琼林苑，故称琼林宴。

[2] 蒜山又称云台山，在润州古西津渡后。蒜山前水中有小蒜山。《润州类集》中说，蒜当为筹算之算，三国时期，周瑜和诸葛亮尝会此山，议拒曹操，两人不谋而合地决定“火烧赤壁”，于是后有赤壁之胜，所以当时人们多以算山为山名。

[3] 韩退之云：“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柳子厚云：“海上尖峰若剑铤，秋来处处割愁肠。皆岭南诗也。”

（李常生，台湾城乡风貌研究工作室主任，南京东南大学城市规划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北宋史和苏轼史在读博士）

飞鸿 孤鸿 归鸿

——由“鸿”意象看苏轼流寓心态变迁

张学松

内容提要 北宋文豪苏轼自21岁出蜀往京城应试，除父母去世短暂回乡外，一生都在宦游漂泊流寓。不同时期苏轼的流寓心态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同的心态在其作品“鸿”意象中表现为飞鸿、孤鸿、归鸿三种鲜明形态。本文从苏轼作品中“鸿”意象出发，探究苏轼流寓心态的变迁。

关键词 “鸿”意象 苏轼 流寓心态 变迁

北宋文豪苏轼自21岁出蜀往京城应试，除父母去世短暂回乡外，一生都在宦游漂泊流寓，流寓“即不得已离开本土而移居他乡”。不同时期苏轼的流寓心态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同的心态在其作品“鸿”意象中有着鲜明的表征。

宋嘉祐六年（1061），苏轼被任命为凤翔节度判官。这年冬天他前往凤翔赴任，弟苏辙相送。二人在郑州分手后，苏辙作《怀渑池寄子瞻兄》，苏轼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诗由苏辙诗前两句“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之“雪泥”触发，感慨人生飘忽无定犹如“雪泥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一语成谶，预示了苏轼的流寓人生。但这里的“飞鸿”相对中性，对苏轼的流寓人生而言，“鸿飞那复计东西”是不幸而言中。“飞鸿”可代表苏轼青年时期的流寓心态。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之前虽因反对新法而自请外放，辗转杭、密、徐、湖诸州，但仍是朝廷命官，且政绩卓著，只不过与“飞鸿”一样漂泊而已。元丰二年（1079）因被指控作诗文诽谤朝廷而被捕入御史台狱。经历九死一

生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从元丰三年（1080）到元丰七年（1084），苏轼在黄州度过了五年贬谪生涯。被贬黄州时苏轼已45岁，王安石虽已退居江宁，而主行“新法”的神宗年方33岁，作为政治家的苏轼感到难有出头之日，经济上又极为困窘，加之黄州“地瘴蕃草木”，令其倍感孤独、惶恐、迷茫。这时他写了一首名词《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又用了“鸿”的意象，但却由“飞鸿”变成了“孤鸿”。当年的“雪泥鸿爪”还是一种比喻，而这里的“孤鸿”与“幽人”则融为一体，那“惊起却回头”的惊恐，“有恨无人省”的孤独，“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迷茫，正是苏轼此时流寓心态的写照。

当然，词中的“孤鸿”也寓有孤标傲世不同流俗之意，如同那株由西蜀流落“陋邦”“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名花苦幽独”（见同时作《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的海棠一样！

自古以来，“孤鸿”就寓有游子漂泊眷恋故土之意。阮籍《咏怀诗》之一：“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张九龄《感遇》诗之四：“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李商隐《夕阳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天地自悠悠。”周岐《塞下曲》：“关山多少征人泪，不及孤鸿天外归。”东坡本性乐天，未至黄州即言：“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初到黄州，即羡其“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这种心态是真实的但不是东坡此时的主流心态。看看下列作品：《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

韵二首》其一：“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长使齐安人，指说故侯园”；其二：“寄谢李丞相，吾将反丘园。”《游静居寺》：“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戏作种松》：“却后五百年，骑鹤还故乡。”《次韵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至今归计负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安国寺寻春》：“看花叹老忆年少，对酒思家愁老翁。”《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这是东坡赴黄途中和初到黄州时所作诗，高密度地表现了他漂泊流寓和思乡之情。元丰四年（1081），东坡之侄安节到黄州看望，东坡写《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中云：“嗟予潦倒无归日，今汝蹉跎已半生”（其一），“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其二）。安节离去时，他写十四首小诗送别：“索漠齐安郡，从来著放臣”（其一），“未甘为死别，犹恐得生归”（其二），“尚有身为患，已无心可安”（其六），“我梦随汝去，东阡松柏青”（其十），始终不忘自己“放臣”的身份，对在“索漠”的黄州而感“无心可安”，愿随安节回归“东阡松柏青”的故乡。前引“海棠”诗，以为黄州陋邦无此名花，乃好事者从其故乡西蜀移来。这都说明东坡对流寓地的疏离不认同和对故土的眷念。“孤鸿”代表了东坡中年的流寓心态。

元丰七年（1084）东坡量移汝州刺史，结束了五年黄州的贬谪生涯。元丰八年（1085）春，神宗英年早逝，十岁的哲宗继位，神宗之母高氏垂帘听政，任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旧党人士纷纷得到重用，苏轼一路升迁至翰林学士掌内制，参与朝廷决策。由于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与旧党发生矛盾，于元祐四年（1089）自请外放出知杭州，任满回朝继任翰林学士，不久又于元祐六年（1091）出知颍州，元祐七年（1092）春改知扬州，本年九月被召回京参与郊祀大典，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仕途最辉煌的时期，黄州贬谪后的腾达中兴。作为封建文人，“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苏轼真正成了帝王师，实现了人生最高理想。然而这位“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政治家，在其仕途顶峰的时候并不得志，他与司马光龃龉，屡遭御史弹劾，三次自请外放，除前两次出知杭州、颍州外，又于元祐八年（1093）出知定州。本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哲宗并不满意苏轼这位老师，苏轼赴定州任面见的面子就不给。第二年改元绍圣（1094），新党上台对旧党进行清洗。苏轼

罢知定州改知英州，途中“五改谪命”，最后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在惠三年后，绍圣四年（1097）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元祐党人，苏轼被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在海南度过整整三年贬谪生涯。元符元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大赦天下，元祐旧党被起用，苏轼本年五月获命量移廉州，六月渡海北返，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客死常州，结束了其坎坷的一生。

从绍圣元年（1094）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可谓苏轼晚年。整整七年都是在岭海度过的。诗人自嘲人生功业的两州“惠州”“儋州”都在这七年之中。历尽沧桑、宦海沉浮，加之参禅悟道，本就乐天的东坡，晚年的流寓心态更加显得淡定与从容。虽然遭遇新贬时，东坡不无惊恐，岭海七年也常思故土，但淡定与从容则是其晚年流寓心态的主导。生命即将结束时，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东坡在金陵写了《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心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此诗也用了“鸿”意象，但又由元丰三年（1080）写《卜算子》词的“孤鸿”而变为“归鸿”。“春来何处不归鸿”是一反诘句，即春来任何地方都是“鸿”之归处。这里的“鸿”隐喻诗人自己，即任何地方都是诗人的归处。其实这是东坡对流寓地的融合与认同，也是其流寓身份的认同。寓惠三年，“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迁居》），“三年岭海上，粤峤真我家”（《丙子重九二首》其一），把惠州已当作自己的家乡。绍圣四年（1097）又贬海南岛，行至梧州，听说其弟谪贬雷州，作诗曰：“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未到海南已把海南作为故乡。谪居海南三年遇赦北归，不仅把海南作为故乡，且把自己的出生地四川作为寄居的地方了：“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量移廉州后写信给秦观又打算终老廉州。真是“春来何处不归鸿”！“归鸿”代表了东坡晚年的流寓心态。

（张学松，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

苏轼在密州的儒释道情结初探

王琳祥

内容提要 苏轼任密州太守之日，融儒释道三家的理念施政安民。密州境内无高僧，寺宇朴陋，僧皆粗野，但境内的卢山、常山却富有道家的传奇色彩。苏轼身为儒士，以民为本，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为民说话，感动上苍，求雨得雨，有德于密州，故密州人为像于城西彭氏之圃，岁时拜谒。

关键词 苏轼 密州 儒释道 情结

纵观苏轼的一生，与儒、释、道三家有不解之缘。然稍加剖析，不同时期的苏轼由于不同的原因，在三者之间，稍有轻重，并非一成不变。本文仅就苏轼在密州的儒释道情结作为专题进行探讨。

初到密州

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三日，苏轼携家眷抵达密州。

密州，春秋时为鲁国之地，汉置东武县，后魏于此置胶州，隋开皇五年（585）改为密州，寻废为高密郡，唐复为密州。密州在北宋熙宁年间属京东东路，属县有四，分别为诸城、安丘、莒、高密，州治诸城。诸城位于今山东省东南部，居潍河上游。

对于三十九岁的苏轼来说，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担任地方最高长官，他以儒士心态积极有为于世，希冀建不朽功业，留万世芳名，因此踌躇满志。可当他一踏上密州的境土之时，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这里远不如杭州富庶，佛家、道家的氛围也与杭州相去甚远……

当月十二日，苏轼因收到苏州虎丘寺通长老的来信，有感于密州城中无佳山好水，且寺宇朴陋，僧人粗野，故在回信中将他那无可奈何的牢落之情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

某启。近过苏台，不得一见而别，深为耿

耿。专人来，辱书，且喜法履清胜。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养衰拙。然城中无山水，寺宇朴陋，僧皆粗野，复求苏、杭湖山之游，无复仿佛矣。何日会集，慰此牢落。唯万万自重。人还，布谢。

苏台，本指苏州之姑苏台，此处代指苏州。

苏轼到密州二十余日，时手实法方行。司农寺下诸路，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

所谓手实法，即让民众自报其家产以定户等，为了防止瞒报，又提倡互相揭发其不实。

在一贯以民为本的苏轼看来，司农寺显然是扰乱民生，擅造律条，故直接对使者提举常平官说：“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惊曰：“公姑徐之。”

适逢密州境内旱灾蝗灾严重，苏轼不顾个人安危，如实上状陈述灾情，论方田均税之患，论手实法害民，论免役法应用五等古法，并恳请京东、河北免榷盐等。儒家的“入世”思想，本是苏轼终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在“熙宁变法”期间，苏轼以上的作法，应是最能凸显作为儒生出身的苏轼其难能可贵的品德操行。

熙宁八年

密州境内的卢山与道家有关，世传秦博士卢敖为避秦之暴政隐居此山，晚年于山洞中辟谷修炼，后成仙飞升而去。

正月某日，苏轼在密州州学教授章传（传道）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游历卢山。

卢山在诸城县东南三十里，卢敖得道的石洞位于卢山南半坡上，洞口上方的石壁上横刻“卢山洞”三个大字。洞内石桌供奉着卢敖的石像，俗称“卢山老祖”。卢山的西南坡上，有巨石拔地而起，高有数丈，顶端尖峭，状似灯台，故名“圣灯岩”。

章传乃性情中人，沿途即兴赋诗五首。苏轼有感于卢敖得道之事，联想到当下的变法，次其韵，以《卢山五咏》为题寄怀：

上界足官府，飞升亦何益。

还在此山中，相逢不相识。——《卢敖洞》

卢敖洞，苏轼自注说：“《图经》云：‘（卢）敖，秦博士。避乱此山，遂得道。’”

上界足官府，语出韩愈《酬卢给事》诗：“天门九扇相当开，上界真人足官府。”上界，天上，天界。佛道两家皆以为神仙居住之所。

飞升亦何益，典出《神仙传》：“彭祖问白石生曰：‘何不服升天之药？’答曰：‘天上多至尊，相奉更苦于人间耳。’”《顾况集·五源诀》记述说：“番阳仙人王遥琴子高言：‘下界功满，方超上界，上界多官府，不如地仙快活。’”

“还在此山中”二句，意谓卢敖并未飞升上天，仍在山中，只是世人与之相逢而不相识。

博士雅好饮，空山谁与娱。

莫向骊山去，君王不喜儒。——《饮酒台》

莫向骊山去，君王不喜儒，典出《史记·秦始皇本纪》：“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专任狱吏，未可为求仙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宋人赵次公注此诗句说：“意者，卢生即卢敖也。《史记》所载坑诸生，止云坑之咸阳。而欧阳率更类书于《瓜部》中载《古文奇文》曰：秦始皇密令人种瓜骊山硎谷中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今先生言莫向骊山去，则意在此，言骊山乃坑儒之处故也。”（按，欧阳率更类书即唐人欧阳询的《艺文类聚》。）

石室有金丹，山神不知秘。

何必露光芒，夜半惊童稚。——《圣灯岩》

何必露光芒，《史记·天官书》云：“填星，其色黄，光芒。”赵次公注此诗说：“此本咏圣灯，而诗人立新意，以为丹之光芒尔。”

皎皎岩下泉，无人还自洁。

不用比三星，清光同一月。——《三泉》

《诗·唐风·绸缪》云：“三星在隅。”毛《传》曰：“明星之多，不如一月之光。”不用比三星，清光同一月，苏轼意谓三泉之水，同映一月，其光非

三星所能比。

长安自不远，蜀客苦思归。

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障日峰》

障日峰，位于卢山东十余里。《水经注》卷二六载：“（密）水有二源，西源出奕山，亦曰障日山。山势高峻，隔绝阳曦。晏谟曰：‘山状障日，是有此名。’”《名胜志》载：“山在诸城县东三十里，亦名障日岭。”障日山是诸城东部最高的山峰，方圆二十余里，与卢山东西并峙，山势险峻。《山东通志》卷二六载：“障日山，在（诸城）县东南四十里。……苏轼《卢山五咏》直以为卢山之一峰矣，其实不相属也。”

长安自不远，典出《晋书·明帝纪》：“（明）帝年数岁，元帝坐，置膝前。属长安使来，问曰：

‘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举目见日，不见长安。’由是益奇之。”此处以长安比作汴京，有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意。

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苏轼曾言：“郡东卢山，绝类峨眉而小。”又自注此诗说：“其状类峨眉，但小尔。”赵次公曰：“因山之似峨眉，所以起蜀客思归之兴也。”

当月二十日，苏轼因梦见亡妻王弗，赋《江城子》抒怀念之情。

三月，苏轼的胞弟苏辙将近作《次韵韩宗弼送游太山》等四诗寄来，苏轼于欣喜中次韵四诗，并在诗中言欲借《法界观》读之。《法界观》乃佛教重要经典，华严宗的代表作。苏辙当时正读此书，但苏轼尚未读过，故苏轼在《送春》诗中说：“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并自注：“来书云‘近看此书’，余未尝见也。”施元之注《法界观》说：“清凉澄观禅师述，以明华严品中法界大旨。”

四月初，密州旱蝗相继，因父老建议，苏轼以密州最高长官的身份斋居素食，虔诚祷雨于常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常山是古来密州人祈雨祭神的场所，位于诸城市南二十里，呈西南——东北走向。其山虽然谈不上高大雄伟，但也有十余里的方圆。《太平寰宇记》载常山的得名由来：“山在诸城县，以祷雨常应，故名。”

请雨常山，既而得雨，苏轼于欣喜之中却盖以

行，时有得道不死者、石晋时代的水部员外郎贺亢从道旁见之，以为苏轼有道家的禀赋，是可以授道之人。

《后山集·贺水部传》载：“贺亢，世莫知其年与其邑里。仕石晋为郎。章圣皇帝东封，有布衣巾帻谒于道左，称晋水部员外郎贺某。……熙宁中，东坡居士为密州，岁大旱，请雨常山。既而雨，居士却盖以行。贺从道旁见之，以为可授道也。欲往，而疑无素，乃止行。”苏轼后在《送乔仝寄贺君六首》诗叙中说：“元祐二年十二月，（乔）仝来京师十许日。余留之，不可，曰：‘贺以上元期我于蒙山。’又曰：‘吾师尝游密州，识君于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又有诗曰：“随师东游渡潍邦，山头见我两轮朱。岂知仙人混屠沽，尔来八十胸垂胡。”

当月下旬，杭州余主簿来，苏轼喜得灵隐寺云知禅师等道俗手书近百余通，遂答云知简，叙怀念杭州高僧之情：

某启。久留钱塘，寝食湖山间，时陪道论，多所开发。至于灵山道人，似有前缘。既别经岁，寤寐见之，盖心境已熟，不能遽忘也。及余簿来，并天竺处，得道俗手书近百余通，皆有勤勤相念之意。又皆云杭民亦未见忘。无状何以致此，盖缘业未断故耶？会当求湖、明一郡，留连数月，以尽平生之怀。即日法履何似，尚靡僧职，虽不惬意尚，然勉为法众，何处不可作佛事。某到此粗遣，已百余日，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且不烦念及。未间，慎爱为祷。不宣。

云知和尚，《五灯会元》卷十五有传。云知属青原下十世，泐潭澄禅师法嗣，全称临安府灵隐云知慈觉禅师。湖、明，即湖州，明州。

五月，密州又大旱，苏轼再作祝文，亲率吏民祷于常山，大雨应时而降。

苏轼祈雨得应，遂新常山神祠。毕工之日，苏轼作祝文赞曰：“自我再祷，应不旋轂。迨兹有秋，岁得中熟。……陶匠并作，新其楹桷。岂以为报，民苟不作。”

当月十二日，诏罢给田募人充役，苏轼在密州施行其法，民甚便之。

七八月，密州大饥荒，民多弃子，苏轼为密州最高长官仅止八个月，不胜哀怜之情，饮食难下，故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所活者多达数千人。后人评价苏轼此举体现出了他那典型的仁爱宽厚的儒家风范。

因斋厨索然，身为太守的苏轼日与通判刘庭式沿古城墙挖杞菊充饥，作《后杞菊赋》解嘲自笑。“循理无私”，这就是今人所说“东坡精神”。

九月，润州金山寺宝觉禅师使人致问，苏轼亲书《后杞菊赋》相赠，以为千里一笑。回想起旧岁离开杭州前往密州的途中相会之乐，故在回信中深情地写道：

某启。去岁赴官，迫于程限，不能舣舟。一别中流，纵望云山，杳然有不可及之叹。既渡江，遂蒙轻舟见饯，复得笑语一饷之乐。惭荷之怀，殆不可胜言。别来因循，未及奉书。专人至，辱教累幅，慰论反复，读之爽然，如对妙论。仍审比来法履佳胜。某此粗遣，但未有会见之期。临书惘然，惟万万自重。《至游堂记》，即当下笔，递中寄去。近有《后杞菊赋》一首，写寄，以当一笑。人还，草草，不宣。

在此信之后，苏轼又附言密州没有能够交往的高僧，颇让人遗憾：

圆通不及别书，无异此意。告转求此纸，东州僧无可与言者，况欲闻二大士之警咳，何可复得耶？此语合吃几拄杖？刁丈计自太平归安胜，屡有书去，不知达否？因见，道下恩。焦山纶老，亦为呼名。

圆通，即法秀。东州僧，指密州的僧人。密州曾名东武。警咳，比喻谈笑。刁丈即刁景纯。太平，安徽当涂，宋属太平州。焦山，山名，在江苏省丹徒县东，孤峙大江之中，与南岸金山相对。纶老，焦山寺僧，四川中江人。

十月十三日，诏罢手实法。吕惠卿罢知陈州。密州人私以为幸。

十一月，苏轼在密州稍葺所居园北旧台而新之，弟辙闻讯，于欣喜中名之为“超然”，并作赋一篇，苏轼自作《超然台记》寄怀。

当年，应杭州盐官县安国寺住持僧居则之请，苏轼作《盐官大悲阁记》，记中有讥讽朝廷更改科场法度不便之意：

羊豕以为羞，五味以为和，秫稻以为酒，曲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齐均，其寒暖燥湿之候一也，而二人为之，则美恶不齐。岂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数取欤？然古之为方者，未尝遗数也。能者即数以得妙，不能者循数以得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见焉。人见其二也，则求精于数外，而弃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齐，舍其度数，以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

造，则其不为人之所呕弃者寡矣。

今吾学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乐、律历、宫庙、服器、冠昏、丧祭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礼之所可，刑之所禁，历代之所以废兴，与其人之贤不肖，此学者之所宜尽力也。曰：是皆不足学，学其不可载于书而传于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古之学者，其所亡与所能，皆可以一二数而日月见也。如今世之学，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欤？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由是观之，废学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

岂惟吾学者，至于为佛者亦然。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

杭州盐官安国寺僧居则，自九岁出家，十年而得恶疾且死，自誓于佛，愿持律终身，且造千手眼观世音像，而诵其名千万遍。病已而力不给，则缩衣节口三十余年，铢积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为记。

余尝以斯言告东南之士矣，盖仅有从者。独喜则之勤苦从事于有为，笃志守节，老而不衰，异夫为大以欺佛者，故为记之，且以风吾党之士云。

盐官，宋为杭州属县，今属浙江省海宁市。

安国寺，《武林梵志》卷六载：“在（盐官）县西北五十步。唐开元元年建，名镇国海昌院。会昌五年废。大中四年复置，名齐丰。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

斋戒持律，佛教徒持守戒律而素食。斋，佛教原以过正午不食曰斋，后来多指不杀生而素食。持律又作持戒，即指严守戒律。《法华经·譬喻品》曰：“持戒清洁，如净明珠。”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三·昙无竭》云：“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诵经，为僧所重。”

无心，佛教指解脱妄念的真心。《宗镜录》卷四五下记述说：“所为无心，何者若有心则不安，无心则自乐。故先德偈云：‘莫与心为伴，无心心自安。若将心作伴，动即被心漫。’”无为，佛家指无因缘造作，无生住异灭四相之造作。为，是造作之意。《无量寿经》说：“无为泥洹之道。”

《乌台诗案·与僧居则作大悲阁记》中记述苏

轼承认：“熙宁八年，轼知徐（按：应作“密”）州日，有杭州盐官县安国寺相识僧居则，请轼作《大悲阁记》，意谓旧日科场，以赋取人，赋题所出，多关涉天文、地理、礼乐、律历，故学者不敢不留意于此等事。今来科场，以大意取人，故学者只务空言高论，而无实学。以讥讽朝廷改更科场法度不便也。”

熙宁九年

正月，四十一岁的苏轼以磨勘由太常博士转尚书祠部员外郎。

尚书指尚书省，与中书省、门下省合称为三省，是唐、宋时代执行政令的中央机关，类似现在的国务院，其最高长官本为尚书令，因唐太宗李世民曾为尚书令，后人不敢居此名，遂不复置，故尚书省长官仅至左右仆射，位于宰相之列。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之最高长官为尚书，副职为侍郎。祠部是礼部的下属单位，相当于现在部下面的司，掌管天下祀典、道释、祠庙、医药之政。祠部员外郎是祠部的副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司长。尚书祠部员外郎，为官阶名称，有官名而无职事，只为其寄禄，属于散官，官阶正七品。

当月十五日，苏轼因从赤溪山主赵棠的儿子赵昶处获得《赤溪山主颂》十一篇，而在此之前，又从张安道前辈那里获知赵棠的为人，故跋《赤溪山主颂》以寄情怀：

达与不达者语，譬如与无舌人说味。问蜜何如，可云蜜甜。问甜何如，甜不可说。我说蜜甜，而无舌人终身不晓。为其不可晓，以为达者语应皆如是，问东说西，指空画地，如心疾，如睡语，听者耻不知，从而和之，更相欺谩。

昔张鲁以五斗米治病，戒病者相语不得云：“未差也。”若云尔者，终身不差也。故当时以张鲁为神。其事类此。然亦不得以此等故疑其真。余得赤溪山主颂十一篇于其子昶，问其事于乐全先生张安道，知其为达者无疑，为书其末。熙宁九年正月望日。

赤溪山主即赵棠，苏轼曾在元丰三年谪居黄州时作《赵先生舍利记》，言赵棠乃得道之人：“赵先生棠本蜀人，孟氏节度使廷隐之后，今为南海人。仕至幕职，官南海。有潘冕者，阳狂不测，人谓之潘盎。南海俚人谓心风为盎。盎尝与京师言法华偈颂往来。言云：“盎，日光佛化也。”先生弃官从盎游，

蓋以謂盡得我道。蓋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身，得舍利數升。軾與先生之子昶游，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蓋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志，具載其事。”

三月初三日，蘇軾在密州府邸西齋自書其寓有深意的《超然台記》，闡釋“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瓌麗也。餉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于物之內，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斗，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忧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錢塘移守胶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檣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讼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斯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几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卢山，秦人卢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吊其不終。台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

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見余之无所往而不樂者，蓋游于物之外也。

熙寧九年三月三日東武西齋書。蘇軾。

四月一日，蘇軾與通判趙庚（成伯）等到邵家園藏春館欣賞殘花，賦《臨江仙》詞：

熙寧九年四月一日，同成伯、公謹輩賞藏春館殘花，密州邵家園也。

九十日春都過了，貪忙何處追游？三分春

色一分愁。雨翻榆莢陣，風轉柳花毬。閔苑先生須自責，蟠桃動是千秋。不知人世苦厭求。東皇不拘束，肯為使君留。

九十日春，指春季三個月的時間。

三分春色，楊元素《本事曲集》載：“叶道卿《賀聖朝》詞：‘三分春色，一分愁悶，一分風雨。’”《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叶清臣（道卿）·賀聖朝·留別》：“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

閔苑先生須自責，閔苑先生，指東方朔。《漢武故事》以東方朔為仙人，故稱其為閔苑先生。《漢武內傳》載：“南窗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汝侍郎東方朔，我鄰家小兒，性滑稽，曾三來偷桃。此子昔為太上仙客，令到方丈山，但務遊戲，擅弄雷電，激波揚風，致令蛟鰐陸行，山崩海竭，太山谪斥，使在人间。’”《漢書·東方朔傳》載：“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日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蟠桃動是千秋，《漢武故事》載：“東都獻短人。帝呼東方朔，朔至，短人指東方朔謂上曰：‘王母種三千年桃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后西王母下出桃七枚，母自啖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桃核着前，王母問曰‘用此何為？’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叹曰：‘此桃三千年一着子，非下土所植也。’王母蟠桃三千年開花結子，故言‘動是千秋’，皆衬出人间时光迅速。

“不知人世”句，言不知人世间时光流过，苦求留住春天。

東皇，即東君、東帝，指東方青帝，為司春之神。《尚書緯》：“春為東皇，又為青帝。”

肯為使君留，言若司春之神不拘約束，或可使春色暫留人间。

常山有泉，清涼滑甘，冬夏若一，密州人凿石為井，其深七尺，廣三之二，且作亭于其上，蘇軾將其名之為“雩泉”。

四月十八日，密州又大旱，蘇軾再一次到常山雩泉處祈雨。因求雨得雨，蘇軾作《雩泉記》以彰

常山神之德：

常山在东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临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楼观，仿佛可数。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寝食，无往而不见山者。其神食于斯民，固宜也。东武滨海多风，而沟渎不留，故率常苦旱。祷于兹山，未尝不应。民以其可信而恃，盖有常德者，故谓之常山。熙宁八年春夏旱，轼再祷焉，皆应如响，乃新其庙。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余流溢去，达于山下。兹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云为雨，以信于斯民者，意其在此。而号称不立，除治不严，农民易之。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作亭于其上，而名之曰雩泉。

古者谓吁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吁嗟其所不获，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闻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恃者乎！轼以是愧于神，乃作《吁嗟》之诗，以遗东武之民，使歌以祀神而勉吏云：

吁嗟常山，东武之望。匪石岩岩，惟德之常。吁嗟雩泉，维山之滋。维水作聪，我民所噫。我歌云汉，于泉之侧。谁其尸之？涌溢赴节。堂堂在位，有号不闻。我愧于中，何以吁神？神尸其昧，我职其著。各率尔职，神不汝弃。酌山之泉，言采其蔬，跪以荐神，神其吐之。

雩泉，在常山庙西南十五步处。“古者吁嗟而求雨曰雩”，古代祈雨之祭为雩。《公羊传·桓公五年》：“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亲之南郊……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吁嗟，指呼雩之声。《云汉》，《诗·大雅》篇名。其首章云：“倬彼云汉，昭回于天。”郑笺：“时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视天河，望其候焉。”后人因以云汉为旱暑之喻。

东武郡治，即诸城县，宋为密州州治。《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七·密州》下云：“诸城县，本汉东武县，属琅邪郡。乐府章所谓《东武吟》者也。”

当月，密州芍药特盛，苏轼遵循旧俗，大会南禅、资福二寺，取其姿格绝异者“玉盘盂”供佛。事后，苏轼作《玉盘盂》抒怀：

东武旧俗，每岁四月，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以芍药供佛，而今岁最盛。凡七千余朵，皆重跗累萼，繁丽丰硕。中有白花，正圆如覆盂，其下十余叶，稍大，承之如盘，姿格绝异，独出于七千朵之上。云得之于城北苏氏园中，

周宰相营公之别业也。而其名甚俚，乃为易之。

其一云：

杂花狼籍占春余，芍药开时扫地无。
两寺妆成宝璎珞，一枝争看玉盘盂。
佳名会作新翻曲，绝品难逢旧画图。
从此定知年谷熟，姑山亲见雪肌肤。

两寺妆成宝璎珞，典出《法华经》卷四：“有七宝塔从地涌出，无数幢幡以为严饰，垂宝璎宝铃万亿而悬其上。”璎珞，用珠玉串缀成的装饰物，前缀“宝”字以加强其珍贵富丽性。

姑山新见雪肌肤，此以姑射山之神人喻白芍药。典出《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其二云：

花不能言意可知，令君痛饮更无疑。
但持白酒劝嘉客，直待琼舟覆玉彝。
负廓相君初择地，看羊属国首吟诗。
吾家岂与花相厚，更问残芳有几枝。

白酒，美酒。梁武帝《子夜夏歌》诗曰：“金杯盛白酒。”

直待琼舟覆玉彝，《周礼·春官》云：“六彝……皆有舟。”《注》曰：“六彝，谓鸡彝、鸟彝、羣彝、黄彝、虎彝、蜋彝。又，舟，尊下台，如今之承盘也。”

看羊属国首吟诗，典出《汉书·苏武传》：“苏武使匈奴，匈奴欲降之，知武终不可屈，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武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后归，拜为典属国。”此句以“看羊属国”拈出苏字，以指自己。

苏辙在次韵二诗题下注云：“东武苏营公家园中千叶白芍药，子瞻新为此名。”

五月，天下大旱，诏令有司祷郡望，苏轼沐浴斋戒祷于常山，作祭文说：“天子有命，闵兹旱暵。俾我守臣，并走郡望。”

同月，苏轼以“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借紫”的名义亲书《雩泉记》，命人摹勒上石，立于常山祠前，东向，碑高六尺四寸，宽三尺四寸七分，碑文为正书，字径一寸四分。

九月，苏轼在密州作盖公堂。盖公，密州人，有德于齐。稍后，苏轼作《盖公堂记》，旨在彰显盖公以黄、老清净无为之道治民的丰功伟绩：

始吾居乡，有病寒而咳者，问诸医，医以

为蛊，不治且杀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饮以蛊药，攻伐其肾肠，烧灼其体肤，禁切其饮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热恶寒，而咳不已，累然真蛊者也。又求于医，医以为热，授之以寒药，旦朝吐之，暮夜下之，于是始不能食。惧而反之，则钟乳、乌喙杂然并进，而瘰疬痈疮眩瞀之状，无所不至。三易医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完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从之。期月而病良已。

昔之为国者亦然。吾观夫秦自孝公以来，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镌磨锻炼其民，可谓极矣。萧何、曹参亲见其斫丧之祸，而收其民于百战之余，知其艰苦憔悴无聊，而不可与有为也，是以一切与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参为齐相，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以舍盖公，用其言而齐大治。其后以其所以治齐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称贤焉。

吾为胶西守，知公之为邦人也，求其坟墓、子孙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师其言，想见其为人，庶几复见如公者。治新寝于黄堂之北，易其弊陋，达其壅蔽，重门洞开，尽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绳，名之曰盖公堂。时从宾客僚吏游息其间，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

夫曹参为汉宗臣，而盖公为之师，可谓盛矣。而史不记其所终，岂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欤？胶西东并海，南放于九仙，北属于牢山，其中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致，安知盖公不往来其间乎？吾何足以见之！

蛊，《说文》云：“腹中虫也。”钟乳，即石钟乳。乌喙，亦名乌头、土附子、奚毒。其茎、叶、根均有毒。黄堂，汉太守办事之厅堂，此借指知州办事堂。九仙，山名。牢山，即劳山，亦作崂山，在今山东即墨市东南海滨。有大劳山、小劳山之分，二山相连。洪迈云：“东坡作《盖公堂记》，……是时熙宁中，公在密州，为此说者，以讽王安石新法也。”

同月，诏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事、骑都尉、借紫苏轼移知河中府。河中府属陕西路之永兴军路二府之一，属于次府。

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知江宁府，以吴

充、王珪为相，冯京知枢密院事。苏辙罢齐州掌书记，归京师。

同月，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苏轼亲作祝文再祭常山，昭告常山神封爵。

十一月十五日，苏轼命工摹润州甘露寺陆探微所画师子，置盖公堂中，作《胶西盖公堂照壁画赞》说：

陆探微画师子在润州甘露寺，李卫公镇浙西时所留者。笔法奇古，绝不类近世。予为《甘露寺》诗有云“破板陆生画，青猊戏盘珊。上有二天人，挥手如翔鸾。笔墨虽欲尽，典刑垂不刊”者也。熙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胶西盖公堂中，且赞之云：

高其目，仰其鼻，奋髯吐舌威见齿。

舞其足，前其耳，左顾右躋喜见尾。

虽猛而和盖其戏，置之高堂护燕几。

啼呼颠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陆子！

陆探微，南朝宋画家。甘露寺，在今江苏镇江北固山上。相传三国吴甘露年间创建，唐人李德裕扩建。李卫公，即李德裕。唐武宗时为相，进太尉，封卫国公。

当月下旬，知河中府告命下。苏轼与交往甚密的杭州钱塘县令周邠简，报十二月上旬将离开密州。

苏轼在密州之日，朝廷应汀州太守许当之请，赐已故的高僧定光号定应，苏轼闻讯作《定光师赞》：

定光石佛，不显其光。古锥透穿，大千为囊。卧像出家，西峰参道。亦俗亦真，一体三宝。南安石窟，开甘露门。异类中住，无天中尊。彼逆我顺，彼顺我逆。过即追求，虚空鸟集。驱使草木，教诲蛇虎。愁霖出日，枯旱下雨。无男得男，无女得女。法法如是，谁夺谁与。令若威怒，免我伽梨。既而释之，遂终白衣。寿帽素履，发鬓皤皤。寿八十二，与世同波。穷崖草木，枯腊风雨。七闽香火，家以为祖。萨埵御天，宋有万姓。乃赐象服，名曰定应。

《永乐大典》卷七千八百九十五引《临汀志》说：

“定光，泉州人，姓郑名自严。乾德二年驻锡武平南安岩，淳化二年别立草庵居之，景德初迁南康郡盘古山，祥符四年汀守赵遂良即州宅创后庵延师，至八年，终于旧岩。”又云：“熙宁八年，郡守许公尝表祷雨感应，诏赐号定应。”许当，熙宁九年以朝奉郎太常少卿知汀州。

（下转第40页）

风流文采磨不尽

——苏轼和王诜

许植基

内容提要 本文以苏轼有关王诜的诗文为线索，考察苏轼与王诜的关系、二者交往的过程、二人的情谊及性格特点，并对王诜受苏轼牵连而贬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全面认识苏轼有所裨益。

关键词 苏轼 王诜 交往

王诜，王晋卿，是苏轼研究一个跳不过去的人物。虽说他是贵族公子，又做了皇帝的亲姐夫，和苏轼不在一个档次上。但他能文善画，天资聪颖，艺术品位很高，这一点上他和苏轼有了相交的基础。此人风流，纵情声色，为人并不怎么样，和苏轼并不真正同道，只能算一个另类文友吧。不过，在“乌台诗案”中，和苏轼有一些交集，受苏案牵连而贬官。研究他们的关系，对全面认识苏轼有裨益。

王诜其人

宋《宣和画谱·卷十二》对王诜有极概括的介绍：“驸马都尉王诜，字晋卿，本太原人，今为开封人。幼喜读书，长能属文，诸子百家，无不贯穿；视青紫可拾芥以取。尝袖其所为文谒见翰林学士郑獬，獬叹曰：‘子所为文，落笔有寄语，异日必有成耳。’既长，声誉日益藉甚，所从游者，皆一时之老师宿儒。于是神考（宋神宗）选尚秦国大长公主（同母姐）。诜博雅该洽，以至奕棋图画，无不造妙。写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晓岚绝涧，寒村幽谷，桃溪苇村，皆词人墨卿难状之景，而诜落笔思致，遂将到古人超轶处。又精于书，喜作诗，其风流蕴藉，真有王谢家风气。若斯人之徒，顾岂易得

乎？”王诜是一个风流才子，宋代文人画家的代表人物，与苏轼兄弟交善。

王晋卿，作为一个外戚、一个闲官、一个文人，宋史上没有他的专门传记，只是在他的前辈王全斌及王凯的传记中，附带一句话：“缄（王凯之子）子诜，字晋卿，能诗善画，尚蜀国公主，官至留后。”另外，在《宋史》公主传中提到他，不过全是负面的信息。王诜不被正史所重视，反映了当时和后代对他的评价，以不屑一顾，可能评价有偏差，也可能王诜确实在人品上有瑕疵，所以，连他的生卒时间都搞不清。一个优秀文人被历史、被时代的舆论、也被自己所淹没，惜哉。

苏轼有关王诜的诗文概述

苏轼之于王诜，共计赋诗、赠诗、和诗 18 首，最早的一首《作书寄王晋卿，忽忆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笔为此诗》，在追忆昔日同游的盛景后，东坡吟：“何时东山歌《采薇》，把盏一听《金缕衣》。”时在元丰二年春，东坡外仕湖州，思及老友，乌台诗案尚未发生，但正酝酿中。此后冤案，东坡贬黄州，王诜受累，亦贬，七年不通音讯。至神宗死，哲宗元祐年间，高太皇太后执政，二人都回京师，重新交游，写了大量的唱和诗，东坡勉其志，也有很多戏作。最后一首戏作写于元祐八年。当年，太皇太后死，哲宗尽翻旧案，东坡再次贬出，愈贬愈远，自此，诗作虽多，但无王诜的内容，换言之，王诜从东坡诗文中消失了。在元祐年间，苏轼在王晋卿的诗、画和他收藏的画上题跋多处，留下了最珍贵的苏轼墨宝。

苏轼曾写了大量的尺牍，但很奇怪，致王晋卿只有一残片，说明他们在异地很少或根本没有书信往来。可见，在苏轼最后罹难期间，他们不通音讯。当然，作为公子哥儿的王晋卿不在哲宗的清算之列，但他也许主动回避了昔日的文友，也许，道不同，不相与谋，苏轼主动不牵连到他。更或许，宋代对驸马都尉管束甚严，《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中有许多惩罚驸马都尉的记录。宋仁宗在天圣元年曾下诏“驸马都尉等自今毋得与清要权势官私第往还，如有公事，即赴中书、枢密院启白，仍令御史台常切觉察，如有违犯，纠举以闻。”王诜曾吃过一次亏，这一次他想自保了。

苏轼对王晋卿的深厚感情

在乌台事件以前，苏轼和王晋卿还仅是文字交，惺惺相惜，唱和，互换诗稿，王晋卿还为苏轼印过诗集。乌台事发，王晋卿得知御史们要对苏轼下手，赶紧派人通知苏辙。按例，御史台要收检有关资料，据清代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查慎行注释：“御史台检会送到册子，根勘苏轼为作诗赋谤讪朝廷，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为留轼讥讽文字及上书奏事不实，根勘所结案状。内一条，作诗赋及诸般文字寄送王诜等，致有镂刻印行，各系讥讽朝廷，谤讪中外。臣僚准敕徒二年，情重者奏裁。”根据结案报告，定苏轼讽讪罪的主要依据还是王诜等人上缴的苏轼诗文，但王诜没有早日上交，且与自己上奏的状子不符。同时，王诜已将苏诗文镂刻印行，散布很广。因此，王诜受苏案牵连被贬。

苏轼一直对此事感怀于心，耿耿不安，愧疚之情，多次溢于诗文。元祐元年，高太皇太后摄政，苏轼奉调回京，在殿门外见到王诜，十分激动。赋诗《和王晋卿》，诗序曰：“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功臣全斌之后也。元丰二年，予得罪贬黄冈，而晋卿亦坐累远谪，不相闻者七年。予既召用，晋卿亦还朝，相见殿门外。感叹之余，作诗相属，托物悲慨，厄穷而不怨，泰而不骄。怜其贵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韵。”此时的苏轼，真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七年不相闻，一朝相见，愧疚之情若何。诗中回顾昔日欢会：“先生饮东坡，独舞无所属。当时挹明月，对影三人足。醉眠草棘间，虫虺莫予毒。醒来送归雁，一寄千里目。”书生意气，豪放豪迈。接着叙遭贬中怀念王诜：“怅然怀公子，施食久不玉。”

情深意切。在叙述各自的遭际后，劝勉王诜“羨君真将家，浮面气可掬。何当请长缨，一战河湟复。”一个武职，又是乃武世家，应该为国出力，守边保民。

在一次为王晋卿诗题跋，东坡云：“晋卿为仆所累。仆既谪齐安，晋卿亦贬武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患，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元祐元年九月八日”（《题王晋卿诗后》）苏轼再次对牵累王诜表示歉意，赞美王诜不失其正的表现。

苏轼对朋友的深厚感情是终生的，即使在深受打击、自己的命运漂泊不定时，仍怀念老友。他在最后被流放的岁月里，已经和王诜失联，至少在诗文上失联时，仍不时想起这位老友。他在惠州时，翻出几首元祐三年写的应和诗，其中有一首是和王晋卿一起为李伯时的《天马图》题诗，题目为《和王晋卿题李伯时画马》，诗曰：“督邮有良马，不为君所奇。顾收纸上影，骏骨何由归。一朝见萦策，蚁封惊肉飞。岂惟马不遇，人已半生痴。”这是即兴所作，寻常诗作，当然以马喻人，有寄托。他翻出旧诗，十分感慨，即书写下来，并作跋：“此诗，余以元祐三年戊辰任翰林学士，在贡举试院中作也。谪居惠州。无事。因书于卷末装池。轼，五月二日。”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王晋卿，但此时的苏轼，肯定想起了这位老友，只不过江湖风险，不宜直接提及，用旧事表达眼前的思念。当然，诗中马的遭遇正是他眼前的现实，“岂惟马不遇，人已半生痴”正是他当今的写照。所以，他才郑重其事地书写，郑重其事地装裱。

怀念故友，怀念被贬岁月，是苏轼诗作的一个内容。元祐四年，苏轼《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著色山二首》之二：“君归岭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见春。寄语风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识山人。”王定国是王巩，亦坐乌台案，谪监宾州盐酒税三年；晋卿谪均州三年；东坡谪黄州五年，所以有“三人俱是识山人”句。

苏轼在《和王晋卿送梅花次韵》写道：“仆去黄州五周岁矣。饮食梦寐，未尝忘之。”

文人的性格，率真，烂漫

苏轼和王诜，都是诗人，文人的率真，天真烂

漫的习性在他们身上表现无遗。苏轼给王晋卿的诗作、题跋，很多是戏作，嬉笑随便，无拘无束。诗作十分诙谐，幽默，至于好玩，这当然说明二人交往之深，互相了解之深，也说明文人的性格使然。

元祐二年秋冬季，苏轼《次韵王都尉偶得耳疾》：“君知六凿皆为赘，我有一言能决疣。病客巧闻床下蚁，痴人强覩棘端猴。聪明不在根尘里，药铒空为婢仆忧。但试周郎看聋否，曲音小误已回头。”诗是戏作，开玩笑，但“聪明不在根尘里”却有深意。几年后，东坡从王巩处看到《挑耳图》，云从王晋卿处所得，东坡为之跋《跋南唐挑耳图》，云：“王晋卿尝暴得耳聋，意不能堪，求方于仆。仆答之云‘君是将种，断头穴胸，当无所惜，两耳堪作底用，割舍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晋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颂示仆云：‘老坡心急频相劝，性难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效君不割，且喜两家都平善。’今见定国所藏《挑耳图》，云得之晋卿，聊识此事。元祐六年八月二日，轼书。”这种雅谑，只有东坡才想得出，做得出。

有时，苏轼和王诜像孩子一样调皮，斗气，开玩笑。元祐七年，东坡从扬州召还，与晋卿复相唱酬。元祐七年底或八年初，东坡作《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写了一首很长的古风，先是炫夸海石如何神奇，又叙说王晋卿“风流贵公子，窜谪武当谷。见山应已厌，何事夺所欲。”最后说“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这简直是小孩子家有好东西，吊别人的胃口，又不许别人碰。

这件事在文人圈中闹大了，东坡又作诗《王晋卿示诗，欲夺海石，钱穆父、王仲至、蒋颖叔皆次韵。穆、至二公以为不可许，独颖叔不然。今日颖叔见访，亲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语。仆以为晋卿岂可终闭不予者。若能以韩干二散马易之者，盖可许也。复次前韵》又是一首长诗，继续拉锯战，继续互开玩笑。紧接着，苏轼又是一首《轼欲以石易画，晋卿难之，穆父欲兼取二物，颖叔欲焚画碎石，乃复次前韵，并解二诗之意》，又是长诗，互相逗趣。这等诗作，文人之雅趣，之天真，可知矣。可惜好日子将到头了，其年秋，九月初三，高太皇太后去世，一场比乌台更大的风暴正要袭来。苏东坡将面临更残酷的打击，他和王晋卿的友谊就此告终，至少在诗文上没有酬答了。

高俅的插曲

中国著名小说《水浒》写到了高太尉高俅，此人本是苏轼的小吏，书僮一类人物，但苏轼诗文中从来没有提到他，连宋史也没有正式记载。但论及苏轼和王晋卿，却不能不提起他。

据南宋学者王明清所著《挥麈后录·卷七》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以自好文，故与晋卿善。……至晚，遣俅赉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前来，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意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箠刀之贶，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

这段资料虽是孤证，却是可信的。因为王清明的外祖父曾紓，是曾布（谥文肃公）的儿子，有关资料应该靠谱的，而且时间上也对得上号。高太皇太后去世，苏轼失去靠山，他曾教过哲宗前后有8年，而且比较严厉，深知哲宗会报复他，所以在赴定州（中山）前，他预感危险已到，他是一个忠厚长者，不愿连累别人，包括自己的部属和僮仆，因而事前遣散和安排，使之有个好归宿。苏轼选用的人，应该是有一定本事和特技的。高俅笔札颇工，这是苏轼看重高俅的地方，所以把他荐给曾布，因为曾布是宰执，要实际管事的，需用笔札人材。曾布辞之，才荐给王晋卿，高俅是文艺文娱全才，吹拉弹唱，歌舞，又善刺枪使棍，这正合王晋卿的胃口。这说明苏轼有识人之明，对王晋卿是十分了解的。至于高俅竟以末技蹴鞠得宠于端王，这说明大宋江山，不亡而何？

高俅虽是小人，但他还是知道感恩图报的，他发迹后，苏门子弟入都，高俅“给养问恤甚勤”。算是还情吧。

“不忘在莒之戒”之谜

苏轼和王诜的诗歌交集中，有一首诗很重要，元祐三年，苏轼在王晋卿画作《烟江叠嶂图》上题诗28句，晋卿和之，东坡再和。这首诗关键在于

诗题：《王晋卿作〈烟江叠嶂图〉，仆赋诗十四韵，晋卿和之，语特奇丽。因复次韵，不独纪其诗画之美，亦为道其出过契阔之故，而终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爱之义也》，这诗题明确劝勉王晋卿，不忘在莒之戒，并特别郑重说明，这是朋友忠爱之义。其诗曰：“山中举头望日边，长安不见空云烟。归来长安望山上，时移事改应潸然。管弦去尽宾客散，惟有马埒编金泉……风流文采磨不尽，水墨自与诗争妍。画山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郑虔三绝君有二，笔势挽回三百年……山中幽绝不可久，要作平地家居仙。能令水石长在眼，非君好我当谁缘。愿君终不忘在莒，乐时更赋《囚山篇》。”

这首诗回顾了被贬的痛苦，充分肯定了王诜的艺术成就，劝告王诜，山中幽绝不可久，即尽量避免再次流放，要终不忘在莒之戒，快乐时多读读柳宗元的《囚山赋》，谨慎再谨慎。为了引起王诜的警戒，东坡自注：柳子厚有《囚山赋》。

这首诗传递了什么信息呢？要自戒，要警惕，不能重蹈覆辙，不要忘记流放之苦。那么，王诜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先读一读《宋史·列传第七·公主》：

魏国大长公主，帝（英宗）第二女，母曰“宣仁圣烈皇后”……下嫁左卫将军王诜。诜母卢寡居，主处之近舍，日致膳羞。卢病，自和汤剂以进……

元丰三年，病笃。主性不妒忌，王诜以此自恣，曾贬官，至是，帝（神宗）命还诜官，以慰主意。太后（宣仁后）临问，已不省，后恸哭，久稍能言，自诉必不起，相持而泣。帝继至，自为诊脉，亲持粥食之，主强为帝进食。赐金帛六千，且问所须，但谢复诜官而已。明日薨，年三十。帝未上食即驾往，望第门而哭，輶朝五日。追封越国，谥贤惠。后进封大长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国。

主好读古文章，喜笔札，赒恤族党，中外称贤。诜不矜细行，至与妾奸主旁，妾数抵戾主。（主）薨后，乳母诉之。帝命穷治，杖八妾以配兵。既葬，谪诜均州。子彦弼，生三岁卒。

从这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公主是很贤惠识大体的人，和弟神宗的姐弟感情很深，神宗是因为王诜的私德不好而惩罚王诜的，王诜也确实过于自恣或不矜细行，当着正妻的面，和小妾作爱，纵容

小妾欺高贵的公主，是太过份，王诜的二次被贬，受苏轼乌台案的牵连的因素甚少，他第一次被贬，或许还有一些乌台案的因素，或也只是表面文章或诱因。但第二次是公主乳母告发，他行为确不端，而致使皇帝大怒。苏轼自揽责任是苏轼有担当、豪气、仁者风度。

有佐证

《宣和画谱》是北宋宣和年间由官方主持编撰的宫廷所藏绘画作品著录著作，其可靠性自不待言。《宣和画谱·卷十二》说：“诜至其奉秦国（指公主）失欢以疾薨，神考（神宗）亲笔责诜曰：内则朋淫纵欲而失行，外则狎邪罔上而不忠。抑以见神考取舍人物，示天下之至公，不以好恶为己私也。”这里是赞扬神宗示天下之至公，既是皇帝手诏，臣民咸知，这不是秘密了。

还有，清代嘉庆年间，学者徐松（1781~1848）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代官修会要，名《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影印本，《宋会要辑稿》为后代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官方史料。

《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五十一》：“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诏绛州团练史、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以诜交结苏轼及携妾出城与轼宴饮也。”

这一则可以印证王诜第一次被贬官，也即公主列传中所说“王诜以此自恣，曾贬官”。这一次，东坡有责任的。

《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五十一》：“元丰三年四月十八日，诏前绛州团练史、驸马都尉王诜可将授庆州刺史，许赴朝参。以长公主故，叙诜官以慰其心。”

这一则就是公主列传中“帝命还诜官，以慰主意”，王诜外贬不到半年。

《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五十一》：“元丰三年七月十八日，责驸马都尉王诜为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安置。手诏：‘王诜内则淫朋纵欲，无行（宣和画谱本为失行）；外则狎邪罔上，不忠’由是公主愤愧成疾，终至弥笃。皇太后哀念，累月罕御玉食。撫诜之。”这是王诜第二次被贬，和东坡毫不相干。这是他咎由自取，当公主面与妾奸，以及纵容妾抵戾公主，气死公主的结果。这一去就是三年，后来把这笔账都算到苏轼的头上，是不对

的，有失公允。

《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五十二》：“七年二月十六日，尚书刑部奏：‘责授昭化军行军司马、均州安置王诜已经三年，再遇大礼，赦，合依先降取旨’诏王诜与诸衙将军，颍州安置。”

三年后，刑郎上奏，王诜可以赦回了。但神宗始终没有忘记姐姐的死，不肯赦回王诜，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其实，王诜风流成性，到老弥坚。元符二年（1099），王诜按1036年出生算，是63岁，按1048年出生算，51岁。他还闹了一场笑话。《宋会要辑稿·帝系八·五十四》：“元符二年闰九月六日，诏驸马都尉王诜将罪铜三十斤。以诜隐匿妇人刘氏，教令写文字及虚作跳走迹状。自首不责。待御史石豫曰，诜自持豪贵，抑勒僱人，不畏公法，故有是诏。”

王诜的所作所为，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心知肚明，所以东坡多次委婉暗示王诜，这是朋友之义。

结束语

苏轼之于王诜，是文人交往的一个侧面。文人可以道义交，可以诗文交，他们是诗文交，性格都有豪放浪漫的一面，在个人品质上，王诜的贵公子身份造就了他风流不拘，个人私德有碍。他们的交往，为现代的中国留下了艺术瑰宝，至今，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珍藏的苏轼的书法，王诜的画，都是艺术极品。他们文人相重，这是我们民族的好传统。当然，这交往，体现了苏轼重情重义的情怀，也形象说明了他“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实践。

伟哉，苏轼。

（许植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苏轼离开密州之日，道过常山，山中儿童询问其归期，颇让苏轼感动，故在《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诗叙中提及此事。

苏轼在密州以儒释道三家的理念，怀揣着自己的政治主张施政治民，为了百姓的利益，对新政予以适当修补，可谓有德于密州，故密州人为像于城西彭氏之圃，岁时拜谒。

徽宗时代，出任密州太守的翟汝文曾作文说：“东武俗号朴野，不事藻饰，为肖东坡苏公像于城西彭氏之圃，郡人岁时相率拜谒。”

（王琳祥，湖北省黄冈市赤壁管理处副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上接第35页）

十二月，孔宗翰来代密州太守，苏轼携家眷离别密州，赴知河中府任。

苏东坡与章子厚的交情

葛祥邻

内容提要 苏轼（子瞻）与章惇（子厚），都是北宋时期，名噪政坛和文坛的优秀才子。在长达四十余年的仕途和政坛风云中，经历了早年相友、中年相异、晚年相惜的三个复杂过程。从他们四十余年的交往中，可以看出，大诗人苏东坡，的确是一位豁达大度、不计前嫌的知识分子。

关键词 苏东坡 章子厚 交情

苏轼（子瞻）与章惇（子厚），都是北宋时期，名噪政坛和文坛的优秀才子。他们两个人，一个作为杰出的蜀士，一个作为卓越的闽贤，同年中进士，同朝参政共事。在长达四十余年的仕途和政坛风云中，经历了早年相友，中年相异，晚年相惜的三个复杂过程。

苏东坡遇赦北归，驻足常州之时，曾经得到章惇之子章致平的拜问书。苏东坡在回信中，对苏章二人的交情，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表现了的豁达大度，不计前嫌的超然胸怀，也透射出苏东坡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的伟大程度。

一、蜀闽两地出类拔萃的才子

苏东坡（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宋史有传，是北宋时期伟大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也是世界文化名人。

他出身于四川眉山文献之家。唐代眉州知州，河北栾城人苏味道，是其远祖，他文采盖世，曾在武则天大周王朝任过宰相，有文集十五卷存世。二伯父苏涣，曾是大理寺官员。父亲苏洵，一度也在太常寺礼院任过职务。

苏轼与父亲苏洵，胞弟苏辙，号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中国文学史上的散文“唐宋八大家”的行列中，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两家，

宋六家中，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是“赣（江西）三家”。三苏父子是“蜀（四川）三家”。苏轼的散文，形散神聚，汪洋恣肆，有“韩（愈）潮苏（轼）海”的博大气派。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北宋诗坛的盟主和领军人物。是兼有豪放与婉约特色的著名诗人和词赋大家。有“苏陆（游）”，“苏辛（弃疾）”之并称。其书法，有“苏，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四家”之美誉。

三苏父子，两次进京。轼、辙二人，于宋仁宗嘉祐期间的不到四年之间，在先后的常科科举和特科制举考试中，名列前茅，震动朝野。太后和重臣，都认为发现了治国理政的人才。

苏轼的仕途，以基层任职，凤翔府签书判官为起点，“身行万里半天下”。在八典名郡中，接触实际，熟悉下情。归京内任，作为朝官，两任尚书，三迁侍读。制诰参政，成为国家栋梁，朝廷重臣。

苏轼一生，“勤政报国，益世爱民”，世人评价很高。誉之为“所至之处，悉有善政，诗文书画，俱成大家”，的确，是从蜀地走出来的出类拔萃的才子。

章惇（1035~1105），字子厚，排行七，宋史有传，是北宋有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书法家。他出身于福建建安文献和武备之家族。父辈中的章得象，进士出身，曾为宰相。族兄章粢，曾任会稽、广州、渭州知州，既是著名词人，又是平夏城之战的大元帅。侄子章衡，文武全才，嘉祐二年状元，出使辽国，宴场射箭，环环中的，赢得赞誉。

章惇，性情豪爽，不甘居下。胆气、文采和禅悟书法，与众不同。对长已十岁的大侄子章衡，名列状元，心怀不服。“耻出于侄下”，“一气之下，不受任命”，“委敕而出”，回家复习再举。后来，果然成功进入进士前列。首任便是陕西商州（洛）

令。曾任雄武军（秦州）军事推官。后来，忠心支持王安石变法，绍述新法，七年独任宰相。在尽废新法的旧势力面前，表现了顽强的韧性。章惇，不愧为从八闽大地，走出来的出类拔萃的才子。

二、早年政坛相友

苏轼和章惇，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同年进士，同榜兄弟。而且章惇比苏轼，年长两岁。当称年兄。

而当年夺取状元的章衡，就是章惇的同族侄子。由于苏轼的文章风格，颇似主考官欧阳修的门生曾巩，欧阳修生怕惹来麻烦，故将苏轼的糊名考试的密封卷子，改为靠后名次。

此事一出，引来了苏章二人中进士之后惊人的坎坷仕途。一个是，章惇不满名次，弃任而去，另一个是，苏轼不幸丁母忧，守制三年。

苏轼丁母忧，未赴河南豫西福昌县主簿之职。奔丧归里，守制三年。章惇则不满名次，有隙于报录至门，“侄为状元，叔为进士”的尴尬局面，决意埋头复习，下届夺优。

嘉祐六年，二人殊途同归，再显才华。苏轼以制举第三等，得官凤翔。章惇以进士优等，得官商洛。说也凑巧，他们二人的四十余年的仕途交情，首次任职，都分配在了三秦大地，都是从陕西三秦大地，来开始仕途的起跑。

苏轼在关中西部的凤翔府，担任签署判官，兼掌五曹文书。是从八品官。章惇在陕南东部的武关道上，做商州（洛）令。

他们二人，三年任职届满，于治平元年，曾经有幸与朋友相聚会。与苏旦、安师孟一起，同游终南名区。虽然，苏轼在任期内，曾经在公务巡察时游历过当时属于凤翔府所辖的周至楼观台及仙游寺。但是，他感到只有这次与章子厚同游，是三年连三游中，最为高兴的一次。

章惇在游历中，胆气十足，不惧危径。曾经冒险跨越小桥，大胆挥墨书壁，山崖题留，令苏轼深为惊佩。有的书上说，苏轼根据“能自判者，必能杀人”的古鉴，预测出章惇“日后必能杀人”。

苏、章二人，当年同游楼观题留的书法真迹，如今依然保存在户县草堂寺的碑廊之中。苏轼的题留是：“三年连三至此，然与子厚游，其乐始至也。”

章惇的题署是：“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同游

鳌厓黑水峪黑龙潭。”“间过高观（冠），题于潭东石上。”“旦、师孟二君，留终南回。遂与二君过渼陂。渔于苏君旦之国也。”

他们同游同题、同抒胸臆的举动。充分反映了二人早年相友的情谊。

苏轼在凤翔，曾与章惇有过诗文和书信的友好往来，并且，从商州令章惇那里，得知弟弟苏辙的情况。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未赴商州推官之任。苏轼在诗的自注中说，“乃奏乞，养亲三年，未赴商州任。”

苏轼的《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二）云：“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说客有灵慚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夷音仅可通名姓，癥俗无由辨颈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诗中的“章子”，就指章惇，章子厚。“渠”，即指苏辙。商人，即商州人士。“夷音”和“癥俗”，皆为章惇信中，所反映的商州语音和颈疾。

由商州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同情、怜悯百姓疾苦，以诚相见，无话不谈的早期友谊。

三、中年政见相异

宋朝是一个提倡“开卷有益”、文士大展才能的时代，也是一个企图通过改革，实行新政，改变“积贫积弱”局面的朝代。一大批通过科举考试的优秀知识分子参加到治国安邦的行列。

特别是，嘉祐二年中进士的群彦之中，出现了蜀地两苏，闽地章惇、章衡、吕惠卿，秦地张载等杰出人才。其中，以苏轼与章惇之间，长达四十余年的政坛生涯的爱恨情仇，表现得最为复杂多变，最为突出典型。

用苏轼的话语概括来说就是：“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

（一）苏轼和章惇，在中年漫长的仕途上，多次政见相左。特别是在变法的实效和操作方法上，观点迥然不同。

章惇在政坛上，做了五件要事：一是在神宗朝，积极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在三司条例司，具体负责新法起草和制定。二是反对垂帘听政的皇太后与宰相司马光，尽废新法。三是哲宗朝，七年独居相位，续荆公遗愿，竭力复兴变法。四是公开反对选端王赵佶即位天子。五是决意进行对西夏的战役，

击败西夏三十万大军，取得平夏城大捷。废止了年年的进贡，安定了西北边境。

苏轼在政坛上，也做了五件事情。一是不赞成王安石不顾惠民实效的猛烈变法。二是不满宰相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三是竭力反对章惇为相期间，对旧臣的残酷打击和无情迫害。四是在知徐州任上，领导了一次成功的全城抗洪救灾大事。五是对徽宗即位，感激遇赦，表示欣慰，寄有希望。

至于在地方基层任职期间的具体善政，此文不再一一罗列。

显而易见，苏章二人，在政治道路和观点上，表现了“出处稍异”的不同立场。

在王安石变法中，章惇是熙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哲宗亲政后，七年独居相位，继续推行没有王安石的后王安石时代的激进变法主权威。

苏轼从多年基层任职的实际经验中，对王安石的美好愿望，是肯定的。但对激进变法的惠民实效，与章惇等人，存有不同政见。对于章惇全面推行新法和司马光尽废新法的做法，表达了与人不同的观点。在新旧两党夹击的漩涡中，承受了来自两种政治力量的不公正的对待。

苏轼与章惇，关于个人交情和州郡政事，还有过许多书信来往。比如，熙宁十年四月，章惇再知湖州。五月丁母忧，苏轼曾有致信慰问。并有论及时事的表态之言。元丰元年二月，关于徐州利国监矿区捕盗一事，苏轼还上书章惇参执政，建议引起朝廷关注。

（二）章惇曾经一度在对苏轼的政治态度中，扮演过有损友谊的角色。

在“乌台诗案”中，虽然章惇在与神宗皇帝和朝臣王珪（禹玉）的当场议论中，同情苏轼，反对以言毁人家室。对仅以“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句诗文，定罪“诽谤朝廷”的做法，持有异议。并且，认为自古君臣皆可称龙。还批评王珪说：御史“之睡，亦可食乎”。认为不应该将言官的唾沫，来当饭吃。在众臣的相救下，苏轼得以免死，被贬黄州。在此时之中，看来章惇积极相救，出力不小。

但是，在章惇为相的整个过程中，却有不少地方，也曾经一度恃势，不容苏轼。有的书上说，苏轼被贬岭南惠州，因一首“报道先生春睡足，道士轻打五更钟”的诗句。被人上传于时任丞相的章惇耳中。于是，这位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章郎，果然动起埋怨之心，将苏轼贬往海南儋州，让其见

识见识那里的春梦婆婆。要知道，在当时，这种惩罚，仅仅次于满门抄斩的罪罚。

但是，苏轼又一次逃过了这场生死大劫，并与当地汉黎百姓士人，友好相处。成为受人尊敬的东坡先生。直至遇赦北归。平安到达阳羡常州。

（三）苏章二人，在四十余年的政坛生涯中，各自也是命运乖舛，多次身罹贬谪。

章惇在政坛，共遭五次贬谪：

其一，熙宁八年，王安石与吕惠卿交恶，迁怒于章惇，贬章惇于湖州外任。

苏轼有一首《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诗，写得很好。有人说，章惇见诗后，认为有讥讽其身世的地方。

但观罢全诗，并无此意。第一首诗的核心是二人早岁谈论归休与报效君恩的长话相知。第二首是对养生之道术、内外丹之功用，以及淡薄功名、善于进退出处的自我理解。

这两首诗是：

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绛阙云台总有台，应须极贵又长生。
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
雪水未浑缨可濯，弁峰初见眼应明。
两卮春酒真堪美，独占人间分外荣。

还有一首《次章子厚飞英殿留题》诗，也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知之情。

其二，元丰四年，被御史朱服泄密和父亲强占民田一事牵扯，贬知蔡州。

其三，元祐元年，司马光主政，更改新法，章惇从枢密院罢职，外知汝州。

其四，元符三年，徽宗立，先封章惇为申国公，知越州，潭州安置。接着，建中靖国元年，追贬雷州，徙居睦州。

其五，高宗朝，又追贬昭化节度副使，明令子孙不得入朝。

苏轼在政坛，也遭受过三次谪贬：

其一，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

其二，不满章惇加害旧臣，被贬惠州团练副使加管带。

其三，一首春睡诗句，又贬海南儋州。

这三次劫难，虽然遭罪无数，但是，闲暇无事，也给苏轼带来了文学发展和成就功业的宝贵机会。所以，苏轼在晚年游金山寺时，《自题金山画像》时写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也是苏轼一生，文学成就大于政事成就的客观原因。

在此阶段，他们两人，虽然各自进退“出处”，稍为有异。但是，这种地位变化，并未影响彼此之间的交情。诚如苏轼所言，一切如旧，中间“并无增损”。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高尚的人际交往典范，也是苏东坡最受人们尊敬与喜爱的地方。

四、晚年出入相惜

苏轼晚年脱难苦海，章惇晚年罹难海康，老朋友擦肩而过。东坡遇赦北归京口，章惇遭贬，发往海康（雷州）。苏轼是从章惇之子章致平的拜访求见信中，才知道这件事情的。章惇曾经竭力反对立徽宗为帝。所以，徽宗上台，他便遭此大厄。苏轼对此，感同身受，十分同情章惇晚年的遭遇，毫无幸灾乐祸的心意。

苏轼晚年致章致平信，是苏轼一生中的书信绝笔，也是当事人对苏章定交历程的公允评定。信中言语，充分表现了苏轼对朋友的豁达胸怀。连林语堂先生读后，都感叹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仁爱情怀的表现。

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中记载：“东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还至京口。时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书抵先生。”

从往来书信中，反映出章援，在家庭遭受大难之中，诚惶不安、六神无主的复杂心态，以及与苏轼老亲再续九年门墙之情，乞请老亲，得势勿报复的惴惴不安。

在这里，老亲，还指苏章两家的亲戚关系。章惇的外甥女，即黄实的女儿，嫁于苏辙的三儿子为妻。一边是章家舅舅，一边是苏家大伯。故称老亲。

老亲苏轼，胸怀宽广。在回信中，则充满了安慰和关照之情。“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并且表示，应该不计前嫌向前看。明确认为“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已经过去的事情，再说也是无益，不如说些还未发生的事

情才好。关注目前和未来，才是有益的做法。全信内容如下：

某顿首致平学士。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得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又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广舟，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只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外物也。（舒州李惟熙丹，化铁为金，可谓至也，服之皆生胎发。然卒为痈疽大患，皆耳目所接，戒之！戒之！）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欲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所云穆卜，反覆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为幸，更徐听其审。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某顿首再拜。致平学士阁下。六月十四日。

苏轼在信中，尊称章惇为丞相，尊称致平为阁下，十分谦虚。对章惇“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表示同情。

并且，叮嘱章援，这位三公子，有五件事情，要认真去做。首先，海康风土不甚恶，好于海南，不必过忧。也无须穆卜求问吉凶。其次，多带些常用药物，既足自用，又能济人。再次，丞相知内外丹气功，可自养内丹，不要乱服外药。第四，拟抄自作《续养生论》，以备参用。

可惜，不久，苏轼就与世长辞了。

从苏子瞻与章子厚的四十余年的交情增损历程中，可以看出，大诗人苏东坡，的确是一位豁达大度、不计前嫌的知识分子。

（葛祥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宝鸡市周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古代朝鲜文人拟次苏轼辞赋论析

杨昊

内容提要 拟次之作，即拟效或次韵之作。古代朝鲜文人对苏轼的《赤壁赋》、《后赤壁赋》、《松醪赋》和《食胡麻赋》均有拟效和次韵之作。这些拟次作品思想内容上重在强调与苏子内在精神的沟通，体验苏轼豁达、乐观、自由的境界，而较少拘泥于对其赋文字句的模仿。总体上，古代朝鲜文人的拟次之作往往在语言艺术上和苏子差距甚远，注重议论的叙述，缺乏艺术形象的塑造，达不到韵味深远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苏轼 朝鲜 辞赋 次韵 拟作

苏轼（1037~1101），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其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以至于医疗、烹饪，都取得了不小成就，几乎是一个全才。不仅如此，其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以及独特的人格魅力都为不少后世文人所景仰与模范。

一、苏轼及其赋作与古代朝鲜

由于宋朝与高丽的频繁往来，苏轼的诗文很快流传到古代朝鲜，掀起了“学苏”热，高丽末期的李仁老（1172~1230）在诗中赞叹苏轼说：“苏子文章海外开，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为灰烬，落落雄名安可焚。”^{(1) 34}李奎报在《答全履之论文书》中说“且世之学者，初习场屋科举之文，不暇事风月，及得科第，然后方学诗，则尤嗜读东坡诗，故每岁榜出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足下所谓‘世之纷纷者’是已。其若数四君者，效而能至者也。然则是亦东坡也。如见东坡，而敬之可也，何必非哉？东坡近世以来，富赡豪迈，诗之雄者也。”⁽²⁾由此可见苏轼当时在古代朝鲜士人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

苏轼的文学作品乃至一些行为方式都受到

了古代朝鲜文人推崇与争相模拟，苏轼的赋作也不例外。四库全书本《苏文忠公集》收有苏轼以赋名篇的作品28篇，包括为人们广泛熟知的名赋前后《赤壁赋》。所谓拟次之作，即拟效或次韵之作。拟作，即仿照原作的形制或内容创作的新作品，次韵之作即按照原作的原韵、原字和次序相和而创作的作品，次韵本是和诗的一种方式，但作为讲究韵律的辞赋作品，文人们也创作了大量次韵作品。《韩国文集丛刊》中，古代朝鲜文人对苏轼赋作的拟次创作有7篇，主要集中在苏轼的《赤壁赋》、《后赤壁赋》、《松醪赋》和《食胡麻赋》，分别是赵缵韩《赤壁赋》、《反赤壁赋》，朴弘美《清江赋》，李敏叙《续松醪赋》，崔锡鼎《次续松醪赋李西河彝仲丈为南子闻作，属余和之》，洪奭周《续赤壁赋》和成海应的《食姜赋》。值得注意的是，对苏轼赋作的拟次，相比于对其他中国赋家作品拟次重在文辞的模拟而言，古代朝鲜文人更强调与苏轼精神的沟通，注重对苏轼人格、精神境界的推崇与评说，尤其表现在对苏轼前后《赤壁赋》的拟次上。

二、古代朝鲜文人对《赤壁赋》的承继

“汉大赋的景物描写，往往巨细必陈，以满足人们神游笔下景物的心理需求，魏晋小赋渐趋追求文外之象，唐代辞赋则以景物描写的传神入画为旨归。北宋以来，辞赋的景物描写偏于寓理于景，苏轼将此追求升华为勾勒象外之境，以蕴含人生感悟，将辞赋的景物描写推上一个物我两不相忘的新境界。”^{(3) 119}苏轼的《赤壁赋》便是典型代表。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一待便是五年。这期间，苏轼的思想是矛盾复杂的，既对自己的遭遇感到愤懑，同时又借助佛老思想来宽慰自己，以

求解脱。《宋史·苏轼传》载：“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寄情山水，在于田父野老的交往中，思想更趋现实，走向豁达与自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苏轼于1082年秋、冬两次游览了黄州赤壁，写下了千古名篇《赤壁赋》、《后赤壁赋》。

《赤壁赋》描写了赤壁秋夜中的美景和与客人夜游赤壁的兴致，之后通过对明月、江水的变与不变展开了哲学思考，“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表现出苏轼旷达的胸襟与生活态度，展现了情、景、理的完美结合。《后赤壁赋》描绘了冬夜的赤壁江岸，渲染江岸山间的凄凉气氛，并写独自登山、客不能从的凄凉心境，以“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结尾，表现了苏轼幻想脱离尘世又无法摆脱现实的矛盾和迷茫的内心。《赤壁赋》重在说理，而《后赤壁赋》的重在写景，所以，古代朝鲜文人对前后《赤壁赋》的拟次之作重点在于前《赤壁赋》。对《赤壁赋》的拟作中，有的作品承续苏子遗风，解读苏轼《赤壁赋》中的哲理，有的则“反案为文”，各具特色。

朴弘美的《清江赋》便是一篇进一步解释苏轼《赤壁赋》中哲理的拟作。朴弘美（1571~1642），初名敬立，字君彦、直哉，号灌圃，少有文才，弱冠之年便与李植、郑弘溟、权韡、任鑛齐名。1605年，登增广文科，秉承文院为正字。后历任兵曹佐郎、大同察访、正言、持平、兵曹正郎、修撰、校理、应教、正言、献纳等官职。1622年，“壬戌月沙李公为傧使，极选文士为从事，公亦与焉。及诏使之回，随行至安州。时秋七月既望也，与诸公泛舟游于清川江。作《清江赋》。读之者以苏子《赤壁赋》并称。诏使将还，公诗以赠别，使大加叹赏曰：词意俱到。”^{(4) 115}朴弘美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了《清江赋》，万历皇帝看到《清江赋》后给与了很高的评价：“批以犹胜于《赤壁赋》。”并给与了丰厚的赏赐。《清江赋》全文如下：

灌圃子与客游于清江之上。时维孟秋，岁则壬戌。月盈而望，旬有五日尔。其东接沮水，南注溟渤。北瞻铁瓮，经营乎莽荡之野。西通鸭绿，发源乎香炉之峰。丹崖拥而壁立兮，波

潋滟而相春。粉蝶缭以周遭兮，纷照曜乎江中。出鲁阳而长迈，观夫浩浩而无穷。于是劈沙棠以为舟，削木叶以为棹。锦缆兮牙樯，挹清光兮下前浦。乍沿洄而容与，云余济乎西浒。

于时星汉左转，北陆南回。碧梧始落，金风西来。白露降而空兮，素月腾而流天。九州岛迥以混漾兮，玉宇廓其渺绵。天与水而相涵兮，成一碧之茫然。揽颢气而盈襟，欲轻举而翩翩。遂沉吟乎齐章，终殷勤乎陈篇。江娥而出而歌舞兮，冯夷又从而蹁跹。尔乃移舟于桂若之洲，扣楫乎沧浪之中。波恬浪静，夜寂山空。渔歌互应，客有携玉箫而来者。沙禽乱飞，声浏亮其凄悲。泉客为之泣珠，蛟人为之罢织。游鱼仰而窃听，贾客闻而太息。四座潜然而泣下兮，遂变乐而为哀。强引杯而相属，心怊怅而徘徊。

时序忽其不淹，春与秋其代谢。叹美人之迟暮，忧思郁其不写。蟋蟀鸣而啁啾兮，鴈流哀于江渚。草木欲其黄落兮，哀众芳之先扬。矧王事之靡苦，缅驱驰于原湿。路修迥而多艰，悲旧乡之拥隔。音尘旷而日远，关塞杳而无极。江流日夜而东逝兮，共归心而绵邈。属良辰于天末，忆胜赏于苏仙。觉往事之如昨，几壬戌之人间。惟物色之分留，历千古兮一般。

念今日之邂逅，天所餉于吾侪。虽复人非苏子，地非赤壁。山川隔阂，时序迁易。然其陵轹江山，啸咏风烟。悠然自适，得于天则一也。至于叹周郎之英概，思孟德之赋诗，非苏子骋怀于今古而感慨于兴衰者乎？若乃感乙支之雄勇，忆隋煖之败绩，非清江旧迹之可寻而事类于赤壁乎？呜呼！月色无恙，风光依旧。买不用于一钱，用不竭于千龄。苏子得之于耳者，吾亦得之而为声。苏子寓之于目者，吾亦寓之而成色。非苏子所谓造物者之无尽藏乎？且夫百世一朝，万劫一尘。孰为今世，孰谓古人。谁为之后，谁为之先。一气往复，变化而蟻。安知吾辈不生于古，而苏子不死今也。非苏子所谓物与我皆无尽者乎？然则不必思古而悲今，不必伤离而怨别。语其寄也，天地逆旅。语其同也，四海吾与。又安知他乡之可悲兮，故乡之可思。独恨夫九阙如海，长安杳兮日边。四郊多垒，胡尘起而蔽天。顾西塞而胆裂，瞻北极而眼寒。乐不可纵，游不可盘。因诵谢希逸之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不可还，霜沾人衣，遂辍棹而归。

万历皇帝登览此篇，批以犹胜于《赤壁赋》。赏赐七书各一帙黄白玉壶及杯各一双，子孙世守为宝焉。

《清江赋》开篇记叙作者和客人在清川江上游览和时间：“灌圃子与客游于清江之上。时维孟秋，岁则壬戌。月盈而望，旬有五日尔。”接着以开阔的视野描绘了清川江的面貌：“其东接湧水，南注溟渤。北瞻铁瓮，经营乎莽荡之野。西通鸭绿，发源乎香炉之峰。丹崖拥而壁立兮，波激滟而相春。粉蝶缭以周遭兮，纷照曜乎江中。出鲁阳而长迈，观夫浩浩而无穷。”以宏观的视角俯视清川江，从其发源、走向、整体气势等方面描绘清川江，显得大气磅礴。随后转向江面景色的描写：“碧梧始落，金风西来。白露降而空兮，素月腾而流天。九州岛迥以滉漾兮，玉宇廓其渺绵。天与水而相涵兮，成一碧之茫然。”显得澄净空彻，静谧清净。在这样的美景中吟咏《诗经》，水神也来助兴，翩翩起舞，随后“客有携玉箫而来者”，如仙境一般的清川江上，响起洞箫之声，赋中以“沙禽”、“泉客”、“鲛人”、“游鱼”、“贾客”的反应来表现箫声的凄凉悲切、悠远绵长，箫声将众人的情绪“变乐而为哀”，引发了作者关于“时序不淹、春秋代谢”的感慨，由时光的感慨转而感慨“王事”，随后由所见之景，联想到苏轼的《赤壁赋》中关于变与不变的议论，并阐释了作者自己的思考，这也是《清江赋》中最为出色的地方。作者感叹今日所见之美景，都是上天给予的赏赐，所游之人并非苏子，所游之地并非赤壁，虽然山川相隔、时序变迁，但是都超越江山，歌咏美好风光，悠然自适，感受天人合一的境界。

“至于叹周郎之英概，思孟德之赋诗，非苏子骋怀于今古而感慨于兴衰者乎？若乃感乙支之雄勇，忆隋炀之败绩，非清江旧迹之可寻而事类于赤壁乎？呜呼！月色无恙，风光依旧。买不用于一钱，用不竭于千龄。苏子得之于耳者，吾亦得之而为声。苏子寓之于目者，吾亦寓之而成色。非苏子所谓造物者之无尽藏乎？”结合苏子《赤壁赋》中对周瑜曹操的典故，联想到高句丽将领乙支文德大败隋军的往事，感慨今日清川江的游览类似于当年苏子的赤壁之游。苏轼《赤壁赋》中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为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所以朴弘美在《清江赋》中感慨所见之风光就是苏子所说的“造物者之无尽藏也”。随后，作者进一步阐发常与变的哲理：“且夫百世一朝，万劫一尘。孰为今世，孰谓古人。谁为

之后，谁为之先。一气往复，变化而嬗。安知吾辈不生于古，而苏子不死今也。非苏子所谓物与我皆无尽者乎？然则不必思古而悲今，不必伤离而怨别。语其寄也，天地逆旅。语其同也，四海吾与。”久远的岁月恰似一瞬间，何为今世，何为古人？谁谓后，谁谓先？混沌之气循环往复，变化转换。怎么知道我不生活在古代，而苏子不死于今世？这就是苏子所说的“物与我皆无尽者”，这是从人类整体的视角而言的，从人类的历史长河看，每个个体作为人类的一份子，都无所谓先与后，今世与后世，生生不息，这就是所谓的“无与我皆无尽者”。从这种大的视角上看，“不必思古而悲今，不必伤离而怨别。语其寄也，天地逆旅。语其同也，四海吾与。”这就和苏子“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有异曲同工之妙，表现出一种豁达与博大的胸襟。和苏子类似，这种齐物我、等生死、同悲喜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道家的影响，属于老庄的思想。然而，《清江赋》在表现出这种物我相融之境后，朴弘美又回归到儒家的“正统”上来：“又安知他乡之可悲兮，故乡之可思。独恨夫九阙如海，长安杳兮日边。四郊多垒，胡尘起而蔽天。顾西塞而胆裂，瞻北极而眼寒。乐不可纵，游不可盘。”为皇宫深如海，不能伴随君王左右而感到遗憾，担忧国事。最后以谢庄《月赋》中的“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作结。夜月初上，于是众人辍棹而归。

朝鲜文人朴弘美效仿苏子夜游赤壁，拟照《赤壁赋》创作了《清江赋》。《清江赋》模拟了《赤壁赋》的词句、主题、结构。同时也体现了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其阐释《赤壁赋》中常与变的关系后，并未将论述的主旨集中于此，而是突出表现其忧国之心。这是由苏轼与朴弘美二者处境与思想基础的差异所决定的。苏轼在黄州创作《赤壁赋》处于被贬期间，其愤懑与愁苦的内心需要在佛老思想中寻求寄托，排解苦闷，超越现实的烦忧，构筑起独立于客观世界和人生遭际之外的精神世界。并且，苏轼在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希望做出一番事业，写下了“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孤馆灯青》）的词作，但是经过多次挫折后，苏轼逐步“摄取佛禅思想的内在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思想境界和文化人格，在人事纷扰的世间求得精神的超越和生活的闲

适。”^{(5) 79}而朴弘美则不是这样。朴弘美创作《清江赋》时正值出使明朝期间，处在仕途得意的阶段，明朝的“万历皇帝登览此篇，批以犹胜于《赤壁赋》。赏赐七书各一帙黄白玉壶及杯各一双，子孙世守为宝焉。”此外，朴弘美从小接受的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熏陶，少有老庄思想的影响，始终饱含昂扬的淑世精神，所以在《清江赋》中仅仅是将游清川江与游赤壁联系起来进一步哲理性地阐释了苏轼《赤壁赋》中常与变的关系，最后还是将着重点落在忧怀王事的儒家正统思想上。

这类顺承苏子《赤壁赋》意旨，希望与苏子精神相通的赋作除了朴弘美的《清江赋》，还有洪奭周《续赤壁赋》。其《续赤壁赋》中言：“子不知是岁之为壬戌而是日之为七月既望欤，子独不闻乎千载之前有以是岁是日而泛舟于黄江之上者欤？”

“岂不知夫奎璧精英之钟，海岱清淑之酿，是亦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彼固子与客之所共乐，斯又吾与子之所共得。苟余神之相交，亦何恨乎旷百。”深切的表达了希望通过模拟苏子游赤壁而创作《赤壁赋》的形式来获得苏子的内心体验，实现与苏子精神相通的目的。

三、古代朝鲜文人对《赤壁赋》的“反案为文”

除了顺承、进一步阐释《赤壁赋》内蕴的这一拟作，还有对《赤壁赋》的反案为文之作，较为有代表性的是赵缵韩。赵缵韩现存对苏轼《赤壁赋》的拟作有两篇：《赤壁赋》和《反赤壁赋》。

赵缵韩（1572~1631），字善述，号玄洲，善诗赋。李植《玄洲集序》曰：“国朝敦尚经训，文辞尔雅，韩苏之间，以近为范，而秦汉诸家宏丽之体尤未备也。逮隆、万以后，作者数公一大振之，以时继而和之着，有玄洲赵公，蔚为名家，其学于古无所不窥，故其文于古无所不备……光景高朗，才干环纬，其纵横奔放，若不歌畔岸，而融化屈折，各有题材”⁽⁶⁾（《玄洲集》卷首）。赋作家赵缵韩文采出众，才学经纬，特别擅长诗歌赋作，深领楚汉六朝遗法。赵缵韩的《赤壁赋》写于庚申岁（1620年）九月，是赵缵韩通过舟游赤壁希望与苏轼舟游赤壁进行精神沟通的一种方式。赵缵韩的《赤壁赋》中，先描写石壁之景：“刺镜面而遐邈，览形势之纡直。执卮酒以相酬，流左右而游目。纷锦累而绣堆，杳霞连而雾属。远而望之兮，龙鳞之照烂。近

而察之兮，惊虎豹之藏蹲。雕山骨之戍削兮，琢云根以颓迭。恍如女娲之所炼兮，塞天窦而余素质。又如大禹之所凿兮，决龙门而河道辟。若非鬼运而神输兮，畴克岸委而崖积翠。”从不同角度描绘了石壁的奇特景观。随后，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开始讨论石壁造化之意：“于是先生执酌流眄，嘵然长叹曰：厥初开张，孰主张是。其始茫茫，我昧斯理。若以设此者，为有意于固国。崤函汉方兮，无奈秦楚之亡。若以设此者，为无意于固国。胡然周遭兮，屹若长城与巨防。况箕檀至于济丽兮，孰有恃此以威敌。纲先朝蠶子之充斥兮，惨王师望风而鱼肉。至今江波之呜咽兮，想魂悲而鬼泣。天之设此抑何意欤？”先生（主）从历史的角度探究石壁的功用。设立石壁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国防，可崤山、函谷关都没能阻挡秦楚的灭亡，若设立石壁的目的不是为了巩固国防，为何从箕檀到济丽，石壁都发挥了它御敌的作用。石壁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在这里，作者没有给出答案。接着，赋中写到：

客有出位者，应声答曰：以余所料，似非偶耳。今者昧朝，木道将启。天乃晦冥大雨，以风倒海翻山。混混蒙蒙，江商下碇。陆旅止辖，船于此地，神所难卜。然而先生犹且怡然，不以为惑。回风止雨，如叱老仆。爰开爰霁，曾不瞬息。既申之以晴景，又重之以明月。秋江净兮如练，壁色露兮无隔。榜人喜兮棹讴发，芳酒御兮嘉蔬错。江妃出兮水神嬉，巢鵠起兮潜蛟跃。岂非神明之默佑，快先生之清赏。俾挥毫而摛藻，摸胜区之景象。答造化于千古，有今日之高躅。是知先乎苏子几千年兮，无是作于赤壁。后乎苏子几千年兮，亦无作于赤壁。然则天之创赤壁，非为吴蜀也，为苏子也。安知今之有石壁，非为历代固国而威敌，只为先生一言而设也。

客认为，石壁的出现并非偶然。然后描绘了一个具有神力的先生（主）的形象，先生能够在风雨之中怡然自得、不以为惑、息风止雨。随后描绘出了一幅清标可赏的美景：“秋江净兮如练，壁色露兮无隔。”并以“榜人”、“江妃”、“水神”、“巢鵠”、“潜蛟”等事物侧面描绘雨后赤壁之美景。面对如此美景，先生于是有感而发，“挥毫而摛藻”，写就了赵缵韩的《赤壁赋》。由此联想到黄州赤壁与苏子的关系“是知先乎苏子几千年兮，无是作于赤壁。后乎苏子几千年兮，亦无作于赤壁。然则天之创赤壁，非为吴蜀也，为苏子也。”黄州赤壁的存在并非为了吴蜀，而是为了苏轼创作《赤壁赋》，这里

将赤壁文学化、将苏轼的《赤壁赋》永恒化了。由此联系先生（主，即赵缵韩）游石壁与写作《赤壁赋》的关系：“安知今之有石壁，非为历代固国而威敌，只为先生一言而设也。”石壁只为先生之一言。通过将赤壁与苏轼《赤壁赋》的关系类推到石壁与赵缵韩《赤壁赋》的关系，将“石壁游”作为“赤壁游”的延伸，来实现赵缵韩与苏子精神的相通。

然而，两年后，壬戌（1622）之秋，到了苏子赤壁之游的壬戌之年，赵缵韩却对效仿苏子游赤壁这件事情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写下了更富韵味的《反赤壁赋》。《反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反案为文，通过对时人兴游“赤壁”，揣苏子之迹之风的感叹，表达作者对苏子旷世孤怀的理解，对苏赋传布海东的反思，抒发作者对旷达情怀的追求以及对庄子式的超脱自然境界的向往的思想感情。其全文如下：

壬戌之秋，余在商邑。如有不豫，卧吟村榻。客有自外者，劝余持酒浮舟于洛曰：“今兹岁纪，属于壬戌秋之既望。又值此月，此非苏仙游赤壁之夕欤。是用骚林墨坛好事之徒，莫不提壶挈榼，争泛江湖者。盖以是月与日，岁常有焉。难遇者年，百岁忽然。佳期易还，时不可失。盍从我而游洛，踵前修之奇躅。”余乃听然露矧，应声而笑曰：

“向者苏子之游，初非择年于今岁。又非卜夜乎今日，又非选胜于赤壁。又非倍兴于此夕，偶然作赋于前后，便成胜迹于千亿。苟有苏子之名之大，又有苏子之才之逸。虽非今岁之岁，虽非今月之日。虽非赤壁之游，随所游之胜迹。

今者既无苏子之大名，又无苏子之逸才。徒务袭其年月，欲踵美而追怀。虽使载酒百瓮，鼓吹十行。浮万斛之舟，建千尺之檣。乘满空之风，张蔽海之席。出苍梧而浮孟渚，掠渤海而漂碣石。历桑若兮寻蓬瀛，舞清飙兮歌素月。苟无苏子之所赋，等井蛙之自多。迹虽胜而且奇，人孰闻而知耶？

今客不反其本，徒欲逐末。客之好名，不几惑欤。而况以赤壁之游，揣苏子之迹。欲以记胜，只露其阨。既无取乎苏子，又何慕乎赤壁！

尝念中流玩景，出于自然。吊古兴怀，亦所必然。何自哀其短生，漫托美于江水。爰一宽，近妇人而女子。

况乎清风自风，明月自月。江自江兮山自山，苏自苏兮客自客。又何必取之而用之兮，

为自家之玩物。是知区区于死生之际，屑屑于取舍之间。此余所以哀苏子之阨，而并与赤壁而为阨者焉耳。

余方以大气为舟，以至理为楫。以黔羸为蒿工，以造化为宾客。刺乎漭沆之口，涉乎混茫之洋。浟浟横骛乎寂寞之滨，泛泛中流乎无何有之乡。将落帆于大道之窟，且下碇于玄牝之门。奚暇与客游洛之滨，况风利不得泊也。”

谨谢客，客于是怃然失色，逡巡避处，乃逸而遁，杳不知所。

谢枋得曾谈及他读《赤壁赋》的经历说：“余尝中秋夜泛舟大江，月色水光与天宇合而为一，始知此赋之妙。”⁽⁷⁾可见，通过效仿苏子船游赤壁的形式更容易获得苏轼当年的精神体验。所以古代朝鲜文人大多通过这种方式去与苏子获得精神共鸣。

《反赤壁赋》首段写客从外来，邀先生（主）在苏子当年游赤壁的日子出游，去追寻苏子的足迹。随后，先生（主）从多个层面否定了这种只在形式上效仿前修的做法。当年苏轼游赤壁，并非刻意选择壬戌之秋那一天，也非刻意选择赤壁，只因苏子的才气与《赤壁赋》的闻名，才使得壬戌之秋与赤壁闻名天下。今人在壬戌之秋效仿苏子出游，既没有苏子之才，也没有苏子《赤壁赋》那样的文章，所以只能是舍本逐末。此外，对于苏轼《赤壁赋》中“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种哀生叹死的情绪“近妇人而女子”，因为“中流玩景，出于自然。吊古兴怀，亦所必然”，没有必要表达这种情绪。另外，针对苏轼“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为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赵缵韩认为清风、明月、江山都是为其本身而存在的，不应“取之而用之兮，为自家之玩物”。因此，赵缵韩给予了苏轼《赤壁赋》“区区于死生之际，屑屑于取舍之间”的评价。所谓“反赤壁赋”，即与《赤壁赋》的题旨形成对立，而实际上，“反案为文”之作往往是貌离神合，就如扬雄的“《反离骚》，非反也，合也。”赵缵韩的《反赤壁赋》同样如此。

首先赵缵韩反对将追怀苏轼之游赤壁形式化，希望在精神内涵上去取得对苏子旷世孤怀的理解，强调实质与精神层面的追慕。其次，认为哀生叹死的情绪“近妇人而女子”，是针对苏子《赤壁赋》中“客”的观点，而非苏子（主）的观点。对苏子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发诘，认为苏子以“取用”之心去衡量外物，在心灵上难以超脱。对这一点，赵缵韩选择的方式是“余方以大气为舟，以至理为楫。以黔羸为蒿工，以造化为宾客。刺乎漭沆之口，涉乎混茫之洋。漱漱横骛乎寂寞之滨，泛泛中流乎无何有之乡。将落帆于大道之窟，且下碇于玄牝之门”。将以造化之气作为方舟，以真理作为舟浆，以造化之神作为船工，以大自然作为舟上的宾客。驾着船航行在广袤无边的大江和浩瀚无垠的海洋之上，随着水流放纵奔驰漂流那寂寞的水边和空无所有的地方。又将在大自然的洞穴落下帆席，在生养天地万物的门户停泊。“泛泛中流乎于无何有之乡”出自《庄子·逍遥游》“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成玄英疏曰：“无何有，犹无有也。莫，无也。谓宽旷无人之处，不问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乡也。”“落帆于大道之窟”出自《庄子·天下》：“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下碇于玄牝之门”出自老子《道德经》：“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山谷是空荡的，所以用山谷来形容大道的虚无，大道虚空生养万物，其精髓就是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此三处皆引自道家关于天地万物来源“道”的论述，表达自己崇尚自然、崇尚“道”的精神，“自然”非客观物质性的“自然界”是一种状态自然而然的“本真”，对庄子逍遥无为境界的追求，在一定层面上与苏子“造物者之无尽藏”的道家思想相合。由此可见，《反赤壁赋》其终极目的也是为了和苏子实现精神上的契合。

四、古代朝鲜文人对《中山松醪赋》、《食胡麻赋》的拟次

古代朝鲜文人除了对苏轼《赤壁赋》创作有大量的拟次之作外，苏子其它赋作同样受到了他们的喜爱与关注，他们从苏轼《中山松醪赋》、《食胡麻赋》这一类从表现日常事物启发哲思的赋作中获得精神力量。

《中山松醪赋》是苏轼的一篇咏物小赋，赋文感慨松枝“千岁妙质”，“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

束蒿。”作为火把仅能燃烧少时，和蒿草的命运相同。随后叙写将松枝只作为松醪的过程，并极力赞赏松醪的“幽资”，最后描述饮用松醪的奇特功效：“曾日饮之几何，觉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罢儿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飞猱。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使夫嵇、阮之伦，与八仙之群豪。或骑麟而翳风，争檮挈而瓢操。颠倒白纶巾，淋漓宫锦袍。追东坡而不可及，归哺歠其醨糟。漱松风于齿牙，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中山松醪赋》结构明朗，语言质朴，描写细致入微，苏轼将所描绘之外物与内心的感悟、情绪融为一体。赋中对松枝作为火把命运的描述，表现了苏轼怀才不遇的郁闷情绪，但是虽然松枝不被作为栋梁之才，却可以做成松醪以修养心性，消弭疼痛、与仙人同醉，转忧为乐，由此可见苏轼的豁达胸怀与乐观精神。

古代朝鲜文人对《中山松醪赋》的拟次之作有李敏叙（1633~1688）的《续松醪赋》和崔锡鼎（1645~1715）的《次续松醪赋李西河彝仲丈为南子闻作，属余和之》，这两篇都是较为严格的次韵之作，且崔锡鼎的《次续松醪赋李西河彝仲丈为南子闻作，属余和之》是李敏叙《续松醪赋》的应和之作。李敏叙的《续松醪赋》全文如下：

南甥子闻静者也，居于南山谷中。酿酒松间，九日分饷一壶。色味俱绝，意欣然一倾醉倒，遂次东坡韵作松醪赋以贻之。属余有海西卜居之计，故篇末及之。

悲秋气之憭栗，感朔吹之晨号。独申朝而寤寐，聊怅然于山皋。眄庭柯而不怡，吊九华之未遭。

忽白衣之传饷，资余润于霜毛。既倾泻于樽罍，又荐之以涧蒿。叹色味之两绝，征胎胚于松膏。亟洗爵而沃烦，宁命俦而携曹。嗤洪崖之伪馈，笑汉相之醇醪。纷黄柑与竹叶，陋世俗之徒劳。接生香于虬根，超末造之焚熬。依龟蛇之伏蛰，嘬夜涛之嘈嘈。眷王人之在谷，离氛垢而孤高。出新制于巧思，惊酸醅于葡萄。堪争隽于桂酿，肯借美于儿羔。谢好事于草玄，乐孤斟于持螯。夸太和之酩酊，岂昏冥之可逃。乍流肌而浃骨，如玉爪之轻搔。俄浩气之排襟，类御风而遐遨。睨侍侧之螟蛉，防窃饮之痴猱。

属余病于幽忧，将期观于风涛。追东皋之逸躅，揖湖海之老豪。无五物之我随，尚秘诀之是操。村翁兮被肘，山子兮战友。方大开于瓮盎，吸瀛杯而筑丘糟。廓然不闻蟪蛄与蜩螗，

惟听万壑松声之骚骚。^{〔8〕}

赋前小序交待了创作缘由，正文中先叙悲秋之叹，后写友人送来佳酿，并对佳酿进行了细致描绘，随后描写饮服佳酿之后的感受：“乍流肌而浃骨，如玉爪之轻搔。俄浩气之排襟，类御风而遐遨。”并通过“睨侍侧之螟蛉，防窃饮之痴猱”的侧面描绘来表现对佳酿的珍视。随后表现出超脱凡尘的愿望：“追东皋之逸躅，揖湖海之老豪。无五物之我随，尚秘诀之是操。村翁兮被肘，山子兮战友。方大开于瓮盎，吸瀛杯而筑丘糟。廓然不闻蟪蛄与蜩螗，惟听万壑松声之骚骚。”表现出归化自然的情绪。但值得注意的是，李敏叙所表现出的洒脱与出尘不是道家意义上的，“眷王人之在谷，离氛垢而孤高”，面对松醪佳酿，仍表现出其关怀王事之心。

崔锡鼎的《次续松醪赋》李西河彝仲丈为南子闻作，属余和之》

闻至人之服食，取枸杞之夜号。或寓趣于杯中，泛菊英于东皋。味真腴于往牒，叹物理之有遭。

嗟我友之如玉，视荣利犹毫毛。廓专精而内养，甘蔬粝于蓬蒿。藏小瓮于霜根，酿青松之芳膏。袭臭味于岁寒，混曲蘖而为曹。淹十日而乃开，成异品之新醪。笑桑郎之太俗，嫌桂醑之徒劳。饗要余而一吸，洗膏火之煎熬。冯棂檻而倚枕，恍听籁之嘈嘈。袭风味之醺和，增趣操之清高。观觞面之绀碧，类酸醕于葡萄。荐野蔌而侑饮，厌肥膾于庖羔。虽吏部之手风，尚堪持夫蟹螯。携同志而拍浮，谅尘嚣其可逃。倚伯伦之帷幕，忘叔夜之把搔（把与爬同）。方性真之浩浩，与造物而游遨。弄地底之龟蛇，伏心中之猿猱。

有西河之先生，擅学海之澜涛。追雪堂之遗词，挹行窝之人豪。攀琼韵而欲和，慨俚唱之难操。瘿木兮为樽，薛荔兮为袍。期先生于海瀛，羌枕藉乎余糟。恐此言之弗可遂兮，聊以续体物而慰牢骚。^{〔9〕} 551

赋文首先描绘脱俗之人的饮食，通过各种性洁质美的饮食去衬托至人高洁的品质。随后简要勾勒友人酿造松醪的过程：“廓专精而内养，甘蔬粝于蓬蒿。藏小瓮于霜根，酿青松之芳膏。袭臭味于岁寒，混曲蘖而为曹。淹十日而乃开，成异品之新醪。”之后写饮服松醪佳酿后的效果：“饗要余而一吸，洗膏火之煎熬。冯棂檻而倚枕，恍听籁之嘈嘈。袭风味之醺和，增趣操之清高。观觞面之绀碧，类酸醕于葡萄。荐野蔌而侑饮，厌肥膾于庖羔。”随后写希望逃离尘嚣，追逐清静之地，与物遨游，排除

杂念，过率真的生活。最后，赞扬西河先生李敏叙的高洁品性，并谦虚表达作此文的应和之意。崔锡鼎的《次续松醪赋》是一篇严格的应和之作，其行文结构、韵脚用字、主题都严格依照李敏叙的《续松醪赋》写作。总体上看，这两篇对《中山松醪赋》的次韵之作都极力表现松醪之质洁所带给人的影响，希望摆脱尘嚣、到达清净之地、获得精神自由，契合了苏轼豁达、洒脱的精神追求。

五、古代朝鲜文人追慕苏子精神境界的原因

朝鲜半岛是中国大陆的近邻，从远古时期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迁移等方面与中国交流频繁，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在政治上，朝鲜三国时期，新罗借助中国唐朝的力量打败了高句丽和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高丽朝、朝鲜朝都和中国保持着朝贡关系；经济上，中国经济上的繁荣是促成古代朝鲜慕华并学习中国制度的基本原因，同时也促进了古代朝鲜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上，古代朝鲜从三国时期就大力学习中国制度，习汉字，用汉文，学习中国科举取士，派遣使者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制度，到了朝鲜朝，中国程朱理学思想还发展成为其统治思想。“中国文化在制度、思想方面，以递进的速度发生影响，韩国以法制与学制为首的文化制度，全方位地受到这种影响。在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精神与价值层面上，也是如此。”^{〔10〕} 85 正是因为古代中国对朝鲜全方位的影响，才使得“朝鲜民族一方面以自主、自存、自强政策为指导，对自身思想进行逻辑上的探究，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先进的外来文化的强大优势，因此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逐渐产生了某种敏感性，偶尔会产生一些“慕华”思想，甚至“事大”思想的倾向。这不仅在历史上可以找到事实依据，即便到了现代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10〕}

^{105~106} 在朝鲜朝“事大”外交理念的影响下，朝鲜朝还具有很明显而强烈的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慕华”思想。“朝鲜自认出身东夷，慕华政策使得朝鲜由‘夷’变‘华’。李成桂立国之初，请求朱元璋赐国号‘朝鲜’，从而奠定了双边交往的基调。而箕子崇拜更强化了这种慕华思想，制度上向明朝学习，文化上向明朝看齐，接待明朝使臣的馆驿名之为慕华馆，“慕华”与“事大”成为朝鲜王朝对待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态，使双边关系成为典型的朝

贡关系。朝鲜因‘慕华’也变成了‘小中华’。”⁽¹¹⁾ ¹⁰⁹这种“慕华”心态使得中华文化、文学在古代朝鲜文人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在中华文化、文学中具有很高地位与很大成就的人物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古代朝鲜文人膜拜的对象。所以古代朝鲜文人通过阅读中国经典辞赋作品，找到了经典辞赋作品中的自我，触碰到了其深层的生命情感，引发了其创作冲动，进而创作了拟次辞赋作品，去寻求与先辈精神的沟通，表达自身真切的情感体验。因而，古代朝鲜文人在拟次苏轼辞赋过程中，除了对辞赋形式的模拟，还十分注重对中国赋家人格、精神的追求与模范。

总之，古代朝鲜文人对苏轼赋作的拟次，重在与苏子内在精神沟通，体验苏轼豁达、乐观、自由的境界，而较少拘泥于对其赋文字句的模仿。可见，苏轼对古代朝鲜文人的影响，主要在于其超脱的人格与豁达的情怀，正如韩国学者洪瑀钦所说：“在高丽时的东坡，是教育的执政派，在朝鲜时，反成为在野人的指导者。如果没有东坡型的人物，朝鲜人将会窒息于朱子的桎梏之下。而含怨的在野人士，亦将染上精神的干燥病。”([韩]张尹炫《苏轼对韩国文学的影响》)，其精神情怀、人格魅力尤其是对仕途碰壁的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郁郁不得志之人从苏轼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在艺术形式上，“苏轼的辞赋继承了宋赋流畅跌宕而又兼具情韵的特点，并将其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将辞赋固有的骋词特色、诗词的传神幽远的美韵、散文体的平易流畅水乳交融般地融合在一起。”⁽³⁾ ¹²⁰“以流宕而富于美感的语言来弥补过分议论化而造成的文采的不足”，古代朝鲜文人的拟次之作往往在语言艺术上和苏子差距甚远，注重议论的叙述，缺乏艺术形象的塑造，达不到韵味深远的艺术效果。

注释

- [1] [韩]李仁老：《破闲集》，首尔：亚细亚出版社，1972年。
- [2] [韩]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二十七《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
- [3] 刘培：《论苏轼的辞赋创作》，《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 [4] [韩]朴弘美：《灌圃先生文集》卷上《韩国文集丛刊续》，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
- [5] 张玉璞：《“三教合一”与宋代士人心态及文学呈现》，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 [6] [韩]赵绩韩：《玄洲集》卷十二《韩国文集丛刊》，

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

- [7] 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七。
- [8] [韩]李敏叙：《西河先生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
- [9] [韩]崔锡鼎：《明谷集》卷七，《韩国文集丛刊》（153），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
- [10] [韩]柳承国著，姜日天、朴光海等译：《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
- [11] 孙卫国：《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

（杨昊，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院东方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杨再琪东坡诗意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论苏轼小史高俅

邹同庆

苏轼的小史⁽¹⁾高俅在《水浒传》中，被艺术再造成反面人物。在七十回本中，第一回就出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中的他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自小不成家业，只会刺枪使棒，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因踢毬被端王⁽²⁾收留。端王称帝后，被提升为殿帅府太尉。从此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挟私仇，迫使禁军教头王进携母逃往延安府。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武艺高强，忠于职守，社会地位并不算低，还有一个和睦小康之家，只因为有个美貌的妻子，高衙内要霸占到手，结果被高俅父子害得家破人亡，无处容身，最终投奔梁山。三代将门之后杨志，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只因押运花石纲，遭风打翻了船，不能回京赴任。后来听到有复任官职的消息，就又“收得一担儿钱物，讨回东京去枢密院⁽³⁾再理会本身的勾当”，结果被高俅“一笔批倒”，身上所带的盘缠用光，只得上街变卖祖传的宝刀。在全书中，高俅始终和蔡京、童贯狼狈为奸，坏事做尽。《水浒传》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之一，上至耄耋老人，下到垂髫儿童，都喜欢阅读，有些读者阅读不止一遍。特别又经过1975年前后全民评《水浒》运动，书中的人物形象早就刻在人们的脑海中，一提高俅，大家就会异口同声地说：“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水浒传》中的人物分两类：一类是作者虚构的，如林冲、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一类是根据社会原型，为了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再经作者艺术加工而成，如宋江、方腊、高俅、童贯等。历史上的高俅是徽宗朝的大臣，《宋史》虽未为其立传，但《徽宗本纪》、《钦宗本纪》、《宋史·职官志》、《李纲传》、《刘锜传》、《李若水传》中，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挥麈后录》、《续资治通鉴》、《皇宋十朝纲要》、《宋南

渡十将传》等也有高俅的记载。《徽宗本纪》云：“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廿十三日），以殿前都指挥使⁽⁴⁾高俅为太尉。”⁽⁵⁾“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五日），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⁶⁾《宋史·职官表·节度使》：“崇宁五年以后，节度使殿帅则有高俅。”《钦宗本纪》云：“靖康元年，五月己卯（十四日），开府仪同三司高俅卒。”另外，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六云：崇宁四年（1105）五月，“壬子（十六日），命龙图阁直学士林摅为辽国回谢使，客省使⁽⁷⁾高俅副之。”崇宁四年五月，高俅以客省使的身份随林摅出使辽国。宋·章颖《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锜传》云：“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⁸⁾。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竟以边功至殿帅。”高俅出身平民，是以善蹴鞠为徽宗所宠幸，徽宗要重用高俅，让他走文官这条路，显然走不通，因为宋朝提拔干部有一套制度，七品以上文职官员，必须是进士出身。高俅只能走武官之路，因为武官对出身要求不严，只要有功名就行。于是徽宗就让高俅到边帅刘仲武部队去锻炼，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恰好，高俅在西北边关的时候，宋朝在西北边境打了几个大胜仗，高俅的升迁有了资本，最后做到殿帅，掌管禁军达二十年。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云：“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曾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王诜）。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⁹⁾为端王，在潜邸日⁽¹⁰⁾，以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记带篦子刀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今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齎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

亦解此技邪？’ 俅曰：‘能之。’ 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箠刀之贶，并所送人。皆辍留矣。’ 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耶！’ 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值事，自俅始也。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座⁽¹¹⁾。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胡元功云）⁽¹²⁾

我们排除小说《水浒传》的误导，梳理上述资料，从中可以发现：

首先，高俅是个从小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人。否则，他的书法和文章难以达到“颇工”的水平。他也不会来到苏府，成为大文豪苏轼的小史。苏轼离开东京到定州任知州时，也不会把他推荐给善书画的驸马都尉王晋卿。

其次，高俅是个擅长蹴鞠的青年。他聪慧灵敏，技术超群。宋徽宗称赞他的脚法无人能比。蹴鞠，又作“蹋毬”、“蹴毬”、“蹴踘”、“蹴鞠”、“蹙鞠”，是一种古老的体育活动。“鞠”相传为黄帝所创，用毛和草制成，战国时已很流行。到汉代，“鞠”的制作改用内充毛发，外裹熟皮，结实而富弹性，蹴鞠就更普及。到唐代，出现了气球，用动物胞（膀胱）放在皮球中做胆，充气而成。蹴鞠分有球门和无球门两类。球门又分场地两头设双球门和场地中间设单球门两种，在两根木柱上挂上球网构成。正式竞赛时分队进行。双球门竞赛与现代足球相似，多用于禁军练武。单球门竞赛时，双方位于球门两边，交替将球射入球门，进球多的一方为胜，多用于宫廷宴会表演。无球门的散踢称作“白打”，用来比赛蹴鞠的花样和技巧，多用于群众健身。唐代还兴起了女子和儿童蹴鞠，形成了一项全民性的健身运动。上到皇帝显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很喜欢这项运动。汉高祖刘邦就藏有《蹴鞠新书》，他不仅爱看比赛而且爱踢，他的父亲太公也极爱这种运动，常和“屠贩少年”踢球。蹴鞠不仅可以用来娱乐、健身，又是一项军事体育项目，从汉代起列朝都用它来练武，训练士兵的体质和意志。《汉书·艺文志》中有《蹴鞠二十五篇》是列入“兵家技巧”

类的。汉代长安城宫苑内建有大规模的“鞠城”，就是羽林军举行蹴鞠竞赛和定期校阅的场所。宋代蹴鞠更为盛行，民间有了蹴鞠组织“圆社”、“齐云社”等，宫廷中设有与皇帝踢球的“打毬供奉”。《宋太祖蹴鞠图》上画有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与赵普、石守信等人踢球的情形。宋徽宗也极爱这项活动。宰相李邦彦、大臣丁谓、进士柳三复等都是蹴鞠高手。高俅就是在宋代全民蹴鞠活动中涌现出的佼佼者，因脚法超群，受到宋徽宗恩宠，被选进皇宫，由殿前都指挥使，加官太尉，后升开府仪同三司，是我国古代因蹴鞠而升官的第一人。

再次，高俅有知人善任之举。高俅作殿前司最高统领官时，其所在部门是军事机构，以武职人员为主，派进的人，应该懂兵法，有武略。政和七年七月给他调进 31 人，其中尚书省散祇候 10 人，枢密院承引官 21 人。特别是尚书省散祇候 10 人，是皇宫中掌管朝会宴幸、供奉赞相礼仪之事的。他认为这些人不符合自己所在部门的用人条件，就以“臣见领军政已有人从”为由，拒绝接收。（见高俅《乞免尚书省枢密院差破人从奏》）据有关文献载，他为朝廷荐举过两人。一是张口。大观二年（1108）十月，高俅上《乞付张口边任奏》说：“通直郎张口潜心武略，久习兵书，曩在有司，已尝试艺。昨缘其父恩例奏名文资，比又获贼蒙恩改官。臣究其才力，于武尤长，伏望特依王厚例换一右职，付以边任。”大意是说，张口潜心武略，久习兵书，从前在殿前司时，我们曾比试过武艺。现在给他安排一个文职官，不能发挥他的特长，希望给他安排个武职，让他去守边疆。后来，张口成为宗泽部下一名武将，作战勇敢，不怕牺牲。靖康二年（1127），金兵侵战滑州（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张口请求去救援。宗泽选出精兵五千名交给他。张口率部到滑州后，面对十倍的金人骑兵，“诸将请少避其锋，口曰：‘避而偷生，有何面目见宗公！’”因寡不敌众，战死沙场。（见《宋史·宗泽传》）二是刘锜。刘锜（1098~1162），南宋初与张俊、韩世忠、岳飞并为抗金四大名将，世称“张、韩、刘、岳”。据《宋史·刘锜传》载，刘锜字信叔，德顺军（今甘肃静宁）人。善射，人服其精。“宣和间，用高俅荐，特授阁门祇候”。建炎中，为陇右都护，与夏人战，屡胜，为夏人所畏。夏人小孩啼哭，大人就吓唬说：“刘都护来了。”绍兴十年（1140），宋金和议成，充东京副留守，率八字军三万七千人赴

任，行至顺昌（今安徽阜阳县），适遇金兀术败盟来攻，遂守城御敌，有谋略，大破其精兵十万。次年，与张俊、杨沂中会师支援淮西，又大破金军于柘皋（今安徽巢县北）。因遭秦桧、张俊妒忌，被罢兵权，绍兴三十二年，忧愤而死于镇江。

第四，高俅和蔡京、童贯不是同党。《宋史·李纲传》云：“初，徽宗南幸，童贯、高俅等以兵扈从。既行，闻都城受困，乃止东南邮传及勤王之师。道路籍籍，言贯等为变。陈东上书，乞诛蔡京、蔡攸、童贯、朱勔、高俅、卢宗道等。”意思是说高俅和蔡京等是同党，沆瀣一气。此说有误。《宋史》是元至正三年（1343）至五年（1345）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完成的，距徽宗朝将近250年，《李纲传》所载“徽宗南幸”之事，与当时的实情不符。北宋末“六贼”是太学生陈东在宣和七年十二月廿七日《上钦宗皇帝书》中提出的，“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贯、曰梁师成、曰李彦、曰朱勔之徒是也”。他们植党营私，掌权祸国，标榜尊崇熙宁变法，排除异己，公行贿赂，又妄起边衅，使国家内外交困。陈东接连三次《上钦宗皇帝书》揭露了六贼的种种罪行。在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

《三上钦宗皇帝书》中陈东将靖康元年正月三日蔡京、童贯等挟持徽宗南幸的境遇，这样写道：“臣昨日闻道路之言曰，高俅近收其兄俅、伸等书报，言上皇初至南京（今河南商丘），不欲前迈，复为数贼挟之而前，沿路劫持，无所不至，上皇饮食起居不得自如。数贼阻隔甚严，除其党与之外，不容他人辄得进见，虽高俅被宣欲进，亦复艰难。行至泗州，又诈传上皇御笔劄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挟上皇渡桥而南，以赴浙江，其随驾兵士，尽为群贼斥之而回。闻方过桥之时，卫士攀望上皇车驾，失声号恸，童贯遂令胜捷亲兵^{〔13〕}以弓射之，卫士中矢，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高俅兄弟在道旁望，得一望见上皇，君臣相顾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贼在其侧，上皇气塞声咽，不敢辄发一语。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二“靖康中帙”）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徽宗这次南幸，是蔡京、童贯等贼劫持徽宗南去的，途中徽宗饮食起居失去自由，六贼阻隔甚严，除其同党外，别人不得进见。高俅虽也随行，但进见却很困难。走到泗州，六贼假传圣旨，让高俅把守淮河浮桥，不得随徽宗南行，随驾卫士均被群贼斥回。当徽宗过桥的时候，卫士

手攀徽宗车驾，失声痛哭，童贯立即命令亲信胜捷军用弓箭射之，卫士坠河而死者百余人。高俅兄弟在道旁望，只能眼望徽宗，相顾泣下，想要说什么，因群贼在侧，徽宗气塞声咽，不敢辄发一语。由此可见高俅不是六贼党羽，六贼也从未把高俅视为自己人。当六贼挟持徽宗从泗州继续南行时，高俅称病从泗州返回东京，到五月十四日便寿终正寝了。而六贼中，除蔡京一人病死在流放途中外，其他五人先后被处决。童贯还枭首东京开封。

第五，高俅是个知恩图报、极重情义的人。高俅重情义主要体现在他与苏轼及其家人的交往中。苏轼极爱才华青年。高俅早年在苏轼身边作小史时，因“笔札颇工”，又恪尽职守，颇受苏轼喜爱，高俅也很敬重才华横溢的苏轼。苏轼在政治上是个大起大落之人，在朝做过皇帝的老师，在乌台诗案中也做过阶下囚，一生在党争中受尽磨难。苏轼去世不久，特别是崇宁元年七月蔡京当政后，再次挑起党祸，加紧迫害“元祐奸党”，禁毁“元祐学术”。苏轼与司马光等一起，皆追剥官爵，苏轼与宰相文彦博等一百二十人的名字，刻在御书石碑上，立于端礼门，永为百世子孙之戒。“奸党”子孙，不许在京城做官，宗室不得与其子孙通婚。崇宁二年（1103）、宣和五年（1123），又两次下令销毁苏轼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崖志等，并云：“犯者以大不恭论。”其间一个叫朱翼中的官员，因书东坡诗，被贬达州。不管苏轼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特别是在徽宗朝的高压政治形势下，高俅都念念不忘苏门，“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在当时，对苏轼的家人来说，是极大的精神安慰，也彰显出高俅极重情义。他的这些作为，曾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

作为封建王朝的大臣，高俅身上难免有营私的污点。宋·无名氏《靖康要录》卷五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权倖。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高俅掌管禁军二十余

年，不仅将禁军的地皮建成私宅，还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摆设，以至当国家面临金兵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禁军很快瓦解，作为大宋的最高军事统帅之一的高俅，显然难辞其咎。这也难怪他死后，皇宫准备为其举办隆重葬礼，大臣李若水马上给钦宗上书，说“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

（见《宋史·李若水传》）。靖康元年五月辛巳（十六日），钦宗降旨：“追削高俅官。”（见《宋史·钦宗本纪》）

高俅被世人认为是徽宗一朝以个人好恶重用才德不符人物的典型例子。他身上虽然存在有封建官员的污点，不过现存史料中并未有其他著名恶行传世。《水浒传》中写他对王进、林冲、杨志等人的迫害及后来帅领十路大军征讨宋江等故事情节，都是作者根据《水浒传》的主题“官逼民反”的需要虚构的，历史上并无此事。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宋史·侯蒙传》云：“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指方腊）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徽宗接受侯蒙建议，宣和三年二月，命海州知州张叔夜征讨并招安宋江（见《徽宗本纪》）。镇压方腊起义是童贯、谭稹“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在宣和三年四月，“生擒腊及妻邵、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四年三月，余党悉平”。宣和四年八月，加童贯太师，封楚国公，赏平方腊之功。（见《宋史·童贯传》）镇压宋江和方腊起义，都与高俅无关。他也没有参与蔡京、童贯等联金灭辽的错误决策。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将高俅的形象刻画成“六贼”的同党，是因为他和蔡京、童贯同在徽宗朝为官，又是主管军事的太尉，让他作为梁山起义军的主要敌人展开活动，就提高了《水浒传》的艺术真实性，更能让读者信服。金圣叹曾这样评价这一高明笔法：“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社会上的各类人物，在文学艺术家手中就像一团团泥巴，根据故事情节需要，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历史上的曹操，本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在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却被罗贯中塑造成“白脸奸臣”。历史上的高俅和曹

操相比，地位、名气都没有曹操高大，可以说是无名之辈，当然在小说《水浒传》中，扮演个丑角，代封建皇帝受过，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仔细分析历史资料，我们会发现高俅不仅是宠臣，还是能臣，小说的贬毁是应该纠正的。应该为后代留下可信的史实。高俅生于乱世，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从一介平民，步步上升到官至从一品的太尉，且善始善终，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当代有学者这样品评高俅：“高俅的历史结局是于1126年病死于开封。盖棺定论，时人对他的评价是大节无亏，总体上尚算是一个好人。”我认为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注释

[1] 小史：即书僮，在官府协助抄写或办事的少年。

[2] 端王：即宋徽宗赵佶，称帝前曾封端王。

[3] 枢密院：宋最高军事机关，别称右府、西府，掌管全国军务。

[4] 殿前都指挥使：军职名，为殿前司最高统领官，从二品。

[5] 太尉：为武阶官之前阶，从一品。

[6] 开府仪同三司：为文臣京朝官寄录官三十阶之首阶，从一品。

[7] 客省使：宋设客省使、副使，掌外国使节之招待供应。

[8] 三衙：宋中央禁军最高指挥机构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合称。

[9] 祐陵：即宋徽宗赵佶。

[10] 潜邸：指皇帝即位前的住所。

[11] 八座：封建时代中央政府八种高级官员。后世文学作品多以指称尚书之类的高官。

[12] （胡元功云）：意思是这条资料是胡元功提供的。胡元功，字国敏，长洲人，胡元质弟。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

[13] 胜捷亲军：童贯在西部边境地区招募长大少年几万人，号胜捷军，作为自己的亲军。平时环列第舍，看家护院，遇有事随童贯出征。

（邹同庆，河南大学文新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

习近平用典青睐苏东坡

涂普生

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志用典最多的古代名人是我国北宋文学大家苏东坡，文章从以读经典、承基因为己任；为政之要，优策惠民；时之所需，举手即拾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值得一读。

关键词 习近平用典 青睐 苏东坡

习近平同志无论是在地方上当领导，还是在中央当领导，发表过许多重要讲话，撰写过许多重要文章。其中用典恰如其分、生动传神、发人深省，为此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特别编写了《习近平用典》一书出版发行。

在《习近平用典》这本书里，编写者共辑录了习近平同志在其重要讲话和文章中，所引用的古诗文经典凡 135 则，共分为敬民篇、为政篇、立德篇、修身篇、笃行篇、劝学篇、任贤篇、天下篇、廉政篇、信念篇、创新篇、法治篇、辩证篇等 13 篇章。从《习近平用典》所辑录的名言、名句来看，引用得最多的是《论语》、《礼记》、《孟子》中的名言名句，其次是《荀子》、《尚书》、《二程集》等。其中引用古代名人的名言名句最多的，是北宋文学大家苏东坡诗文中的经典名言名句，计有 7 处之多，分别辑录入《习近平用典》的为政篇、劝学篇、廉政篇、辩证篇。

兹录如下：

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入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中的“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

习近平同志《在新疆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引用了苏轼《晁错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从政杂谈》等文中

引用了苏轼《策略四》：“临大事而不乱。”苏轼《陈侗知陕州制》：“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

习近平同志在《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中央党校 2009 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苏轼《董传留别》：“腹有诗书气自华。”

习近平同志在《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等文中，引用了苏轼《范增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等文中，引用了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习近平同志用典为何如此青睐苏东坡？值得我们探究、学习和深思。

首先，是因为习近平同志以读中华民族文化经典，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为己任。2014 年，习近平同志曾说过两段十分精辟的话：“古诗文经典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崩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习近平同志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既是他对当世的告诫，也是他亲自体验与世人的分享。他不仅是一位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学习者、弘扬者，更是一位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传承者和指导者。他把学习、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经典，作为己任。他用他的实践，成功地实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经典的“古为今用”，并在“古为今用”中释放出巨大的时代红利。我们知道，由于我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发生的那场历史震荡的原因，习近平同志在其求知欲望最强烈的那些年份，不能正常地上学读书。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只能靠自学，靠自己找书读。在自学过程中，自然少不了读伟人、读古人的诗文经典。作为我国北宋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东坡，其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其词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其文被《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收录了26篇，被《古文观止》收录了12篇。苏东坡的许多诗文，当是中华民族文化经典。对于苏东坡的这些经典著作，习近平同志读得多、记得多，尤其是对其中的名言名句读得多、记得多，当是情理之中的事。习近平同志多次表示，他很喜欢苏东坡。正因为习近平同志对苏东坡的诗文读得多、记得多，因而，读起来赏心悦目，记起来深刻难忘，用起来得心应手。也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用典引用诗文经典最多的古代名家是宋代苏东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为政之要，优策惠民。此乃习近平同志用典青睐苏东坡的又一缘由。苏东坡毕生精力在优策惠民，报国忠君。北宋嘉祐二年，即公元1057年，年方20的苏轼，凭他的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被取为进士。《刑赏忠厚之至论》以忠厚立论，以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为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应属策课。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经过黄州的四年零四个月的贬谪生活，苏轼嬗变为苏东坡，可谓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了。苏东坡由黄州回到朝廷，官运亨通，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不仅代皇帝写过很多“圣旨”，而且向皇帝写过很多奏章、奏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同志发表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这个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引用了苏东坡《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中的话：“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意思是说治国如烹小鲜，不能朝令夕改；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要保持制度的稳定，不可以生事。而亦不可畏事，则是说，不能因为一些人对我们发展道路的非议和质疑，就缩手缩脚，甚至按照他们的想法而去改变我们的观点。《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就是时任北宋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的苏东坡，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九月八日，就西羌、西夏事宜写给宋哲宗的奏议。苏东坡的许多诗文，都是优策之诗、优策之文。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

苏东坡经过黄州谪居之后，经过在黄州的杂处渔樵、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交朋结友、拯救溺（弃）婴、消除瘟疫、抄书坐禅等生活实践，离开黄州回到朝廷后，其爱国忠君思想、优策惠民的理念，提升到了一个更新、更高、更富效能的层面，并在他的诗文中或明或隐地反映出来。因此，对于在基层工作的、在顶层设计层工作的领导来说，都是值得体味的，值得借鉴的。作为在中国顶层设计层面做领导工作、夙夜在公的习近平同志，在引用中国古人诗文经典时，青睐苏东坡，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时之所需，举手即拾。这也是习近平同志用典青睐苏东坡的重要缘由。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古诗文经典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以古诗文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我们的先贤的人生历练的结晶、人生感悟的结晶。它在一定层面上，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文化特征、人格特征和道德基准，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一代又一代人经过去芜存精、去伪存真而积累起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让它在新的时代释放新的红利。稍对苏东坡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苏东坡是上个世纪世界千年文化英雄。他一生坎坷，历练超凡。他既当过皇帝的老师，又当过贫苦百姓的老师；既当过钦犯，又当过朝廷储相；既坐过天牢，又在黄州登上过北宋文坛峰巅；既在朝廷生活过多年，又与黄州渔樵杂处多年；既当过农人，又当过朝廷三品高官；既改革创新了词赋文体，又创造了困顿中崛起的人生范式……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的一生。苏东坡的许多诗文乃至奏章，都是他对世间万事万物、对身边的人和境，以及对自己的种种历练的认知、感悟的结晶，都是他的智慧的结晶，具有很强的借鉴性。比方说他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念奴娇·大江东去》），“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赤壁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这些都是苏东坡黄州诗文中的名句，都是苏东坡的人生感悟和智慧的结晶，同时，又都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要看到和读到这些诗文名句，就有所感、有所悟、有所启迪。由于苏东坡人生经历丰富，且勤勉智慧，

因而苏东坡的诗文涉猎面非常之广阔，而且意蕴十分深厚、借鉴性十分强。正因为如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央主流媒体就“你最喜欢的中国古代文化名人是谁”这一问题在中青年中，作了一次广泛的问卷调查，答案是苏东坡。也正因如此，苏东坡的经典诗文常被引用，而且意味长、频率高。

习近平同志多次倡导，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还有一点必须说及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时代需要全面遵规守矩、全面激活创新能力，全面激活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需要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发正能量，激活生命力。改革创新、开放发展、学习古今、廉洁勤政、辩证思维等等，都是首先需要激发和激活的。梳理古今文化先贤，苏东坡无疑是最爱瞩目的文化先贤之一。这不单是因为苏东坡是世界千年文化英雄，不单是因为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不单是因为苏东坡是词、赋革新旗手，而主要是因为苏东坡的诗文作品，具有黎庶性、思辨性、感悟性、创新性和多元包容性，涵盖面十分广阔。既有劝学方面的，又有廉政方面的，还有为政和辩证方面的。对于倡导传承、关注民生、夙夜在公的习近平总书记来说，对苏东坡的经典诗文名言名句，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并且多次引用，就不难理解了。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国粹，是一座丰富的宝藏。作为时代主人的我们，在推进“四个全面”的进程中，要加强学习，坚持学以致用，吸吮中华民族在其漫长奋斗和衍进中所积累的文化养分，激发正能量，激活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干事创业，强国富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接力中，谱写出应有的历史篇章。

注释

人民日报评论部编：《习近平用典》，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

（涂普生，研究员职称，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书名：习近平用典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部
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年2月第1版
开本：710×1000mm 1/16
页数：306页
定价：39.00元

读《东坡志林》(八)

徐 康

诗意盎然的庐山之游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2]，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3]。”既自哂前言之谬^[4]，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5]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忆清赏，神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6]《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云徐凝^[7]、李白^[8]之诗，不觉失笑。旋入开先寺，主僧求诗，因作一绝云^[9]：“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10]，故作此二诗，最后与总老^[11]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诗尽于此矣。——苏轼《记游庐山》^[1]

注释

[1] 本篇系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四月作于庐山。苏轼于元丰七年四月离黄州赴汝州，先赴筠州会子由，途经庐山。故本文当作于是时。

[2] 殆应接不暇：殆，几乎。应接不暇，沿路山水秀美，看不胜看。《世说新语·言语》：“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3] 故侯：本指汉召平，后泛称曾任官长之人。陈子昂《感遇》一四：“西山伤遗老，东陵识故侯。”此苏轼自指。因苏轼曾任徐、湖二州太守，此时正处于贬谪中。

[4] 自哂（shěn）前言之谬：哂，笑，讥笑。作者被贬黄州前，并未封侯，却脱口自称“故侯”，顿觉唐突可笑，故说“自哂（自笑）前言之谬”。

[5] 偃蹇（yǎn jiǎn）：本意为仰卧而高耸的样子，引伸为傲慢之意。《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汉·枚乘《七发》“旌旗偃蹇，羽旄肃纷”。

[6] 陈令举：即陈舜俞（？～1074），字令举，自号白牛居士，浙江乌程人。熙宁三年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青苗法行，陈不肯执行，上疏自劾，责监南康酒税，熙宁五年卒。遗著有《庐山记》、《都官集》。

[7] 徐凝：生卒年不详。唐睦州人。宪宗时官至侍郎，有诗名，诗为白居易所重。

[8]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陇西成纪人。最杰出的诗人。

[9] 因作一绝云：指苏轼所作绝句：“帝遣银河一派垂（上天遣派银河自天而垂），古来惟有谪仙辞（从古到今，最佳的韵叹只有李太白的《望庐山瀑布》诗。李白诗才奇绝，世称“谪仙”）。飞流溅沫知多少（瀑布流泻的飞流溅沫不计其数），不与徐凝洗恶诗”（像徐凝那样的鄙陋之诗，真是不值一洗）。

[10] 漱玉亭、三峡桥：漱玉亭，在星子县西十里开先寺后。系宋僧若愚所建。瀑布泉落龙湫，流经于此，萦亭以出，有如漱玉。苏轼有诗。三峡桥，即棲贤桥。苏辙《庐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记》：“……入棲贤谷。谷中多大石，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虽三峡之险不过也，故其桥曰三峡。”

[11] 总老：即东林寺长老常总禅师。元祐三年诏往东林，五年赐号照觉禅师，七年九月卒。

赏析

此篇以诗记游，可当作一篇诗话来读。

庐山，又称匡山、匡庐，在今江西省北部，耸立鄱阳湖、长江之滨，多巉岩、峭壁、清泉、飞瀑之胜，为我国著名的风景胜地，游览如此人间仙境，东坡自会诗意盎然。

元丰七年（1084）四月，四十九岁的苏轼从黄州量移汝州，途经江西庐山。他断然忘却了自己受

冤贬折的遭遇，一时诗兴大发，用这篇文章记录了诗趣盎然的游兴。

苏轼这次游庐山，算是他的“初游”，见“山谷奇秀”，乃“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既然沿途山水如此秀美，看不胜看，故起初发誓只观景而不作诗。而当他见到山中的僧人和俗众时，人们争相言传：“苏子瞻来矣！”这确也足见他在庐山一带的名声和影响，于是，他欣喜之下，信笔写下《初入庐山》绝句三首，第一首：“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头两句为实写：穿着芒鞋拄着竹杖，以贫贱之身（自挂百钱）而游庐山。此典出自《晋书·阮修本传》：阮修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自酣畅而饮。接下来的后两句：可怪者，奇怪也，惊诧也；“故侯”原意是泛指曾任官长之人，譬如陈子昂《感遇》诗：“西山伤遗老，东陵识故侯。”。但苏轼私下一想，他在身陷“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前，从未被朝廷封过“侯”，故此诗末句“人人识故侯”岂非得“意”而忘“形”乎？虽韵律自然，却不符“事实”，于是不禁自哂“故侯”用语之谬，才又再作两首绝句（即前面所指“绝句三首”之后二首），一首曰：“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意思是说，青山如果缺少了素雅之美，虽高耸入云，傲慢坚挺，我也不与它亲近。我之所以与庐山一见面就相亲，是因为早年就是老朋友。另一首云：“自昔忆清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过去就曾以清贫之身，神游于（庐山）深远的杳杳雾霭之间。如今到此一游，那可不是梦中啊，所见到的是真实的庐山。以上共成绝句三首。

当天，还有人寄赠给“我”（东坡）一本陈令举先生的《庐山记》，我边走边读，见其中评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及评论中唐诗人徐凝所作《庐山瀑布》诗：“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读后不禁哑然失笑。后进入开先寺（系南唐中祖李璟所建佛寺），寺主及僧人皆求诗，我（东坡）便作了一首绝句：“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据《东坡集》卷十三载：“世传徐凝瀑布诗云：‘一条界破青山色’，至为尘陋。又伪作乐天诗称美此句，有‘赛不得’之语，乐天虽涉浅易，

然岂至是哉？乃戏作一绝。”即指这首绝句。“我”（东坡）在山中南北间往来十多天，以为绝景名胜不可胜数，选择其最佳者，莫过于两处胜景，一曰漱玉亭，因亭前有瀑布飞溅，如玉石，故亭名“漱玉”；二曰三峡桥，指庐山五老峰西有三峡涧，水行石间，声如雷霆，汹涌腾跃，势不可遏，有如三峡之险；其南即三峡桥。于是作了《庐山二胜》，一曰《开先漱玉亭》，一曰《栖贤三峡桥》。写完这两首诗，并与总长老同游西林寺，兴之所至，又写了《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后在东坡诗集中，此句改为“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苏轼所写的“庐山诗”，即到此为止也。

这一则诗话，不仅展现了苏轼写庐山的多首诗作，还收进他对前人庐山诗优、劣的评价，扬李（白）抑徐（凝），可见其毫不掩饰的“诗观”。世间有“闲游”之说，意即心中无可忧之事挂牵，方可开心畅游名山大川。而苏轼自元丰二年（1079）遭逢乌台诗案，被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已历经五年的贬谪生涯；然而他的潇洒天性与浪漫诗才，却并未受到损折。此次庐山之行，他全然忘却了自己的“戴罪”之身，全然一副“闲游”之态，诗兴盎然，一路吟咏，佳作迭出。读此篇可以感知苏轼超然物外、豪放旷达的诗人品格，亦足见苏轼不窘迫于处境之恶劣，而依然才气横溢、诗思敏捷的鲜明个性。

逸人雅趣，旷达心胸

到杭州一游龙井^[2]，谒辨才遗像^[3]，仍持密云团为献龙井^[4]。孤山下有石室^[5]，室前有六一泉^[6]，白而甘，当往一酌。湖上寿星院竹极伟，其傍智果院有参寥泉及新泉^[7]，皆甘冷异常，当时往一酌，仍寻参寥子妙总师之遗迹，见颖沙弥^[8]亦当致意。灵隐寺后高峰塔^[9]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余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苏轼《逸人游浙东》^[1]

注释

[1] 本篇系苏轼于元符二年（1099）五月十六日作于儋州。逸人，隐逸之人。东坡屡遭贬谪，已无心做官，故自称逸人。游浙东，指游杭州。

[2] 龙井：据《咸淳临安志·山川》卷：“龙井本名龙泓……相传有龙在焉，触石为云，祷者辄应。因建龙祠曰‘惠济庙’”，并有记，苏轼弟子秦少游撰，苏轼好友米元章书。

[3] 辨才，又称龙井辨才，杭州名僧，后退居龙井。苏轼当年通判杭州时，与之交情甚笃。辨才圆寂于龙井寿圣院，苏轼曾为之作《祭龙井辨才》文。

[4] 仍持密云团为献龙井：密云团，又称“密云龙”，北宋贡茶名。为献龙井，作为祭奠龙井辨才的进献之物。

[5] 孤山下有一石室：据《咸淳临安志·山川》卷：“孤山，在西湖中稍西。一屿耸立，旁无联附，为湖山胜绝处。”孤山之下，筑有一间石室。

[6] 六一泉：在孤山下，苏轼知杭州前数月，始发现此泉。苏轼莅杭后，为纪念恩师“六一居士”欧阳修，名之“六一泉”。欧阳修以“藏书一万卷，集采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物之间”而自号“六一居士”。

[7] 其傍智果院有参寥泉及新泉：寿星院旁边的智果院里，有以著名高僧参寥子命名之“参寥泉”及新辟之泉。参寥子，即诗僧道潜，法号“妙总大士”，生前系东坡好友，能文能诗，诗句尤为清绝。

[8] 颖沙弥：即法颖，系参寥子的法孙，曾编撰《参寥子集》。

[9] 灵隐寺后高峰塔：《西湖游览志》卷十：“灵隐禅寺，晋咸和元年僧慧理建。山门匾曰：‘绝胜觉场’。寺有石塔四座，皆吴越王建。宋景德四年，改名景德灵隐禅寺”；高峰塔：《咸淳临安志》卷八二《寺观》：“北高峰塔，天宝中邑人建，高七层。屡坏屡修，中藏古佛舍利。元丰间老长圆明大师重建。”《武林旧事》卷五：“北高峰塔，在灵隐寺山后绝顶，比南高峰尤高，上有五显祠，远近炷香，四时不绝。”

赏析

古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轼一生，与具有“天堂”之称的杭州有着不解之缘。他于熙宁四年（1071）三十六岁时，曾通判杭州，至熙宁七年（1074）十月共计三年。熙宁四年十八年后，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五十四岁时，第二次莅杭州任太守。他两次在杭州为官，因有德于民，至离杭时民众万人夹道，依依惜别；杭人家有苏公画像，并为作生祠永以为念。

苏轼这篇《逸人游浙东》，似可看作他为旧地重游所拟定的一份游览计划。他对杭州的故人旧景不仅记忆犹新，而且对重游故地兴致勃勃，充满了逸人雅趣。逸人者，隐逸之人也，摆脱了繁冗政务的逸乐之人也。苏轼此前曾屡遭贬谪，看透了官场之险恶，厌倦了冗务之繁赘，故常以“逸人”自况，钟情于山水林泉及新朋旧友，对重游杭州早已心向

往之。

他的“计划”是如何设想的呢？到杭州，他首先想到的是“一游龙井”，即去西湖西南山中，到产茶闻名的龙井问茶，然后到寿圣院拜谒已故僧人、老朋友辨才的遗像，将在龙井所获之“密云团”饼茶作为祭献辨才之礼。他还记得西湖孤山，山下有石室，室前有纪念恩师欧阳修的六一泉，其水洁白而又甘美，应当随时前往一饮。湖上的寿星院，翠竹千竿，修长茂伟；旁边的智果院里，有以著名高僧参寥子命名之“参寥泉”及新辟之泉。说起这参寥泉，还记得是在元祐四年（1089），老朋友参寥子入住智果寺，寺中有泉，水甘冽而清醇，苏轼便以“参寥”名之。“新泉”则在参寥泉之侧。二泉均十分甘美凉爽，“我”（苏轼）届时一定前往一饮为快，仍寻求老朋友参寥子高僧之遗迹，见到颖沙弥也当致意问好。沿灵隐寺后高峰塔山路，再上行约五里，有山门匾曰：“绝胜觉场”，那里有四座石塔可览。寺后循路，再上行至北高峰塔，高七层，中藏古佛舍利，炷香缭绕，四时不绝。塔上的高僧居住在此已不下三十年了，不知还健在否？也可前往探视一下。

从上面计划中的“杭州游程”可以看出，苏轼留恋故人，不忘旧情，对已故的长者和友人，如辨才、“六一居士”欧阳修、高僧参寥子等，无不充满敬意。对将近三十年前的故人仍念念于兹；对颖沙弥这样年轻的“初识者”亦以礼相待。他不仅清楚地记得龙井、孤山石室、六一泉、寿星院竹、智果院新泉，以及灵隐寺后高峰塔等每一处胜迹，记得每一位曾经相识相交的故人，而且旧情难却，礼数俱备，由此可以看出苏轼的看重情谊与博大胸襟。此等心胸，正是苏轼为后人所仰的旷达、可爱之处。

大道自然，孰为得失？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2]，有老书生数人来过^[3]，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4]，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5]，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矣；然亦笑韩退之^[6]，钓鱼无得，更欲远去^[7]。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苏轼《儋耳夜书》^[1]

注释

[1] 本篇系苏轼于元符二年（1099）正月十五日作于儋耳。

[2] 儉耳：唐时称儋州，宋废州为昌化军。在今海南省海口市以西。儋耳原为古儋州州城所在地，古建、风景名胜地颇多。现为儋州市中和镇。儋州古城现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3] 过：过访。

[4] 民夷杂揉，屠酤纷然：民，汉族百姓；夷，当地少数民族。杂揉，混杂在一起。屠，宰杀猪牛羊的屠户；酤，卖酒的商人。纷然，人多拥挤的样子。

[5] 掩关熟寝：指夜深后掩窗关门而熟睡之。

[6] 韩退之：韩愈，字退之（768~824），今河南省孟州市人。因世居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诗人、文学家。他与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骈文，提倡散文；诗歌创作亦力求独创，不避险僻，以文为诗，形成宏伟奇绝的行文特点。有《昌黎先生集》留世。

[7] 钓鱼无得，更欲远去：韩愈曾作钓鱼诗《赠侯喜》：“吾党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钓温水……晡（bū）时（申时，即午后三时至五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暂动还休未可期，虾行蛭（zhī，即蚂蟥）渡似皆疑。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鱗与鬚（qí，马鬚）。是时候生与韩子，良久叹息相看悲。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世遑遑就举选（举选，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一名始得红颜衰……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jù rù，泛指泥沼、低湿之地）？”

赏析

儋耳，即唐时之儋州，在今海南省海口市以西，古为“蛮荒”之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偏远而贫瘠。苏东坡晚年曾遭贬至儋耳，虽身处荒僻之地，然安常处顺，自得其乐，而且在那里交了不少识字与不识字的朋友。其中有一天的经历，东坡觉得有“记之”的必要，于是晚上写成笔记，故叫做“儋耳夜书”。

记事先从时间写起。“己卯上元”，即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上元，农历正月十五日称上元节。当时东坡正住在儋耳，有朋友（老书生数人）来访并邀请他：“这样美的月亮，这样好的夜晚，先生能出来游逛一番吗？”东坡高兴地答应并跟随而去。他们漫步到城西门，进入了僧人的房舍，穿过一条条小巷，只见汉族与少数民族混杂在一起，屠户与卖酒者到处都是，人数很多。待游罢城区，回到居所已经夜半三更了。房中的家人都已掩窗关门熟睡，而且醒而复睡再起鼾声。在这寂然的夜间，

游归的东坡放下伴游的拐杖，不禁哑然失笑，若有所思地扪心自问：人世间什么叫“得”，什么叫“失”呢？既然无所谓得、失，那你又为何发笑呢？先生自问自答道：我是在笑自己呢；然而也是在笑唐代文人韩愈。韩愈喜欢垂钓，然若是钓不到鱼，就想走得远点的，而不懂得钓鱼者只是为了自得其乐，未必是意在钓鱼。

这篇文章的关键，在于结尾处的“自笑”与“亦笑韩退之”（韩愈字退之）两层意思。一是笑自己还没有摆脱患得患失，不能超然物外；二是笑韩愈钓不到鱼就走开，终不能沉醉于垂钓之中的自得其乐，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确有功利主义之嫌，可堪一笑啊！韩愈的朋友侯喜曾约他去钓鱼，结果守候一天，手酸目劳，只钓得一寸左右的小鱼。韩愈曾作诗慨叹，认为此生“行事尽如此”，不得志焉，希望能去远处深水中钓得大鱼。而苏东坡则肯定那种大道自然、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说是钓鱼的人，未必是为了钓到大鱼才来垂钓，坐在河边垂钓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但这乐趣也只有本人知道，至于那种在一旁追问“为什么不去钓更大的鱼呢”的人，是不明白自己的可笑的。东坡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念头。东坡“放杖而笑”，并追问“孰为得失”，他笑的不就是那些不明得失或放不下得失的人吗？这是作者老庄思想的反映。苏东坡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在潦倒落魄、贬官边荒之地的不得意之时，多神往或心仪于老庄，在老庄思想的支配和影响下，力求取得心理的平衡。

（徐康，四川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现名誉副主席，一级文学创作职称）

永远的苏东坡

——《寻访东坡踪迹》序

张志烈

2009年10月25日，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参观四川眉山三苏祠后，书写了一纸题词：“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永远的苏东坡。”我完全赞同水照先生的话。我认为此言精湛地包慨了广博深厚的道理，启迪人们多方面的思考。

在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史上，“苏东坡”三个字能够引出的话题可说是无穷无尽。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说过的一段话就是一例：“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林语堂先生这里所提到的和他尚未提到的东坡丰富复杂的特殊人生呈现出的文化遗产、精神世界，说其广阔无边，并不为过。

在中国历史文化天空中，苏东坡是一颗文化巨星，雄视百代，传承千载，永恒地放射着光和热。2009年9月9日，在徐州召开的全国第十六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写了一首小诗：

泉源万斛溢芳馨，亘古眉山降巨星。
兼容百家求大道，纵横三教本真灵。
尧风舜雨仁天地，韩笔杜诗并古今。
盛会徐州同仰止，开来继往属群英。

这几句话，只是我对东坡文化精神简略的总体印

象。通过对苏轼主要著作的学习和其一生立身行事的思考，我曾冒昧地提出东坡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有以下四点：

(一) 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这是指他自觉担当社会责任的政治信念。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他的基本思想。重民爱民的思想感情在他涉及民生的各类文章和诗歌中有很多表现。他一生为官的实践中处处为人民做好事，他的政绩，正是他的崇高政治理想见于事功的折射。莫砺锋先生说：“对于苏轼来说，儒家的仁政思想已经成为沦肌浃髓的自觉信念，为百姓解除疾苦已经成为他的本能行为，他在地方官任上的责任感一直延伸到解职之后。”(《诗意人生》14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

(二) 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说真话，凡事调查研究，独立思考，绝不盲从，是其认识上的最大特点。他对待各家学说，兼收并蓄，但尤为重视其合于实际、有益世事的部分，“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上曾丞相书》)他在政治实践上，先后与王安石、司马光的争论，也都缘于他这种出以公心、求实求真的认识追求。

(三) 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这是他一生坚持正确认识而绝不动摇、不随风倒的行为准则。“岂有意于为异，盖笃信所闻。”(《徐州谢上表》)最集中体现这个精神的是元祐二年(1087)所写《与杨元素书》：“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

这封短信是东坡坚毅精神、独立人格的鲜明表现。明乎此，他诗、文、词中流露的许多不惧打击迫害、坚持独立人格尊严的意象都可以贯通理解了。莫砺锋先生评此云：“这种一心报国，只考虑国家利益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正是苏轼政治品质中最为耀眼的闪光点。……若与混迹于新旧两党以谋私利的吕惠卿、刘挚之流相比，或与遇事从不表态的‘三旨相公’王珪相比，苏轼简直像是杜诗所说的‘万古云霄一羽毛’。”（《诗意图人生》141页）

（四）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他有内在的坚强节操，认识到的东西，不放弃，不妥协，但外在有巨大的适应性，乐观顽强，随遇而安。在一次次严重打击下，他的心理总是呈现为这样的结构：用表面上的豁达、自适、排解、超脱来掩护、疏通内心的激烈愤怒和深沉痛苦，这痛苦包藏的乃是不屈与坚强，这坚强不屈的根基，则是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民本思想、仁政情怀，而这个信念的形成，则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北宋社会矛盾与其生活实践相激砺的结果。贬到黄州时所写《与李公择书》云：“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这封信也是他善良、忠诚、坚毅、顽强的心灵的投影。有名的《超然台记》就是写他超然物外、所遇斯乘、无往不乐的生活体验的。所谓超然，就是游于物之外，就是不为物所蔽，就是清醒地审视现实、转换视角，以跳出目前情境的局限，以超越的心态看待眼下困境，从而智慧地在当下找到维持身心内稳的有利因素，化为精神解脱的良药，以保持自己诗意图人生的态度。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苏轼，苏轼融汇传统而以自己的丰富生活实践在各个文化领域开拓创新，对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的文化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和缩影。

以上说这四点，只是我在学习东坡文化精神中感觉到的“线索”，当然是远远地“不全”、“不完”、“不透”的。苏海汪洋，气象万千，沿着这几点线

索，到浩瀚的苏海中游弋，迎接我们的将会是无穷无尽的宝藏。我初步感觉到有三个领域是应该继续不停地深入探究下去的。

其一，是东坡的全部著述。他一生都广泛学习，独立思考，勤奋创作。传存至今的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专书《易传》、《书传》、《论语说》及其他杂著，还有书法作品、绘画作品。这些著作都是他丰富人生经历和超凡创造能力的结晶，是这个星球上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莫砺锋先生说：“如果把文学与艺术两方面的成就综合起来予以考察的话，苏轼堪称千古独步，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他并驾齐驱。”（《诗意图人生》145页）

其二，是他为了实践自己的理念，一生踏实地投入生活实践而成就的全部事功。从少年读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参加科举考试踏入仕途，在外任地方官十多年、历典八郡，在朝中任职八年多，位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因为坚持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淑世情怀，凡事出以公心，求实求真，卷入政争，屡遭打击，而他却不改其度，所到之处勤恳地为民众办好事。在凤翔，改革“衙前”役法。在密州拿出库粮收养弃儿。在徐州，为保护人民而奋勇抗洪救灾。在杭州，整治西湖，便生产，利民生，还捐钱设免费病坊。在扬州，废除扰民的“万花会”。贬到惠州，还捐钱为当地修桥，帮助地方官建成广州历史上最早的自来水工程。在这些“事功”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经验和道理，对后世具有巨大的认识和借鉴价值。

其三，是他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东坡即以文采才华流芳百世，同时也以超凡的人格精神光耀青史。莫砺锋先生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生前做出重大建树、身后受到广泛爱戴的杰出文化文物不在少数，但如果把雅俗共赏、妇孺皆知作为衡量标准的话，苏轼堪称古今第一人。”（《诗意图人生》150页）人格是指人内在的文化品质。人格的形成是时代环境所决定之外文化的内化。东坡一生踏实学习、勤勉创作，一生努力工作、尽忠职守，一生爱国爱民、为社会办好事，一生说真话、碰钉子，一生坚强不屈、乐观豪放。他的全部认识、思想、行为、追求、意志、气节，融贯升华，显现为一个完整的为绝大多数人仰戴、尊崇、亲近、喜爱的活泼泼的形象。这形象处处散射出真善美的光辉而魅

力无穷、影响广远。

所以，我觉得上述三个领域确实还有很多等待我们去学习、钻研、阐释、宏扬的深刻内容。

景仰、尊崇、热爱，以巨大的能量，推动着认识和研究。

自宋元明清至近世，整理、编辑、诠释、评论苏轼著作的各类成果，已经多得惊人了。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多年中，见诸报刊杂志的研究文章近四千篇，各体专著多达百余部。苏轼诗、文、词集的新校注，年谱的新编写，传记、评传的多角度、多风格的撰述，以及各类选本、赏析集、研究论文集等等，真如雨后春笋，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万紫千红总是春。牡丹的富丽，不会掩盖海棠的浓艳，玫瑰的鲜娇，也不能取代紫罗兰的幽韵。从总体看，所有这些形态的著作，都有其存在的需要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此同时，人类文化传播还有一个深层次的规律，就是永远在寻求探索更能激发人们的兴趣、更具揭示性、更简便、更灵活和更有创意与吸引力的新的传导方式。新奇的感受无尽，新颖的阐释无限。韩国强先生的这本书就在这个方向上呈现出了新的努力。

《寻访东坡踪迹》已是第二次再版了，国强先生希望我写几句话。我在拜读了他寄来的书稿后，心里涌动着两点强烈的感受。

第一，是感到特别的亲切。我和国强先生一处西蜀，一在海南，相隔大半个中国，是因了苏东坡这个唯一原由，才相识交往的。1980年9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在四川眉山成立，首任会长是杨明照先生，四川大学中文系的邱俊鹏先生、曾枣庄先生和我分别担任秘书长和副秘书长。我们坦言这是为东坡的事“跑腿”，这一跑就是几十年。为联络各地学者，筹组每次会议，我们结识了国内外苏学研究的许多朋友。韩国强先生是1982年11月到湖北黄冈参加第二届学术年会时我们认识的，到今天已经三十三个年头了。此后，多次会议我们都一同参加。我还在1987年12月到海南参加纪念苏轼贬儋89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5年7月到海南儋州参加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八届年会，而这两次会国强先生都是主办方工作人员。我们的会议都是在有东坡遗迹的地方开，所以每次会议都自然包含着寻访东坡踪迹的活动。韩国强先生这本书中所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他和我们与会者同样经历过的事。但是，说来很惭愧，我是个粗疏大意的人，这些美好

的感受，当时没有用文字记下，以后也就没有机会另写了。国强是个精细的有心人，他把每次会议中寻访东坡遗迹的时间、地貌、历史情态、今日风光、即目所赏、会心神驰、洞然感悟与无边联想等都用美妙的语词凝固下来。现在，我一读他这些文章，就如重新回到当年的情景，沉浸在无限回味中，亲切之感，真是难以言表。

第二，是发自内心的钦佩。写东坡的文字，可以有很多角度、很多层面、很多形式。这本书的用笔，为了解东坡一生的事迹、成就、思想、精神、品质、风范，找到了一种很灵活、很真切、很轻松、很明快、很优美的形式。全书的神情、气氛，仿佛跟随东坡一世，活现东坡一生，融贯千年与当今体验。具体体现为景真、意深、情茂三个突出特点：

景真，是对事件、景物的描绘鲜活生动，真切感人。如《西湖遇雨》文中开头描绘西湖的文字：

正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时节，我们结伴在杭州西湖泛舟。红日高照，5.6平方公里的西湖，波光粼粼，荷花盛开，空气中飘散着花香。远处山峦叠翠，似骏马奔腾。湖中苏堤，绿柳婀娜，像一条彩带湖中绕。石塔、曲桥、亭榭倒影水中，画舫往来穿梭，摇碎一湖倩影。

又如《古槐风姿》描写定州文庙内东坡亲手栽的槐树：

现在定州文庙内还保存苏东坡亲手栽种的两棵槐树，人称龙凤槐。院内东边那棵为凤槐，树身粗大，大约三人才能合抱，虽然年代久远树身已朽裂，但枝繁叶茂，充满活力；西边那棵为龙槐，如铁塔立地，树皮苍老。龙槐没有凤槐粗大，但它完好无损，树叶葱茏茂密。两棵古槐仿佛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令人立即想起罗中立油画中父亲布满皱纹的脸。经历了近千年风雨的磨难，古槐依然青春焕发。一阵清风吹拂，树叶沙沙，好像古槐在向游人深情地诉说历史的沧桑……

都写得具象、真实、鲜明，情怀跳跃，极富感染力，读来使人如入景中。全书中此类文字，俯拾即是。

意深，是把所探访的景物，与东坡生平、思想、品质、文化内涵的联系，通过广泛深细的典籍研读，有透彻灵活的理解，因而善于聚焦思路，由一处短暂的游历，扩展引导出丰富的思考内容。如《永远

的雪泉亭》最后一段：

我盘桓于亭子下的平地上，仿佛看到苏轼为民解除旱灾，奔波于常山祈雨，虔诚地对着苍天，念祭常山祝文……

我走进诸城市人民政府重建雪泉亭的石碑，那碑文使我眼前一亮，心中的谜团顿时烟消云散：“为缅怀苏公爱民之德，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发掘科学政论，淘泉固井，择石建亭，复原苏公手书雪泉亭记碑，以应乎民心，顺乎民意。”

雪泉亭在历史的风雨中毁坏，又在当今盛世中重生。它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坐落在翠绿的山坡，向世人昭示什么呢？诸城市人民政府重建雪泉亭碑记就是最好的答案。苏轼爱民事迹永存，雪泉亭不倒。

啊，永远的雪泉亭！

可谓思若水流，意如泉涌。又如《徜徉放鹤亭》的末尾：

放鹤亭是古往今来人们的游览胜地。乾隆皇帝曾四次登云龙山拜谒放鹤亭，并御笔书写苏轼的《放鹤亭记》。毛泽东在游云龙山时曾称赞《放鹤亭记》文情并茂，成为流传千古的著名散文。人们钟情于放鹤亭，正好印证一位伟人的那句话，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想，如果苏轼在徐州没有抗洪保城的壮举，没有祈雨救灾的虔诚，没有寻煤冶铁的执着，绝不会赢得徐州人千秋景仰和缅怀。我在徐州会上会下，常听到徐州人自豪地尊称苏轼为“我们的老市长”。我觉得这句话虽平常而分量却很重。它流露出徐州人感恩的高贵品质和对苏轼景仰的深情。徐州是全国几个保护和修复苏轼遗址作出显著成绩的城市之一。

重大而朴实的道理从叙述中自然流出，沁人心脾。全书中如此行文，多不胜举。

情茂，是由事实胜于雄辩，情感植根于对真理的感悟而来；事理明则对事物的态度明、体验实，情即由之而生矣。如《爱山台前的沉思》的末段：

站在爱山台前，想起“乌台诗案”，不由自主地沉思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恶作剧越演越烈。翻开中国历史，记载着一桩桩鲜血淋漓的文字狱。它让人们清醒地看到：昏庸无能的帝王，最害怕社会舆论，往往用文人开刀，杀鸡给猴子看，以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

地位；而那些小人，抓住帝王的心理，用文字狱陷害异己，最容易得逞。封建皇帝被小人利用，“乌台诗案”就是一例。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正直的文人怎能逃脱文字狱的罗网？！幸好历史由人民来写。

精粹、深刻、明白、自然，读来自觉气盛言宜，极有感染力。又如《观赏雪浪石》中的一段文字：

普天之下，石头漫山遍野，可谓千姿百态，目不暇接。太湖石皱透漏瘦，英石峥嵘奇崛，钟乳石亭亭玉立，雨花石玲珑剔透，色彩斑斓……值得赞赏的石头比比皆是，为什么苏东坡却偏偏钟情于雪浪石呢？

我凝视雪浪石色彩魅力的花纹，仿佛看到东坡那颗心还在跳动，那个不灭的诗魂还在关注着人世苍生。那年，苏东坡带着抑郁的心情离开朝廷。宋王朝风云突变，御史董敦逸和黄庆基等无中生有，诬陷东坡“讥斥先朝”，“以乱朝政”。哲宗偏听偏信，把苏东坡视为旧党，加以排斥。苏东坡从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被贬为定州太守。他贤慧的妻子王闰之则是在不久前离开人世。沉重的打击，使东坡迷惘、失望。他在细雨纷飞中告别弟子由，凄楚地说：“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天灾人祸如大石掷落平静的湖中，激起不尽的波澜……

雪浪石的花纹不正是苏东坡谪居定州时的不平心绪的写照么？我恍然大悟。

精美的文字中包裹这独特的感受——激情奔涌下的辐射思维。全篇都是这样以情纬文，神通千载！

以上两点，是我读完本书成稿后的浮光掠影的体味。

东坡《和子由渑池怀旧》前四句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记东西。”我们今天寻访东坡踪迹，就是从东坡留下的“雪泥鸿爪”去探索、认识、体悟，弘扬东坡伟大文化精神。后之视今，尤今之视昔。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还记录了当代学人和遗迹所在地政府部门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对后人来说又成了新的“雪泥鸿爪”，蕴含着我们这代人对祖国文化先贤苏东坡的无比崇敬。

（下转第71页）

中国文化的大雅之音

王书华

《苏轼全集校注》于1982年正式启动，直至2004年底完成初稿，然后几经修改，于2006年底全部书稿交河北人民出版社进行编辑加工，2010年10月正式出版，历时凡28年。真可谓数十年磨一剑。2011年该书获得北方十五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2012年该书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2013年该书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苏轼是宋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作品丰富，计有诗二千八百多篇，词三百多首，文四千五百多篇，其数量之巨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质量之优则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之代表。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许多领域都富有创造性，堪称开宗立派的人物，无论是诗词、文赋，还是书法、绘画，皆有极高的造诣。南宋时期苏文盛行，以至于出现了“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的谚语。苏文更是以多种方式刊行，有诗文合刊本，如《东坡集》、《东坡后集》等；有苏文单刊本，如南宋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有某一体裁作品的结集，如书简；有某一时期作品的结集，如《应昭集》前五卷；首次把苏文单独编辑在一起，是明末茅维的《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南宋以来，苏轼的诗、词曾有多种注本，然而，由于卷帙浩繁、难度太大，千年未苏文始终没有详尽的注释，遑论详细而可信的编年。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是南宋惟一的苏文注本，但此书名为文集，实为选集，选录苏文不足五百篇，文字亦时有疏漏，注释则甚为简略。到了明代，出现了收罗相当完备的《苏文忠公全集》，但仍然未对苏文作注。苏文的编年，只有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中有较多涉及，今人吴雪涛的《苏文系年考略》曾做过比较系统的工作，但是两书的编年皆不尽可靠，况且还有数百篇苏文未予编年。

近年来，苏轼著作出版颇夥。常见的版本有珠海出版社的《苏轼全集》，中华书局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语文出版社的《三苏全书》等。珠海版《苏轼全集》只有苏轼作品原文，没有任何创新因素和附加内容，且校勘不精、错讹频出。中华版《苏轼诗集》、《苏轼文集》，虽然在校勘、辑佚方面贡献巨大，却未作注释，亦未作编年。语文版《三苏全书》是包括苏洵、苏轼、苏辙在内的三人著述总集，该书搜罗之功甚巨，且附有集评，颇便查阅，但缺乏系统注释，更无详尽编年，且校勘欠精。

《苏轼全集校注》以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和龙榆生笺《东坡乐府笺》为底本。孔凡礼先生点校的《苏轼诗集》，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孔本以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底本，收诗2820多首，辑佚29首，为目前收诗最全、资料最富的一部苏轼诗集。孔凡礼先生点校的《苏轼文集》，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后再版时有增补。孔本以茅维《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校点时，孔先生搜集了大量苏轼佚文，编成《苏轼佚文汇编》七卷、《苏轼佚文汇编拾遗》二卷，该本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收集苏文最全的版本。龙榆生笺《东坡乐府笺》，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由清代著名学者朱孝臧编年校注，近代词学大师龙榆生作笺，是当今研读苏词不可或缺的文本。书首汇集《东坡先生墓志铭》、东坡词评等苏轼研究资料，正文包括本文、校记、朱注、龙笺等内容。苏词本身之优美精彩固不待言，朱、龙二位大家的笺注，考证详实，注解精到，真可谓珠联璧合，锦上添花。《苏轼全集校注》以上述三书为底本，广泛参考其他版本，择善而从，校必有据，对苏轼的诗、词、文作了“五通”工作，即通收、通校、通注、通编、通评。（下转第73页）

采访徐新民侧记

陆明德

今年3月6日，江苏省电视台、南京电影制片厂向徐新民老师发函《关于恳请协助拍摄二十集高清电视纪录片〈诗书继世长〉的函》，其中说：“本台摄制的20集高清电视纪录片《诗书继世长》，是一部以独特视角深入阐发古诗词文化历史、思想精髓以及后世影响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本片将以解析古典诗词丰富的文化传承、思想内涵为主，挖掘诗人的人生故事和时代背景，结合名篇、名句以及诗词背后的故事，用艺术的手法形象生动地展示我国古代诗歌的卓越成就，通过专题片的方式进一步深耕中华沃土，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摄制组将于2015年3月至11月在全国各地相关景点进行拍摄工作。年底，该片将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台、江苏卫视隆重播出。”来函要求徐新民老师就苏轼在徐州的有关问题作好采访准备。

今年3月26日上午，江苏省电视台、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组一行四人，在张磊主任的带领下，来到徐州市建国西路绅士花园徐新民家中，就苏轼评价、知徐事迹和《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五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三方面的问题，向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兼苏轼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徐新民先生进行专题采访，采访地点就在徐老师书房，两部摄像机分别架在书房的西北角和东南角，由张磊主任提问，徐新民老师解答。

侧记如下：

摄制组：作为苏轼文化的研究者，您如何评价苏轼？

徐新民：苏轼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历史上早已形成共识、定论，不再赘述。除此之外，我以为苏轼还是一位伟大的民本主义者。在我国，乃至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例如，王国维评价：“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庄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这里，王国维是从“人格”上评价苏轼。王安石原来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如果他支持王安石变法，一定可以平步青云，但是他却站在司马光一边，上书皇帝，批判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任宰相。在短短的两年中，苏轼从一个“罪臣”提升了六个品级、十二个官阶，距离宰相之位只有一步之遥。可是他又不同意司马光尽废王安石新法，主张保留其中利民部分。因而又失去一次接任宰相的机会。这就是苏轼人格，特立独行，古今能有几人！

再如，2000年，法国《世界报》在评选1001～2000年间世界级杰出人物的活动中，共评出12位杰出人物，称为“千年英雄”，苏轼是中国唯一入选者。这说明，苏轼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例三，改革开放以来，苏轼研究是学术界最热门的课题之一。以眉山为代表的16座城市先后成立了苏轼研究会。苏轼传记、年谱、专著、专题片、电视剧、专业报刊，层出不穷。这说明，苏轼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当代的——他的思想、精神，在当代还在发挥着很大作用。

例四，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的重要讲话，先后七次引用苏轼名句。这说明，苏轼的名言，包含着治国理政的哲理，闪耀着经国治世的光芒。

我认为苏轼精神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为人民粉身碎骨，也不为了保全官位而出卖灵魂，放弃人格。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所以王国维说：“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摄制组：苏轼在徐州有哪些主要事迹？

徐新民：苏轼与徐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

轼从 26 岁为官到 66 岁逝世，宦海四十年，三次在朝，十二次外任，八州太守，官至三品，三次被贬，一贬到底。

苏轼的辉煌期是在任八州太守期间。可惜的是，他的实际任期时间只有七年五个月。密州二年，徐州一年十一个月，湖州三个月，登州五天，杭州一年八个月（不含通判时间），颍州八个月，扬州四个月，定州七个月。在时间上，徐州虽然居第二，但却是苏轼一生中政绩和诗词文赋创作的辉煌地。

苏轼担任徐州知州，到任时间为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离任时间为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七日前后，共一年十一个月。

最突出的业绩要算抗洪保城济民了。

熙宁十年（1077）秋，河决澶渊，滚滚东来，直逼徐州城下，吏民疲于守御。直到十月十三日，河复故道。苏轼喜作《河复》表示：这是我的“守土之志”啊！

透过以上文字，一场惊心动魄的抗洪历史画面，穿越时空，又展现在我们面前。

苏辙在《黄楼赋》中对苏轼抗洪过程作了最经典的描述和概括。

水未至，则未雨绸缪，向百姓表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故水至而“民不恐”；水既至，则身先士卒，结庐城上，坐镇指挥，与城共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溃”；水退后，则不存侥幸，增筑外城，筑木堤捍之，故“民益亲”。

苏轼非常崇拜他的前辈范仲淹和欧阳修。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说：“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在任时，百姓觉得处处方便；离任后，百姓还常常怀念他。如此看来，苏范与苏欧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苏轼为纪念这次抗洪胜利，在东门城垣之上建一楼观，涂以黄土，取名“黄楼”，含有“土实胜水”之意。九月九日重阳节，邀请天下才子齐聚彭城，举行隆重庆典。从此，黄楼成为苏轼在徐州的一座巍巍丰碑，“黄楼诗会”也成为中国文坛的一段千古佳话。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真正的生活也是由四十岁才开始，进入他的徐州时期，也就是他的‘黄楼’时期”。

随着历史的变迁，黄楼几经兴废。1988 年，黄楼重建于庆云桥东故黄河畔。巍巍黄楼，金光闪闪，顶天立地，它不仅是抗洪保城济民的胜利象征，而

且成了苏轼在徐州执政为民的永恒符号和历史丰碑。

白土寻煤和利国冶铁是苏轼知徐期间第二大功绩。

苏轼在《石炭并引》中说：“彭城旧无石炭（煤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

苏轼知徐州前，徐州一直没有发现煤炭，只能以薪柴作为燃料，山林破坏严重，彭城周围山林基本上都变成了秃山。当时，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已经发现煤炭，并开采使用。苏轼便派人到徐州西南白土镇寻煤采煤。一部分供应彭城，一部分运往利国监，加快冶铁步伐，提高铸剑质量。

苏轼的《石炭并引》形象而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场面：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

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墬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

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苏轼的《石炭并引》，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中独树一帜。在此之前，李白写过一首《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苏轼的《石炭并引》又登上诗坛，成为文学史上工业诗的“双壁”。

苏轼的《石炭并引》意义，早已超越了诗歌本身。一是揭开了徐州开采煤炭的序幕，奠定了徐州今日“百里煤城”之基础。二是开启了煤矿文化的先河，形成了徐州人的“煤炭精神”——燃烧自己，照亮世界。

除此之外，诸如汉王祈晴、石潭祈雨、雾珠祈雪，劝农耕桑、体恤民情，业绩煌煌，留下一串串闪光的脚印，青史可鉴。

摄制组：最后一个问题，请您结合《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五首》，谈谈“第一调第一人”在文学史上词体改革上的意义。

徐新民：苏轼知徐第二年，“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所以去石潭祈雨。一场喜雨之后，苏轼又去谢雨。一路之上，看到麦收时节欣欣向荣的田园风光，写了五首《浣溪沙》。

《浣溪沙》是唐代教坊乐曲，双调42字，上片三平韵，下片两平韵。由于使用频率极高，被誉为“天下第一调”。

诗言志，词传情。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主流和正宗。到了晚唐和五代，词体逐步兴起，但只言情，词风香软，多写宫闱、闺房，堆砌词藻，卿卿我我，缠缠绵绵。而苏轼在这五首《浣溪沙》中，第一个突破了这些樊篱陋规，旧瓶装新酒，代之以写农村、写农民、写农耕，开启了《浣溪沙》的新境界。所以，苏轼被誉为革新《浣溪沙》的“第一人”。从此《浣溪沙》这种词体便由“旧时王谢堂前燕”而“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文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

大家可以读读这五首《浣溪沙》体会一下其中的奥妙。

第一首：“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家说与采桑姑。”

第二首：“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蒨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鸟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第三首：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麯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第四首：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第五首：“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其一，这五首词，移步换景，一步一景，一景一画。五首词，五幅图，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色彩美，音乐美，生态美，人物美，兼而有之，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和美学价值。

其二，反映出宋代徐州乡村自然优美的田园风光和生态环境，反映出苏轼知徐期间，官民之间，亲密无间，无拘无束的鱼水深情。真乃一组“官民同乐图”，是宋代时期最经典的“徐州风俗民情画”。

其三，苏轼为民而忧，为民解忧；为民而乐，与民同乐，与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与民同乐”，异曲同工，一脉相承。这就是苏轼的民本情怀。

除此之外，苏轼在徐州留下363篇作品。其中诗193首，词赋28首，其它141篇。另外，还有

在外地写徐州的39篇。这些诗词文赋，记录和见证了它的辉煌业绩，反映和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和治国理政的政治主张，成为徐州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苏轼文化”。九百年来，绵绵不断。他的道德观念、思想品格、潇洒形象，已经溶入到徐州人的血液里、骨髓里，活在徐州人的心里、脑海里，成为徐州人的精神追求。所以说，徐州又是苏轼诗词文赋创作的辉煌地。

采访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徐新民老师妙语连珠，慷慨激昂，说理深透，得到摄制组的一致好评。

（陆明德，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上接第67页）

本书的前两版分别由孔凡礼先生和朱清华先生作序。两位先生都是我很熟悉很敬仰的前辈学人。他们的著作和学术活动与当代的苏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写到这里，我心中充满着对两位先生的尊敬和怀念。

历史上，正是由后人对东坡的“雪泥鸿爪”的不停探索，才构成了苏学的研究史与接受史。我们现在仍然不懈地行进在希望说得“更全”一些、“更完”一些、“更透”一些的路上，因为我们心中崇拜的是一个“永远的苏东坡”！

2015年春节于川大花园

（张志烈，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

一样的东坡，不同的视角

——《华夏地理》专题推介苏东坡

冯 扬

2015年3月，旅游地理类杂志《华夏地理》以《中国古代生活家苏东坡》为题，专题推介苏东坡，充分展示了苏东坡一生的多彩生活。

“苏轼之于我们的意义，是他对生命经验深度和广度的开拓，是对他日常生活永不衰减的热情和想象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文人比他更丰富多彩，比他更有创造力，他是生活的大师。”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作家于坚沿着苏轼的足迹“去朝圣”：眉山、开封、杭州……黄州、惠州、儋州。

一路走来，边走边聊，于坚以独特的笔法，把读者领到一个个的朝圣地。“在苏轼足迹之处，我走走停停，但发现已经很难在空间中找到他的痕迹，甚至，他歌咏过的大地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面前，大多已经面目全非了。”在这大多面目全非的日新月异的大地上，苏轼“诗文中所暗示的世界观”，“依然深得人心”，依然引领着千百年来无数的朝圣者。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于坚去年8月下旬可能带着同样的问题，来到黄州“朝圣”。

黄州，长江中下游的一座小城。因“东坡五载黄州住”，由穷山恶水的“僻陋小镇”发展到“遂为名邦”。北宋元丰三年二月初一，苏轼来到这里，过上了“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被监视居住的生活。也是在黄州这座小城，苏轼实现了向苏东坡的转变，正如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所说：“苏东坡经历

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开玩笑的人。”在黄州期间，“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求罪所从生”，“寓居定惠院，随僧疏食”。也正在这样的生活中，苏东坡想像中的美好生活，也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田园牧歌式的，躬耕东坡、泛舟赤壁、饮酒赋诗、游乐访友。黄州的生活，孕育催生了流芳千古的诗文《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黄州，成为了苏东坡的天堂，没有被监视的苦恼，连“垦辟”后的劳累也消失了。有的是“夜饮东坡醒复醉”，“纵一苇之所如”的逍遥。“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黄州，因与东坡的壮丽对话，使得全城弥漫着苏东坡的气息：赤壁、安国寺、定惠院、临皋亭、东坡、雪堂、承天寺、天庆观。而今依然还留存着的只有赤壁和安国寺了，再就是东去的大江。

在赤壁，得“虔诚恭敬，不敢逞才使气”。对一路走来的朝圣者，无不表示深深的虔诚和恭敬。这里，是对一位圣者的供奉，是对一个震古烁今的

大家的瞻仰，是对一个文化坐标的观点。赤壁文化支撑着黄州文化，使黄州成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为了传承弘扬东坡文化，黄州的执政者在尽力保护赤壁的文物和自然生态的同时，斥巨资修建了一个“遗爱湖公园”，把东坡文化嫁接在这个市民休闲的公园内，让更多的人感受东坡文化，使得东坡文化在黄州得以普及。

苏东坡的精神遗产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展现，他在黄州，“其实不过是下野、归隐，没有人要改造他的世界观和政见，他可以继续执迷不悟，而且优哉游哉”，过着种地、盖房、号脉看病、交朋结友、饮酒赋诗的生活。这对于一个中国古代的生活家来说，是真正的懂得生活、善于生活。

于坚的《中国古代生活家苏东坡》在《华夏地理》刊登，《华夏地理》涉及地理、生物、科技、考古等各方面内容，从多种角度深度报道不同主题。作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中国大陆的唯一合作伙伴，延续美国《国家地理》120年来探索世界、关爱地球的理念，以震撼的摄影图片和独到的深入报道关注人与自然环境、人的生存状况，并涉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学与生态学。

《中国古代生活家苏东坡》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沿着苏东坡的足迹，深度解读了一个热爱生活的古代生活家形象，阐释了苏东坡的内心世界。穿越时空，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很难在空间中找到他的痕迹”，只有“藉着”苏东坡“不朽的文字”，“再次觉悟何谓生活”，“再次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冯扬，黄冈市赤壁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

（上接第68页）由于这“五通”工作，使得该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可靠的苏轼诗、词、文全集，同时也为苏轼研究、宋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部可资凭借的资料。

《苏轼全集校注》的主要学术贡献如下：一、增补校正了大量苏轼作品尤其是苏文的编年；二、校勘与注释相结合，根据诗意、词意、文意去取；三、注释旁征博引，释古典与今典相结合，务求疏

通文义；四、辨伪，苏轼文集多他集互见者，校注于底本未及处，一一列出，或详辨其所属，或仅列其所载；五、文后附录主要征引与该文本事（即写作背景）的相关资料，引乌台诗案和宋人笔记别集；六、集评主要征引古人对该诗、词、文写作旨趣、艺术技巧、风格特点、文学价值等方面的评论资料。

《苏轼全集校注》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集体承担的项目，最早由著名学者杨明照先生主持，其后由成善楷先生主持，最后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教授主持，是集三代学人、二十余年之力而完成的一项艰巨而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对苏轼诗、词、文的总结性而又为开创性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出版前，即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入选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基金资助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燕赵精品工程重点项目、四川大学“九八五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项目、四川大学“二一一工程”中外文学与俗文化重点建设学科项目等多项桂冠。

该书出版后，更是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著名学者许嘉璐先生称赞该书嘉惠士林，为功匪浅，是苏轼在世和身后最全、最好的本子。中华书局原总编辑、清华大学教授傅璇琮先生称该书学术价值很高，校勘、注释、集评都具有很高水平。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资深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孙钦善先生称该书在校注古人别集方面上了新台阶。《文学遗产》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陶文鹏先生称该书对于推动苏轼和北宋文学研究，推动其他古人别集校注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长江学者、南开大学教授张毅先生称赞该书为“金声玉振之作”，“中国文化的大雅之音”。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撰文称赞《苏轼全集校注》是苏轼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

（王书华，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编审、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韩国苏轼研究述略（二）

[韩]洪瑀钦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丽文人慕名的苏轼，因丽、宋、辽的国际政治关系，写了很多奏状，提出了对高丽非常不利的主张。按其文集，北宋哲宗元祐四年，54岁的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七月到本州任所，审查高丽、宋、辽三国的国际关系以后，写了《论高丽进奉状》、《论高丽进奉第二状》、《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论高丽买书利害劄子三首》等很多奏状，强烈表达自己对高丽使臣来宋行动的意见。他在《论高丽进奉状》中说：

臣伏见熙宁以来，高丽人屡入朝贡，至元丰之末，十六七年间，馆待赐予之费，不可胜数。两浙、淮南、京东三路筑城造船，建立亭馆，调发农工，侵渔商贾，所在骚然，公私告病。朝廷无丝毫之益，而夷虏获不赀之利。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契丹。虽虚实不可明，而契丹之强足以祸福高丽。若不阴相计构，则高丽岂敢公然入朝中国？有识之士，以为深忧。

自二圣嗣位，高丽数年不至，淮、浙、京东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间凶险之人，犹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闻其事，方欲觉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颍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阇黎。”臣已指挥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选差职员二人，兵级十人，常切照管，不许出入接客，及选有行止经论僧伴话，量行供给，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画一，奏禀朝旨去讫。

又据高丽僧寿介有状称：“临发日，奉国母指挥，令赍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

圣寿。”臣窃观其意，盖为二圣嗣位数年，不敢轻来入贡，顿失厚利。欲复遣使，又未测圣意。故以祭奠源阇黎为名，因献金塔，欲以尝试朝廷，测知所以待之之意轻重厚薄。不然者，岂有欲献金塔为寿，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国母之意？盖疑中国不受，故为此苟简之礼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则贪心复启，朝贡纷然，必为无穷之患。

从这篇奏状，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十一世纪丽、宋、契丹三国的地理上的关系和互相追求的利害得失之实际情况。站在当时高丽朝廷对宋外交的立场来想，苏轼认为丽、宋交往对宋有“无穷之患”的观点，可能使高丽朝野难免处于困境。苏轼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所说的对宋有“五害”之论也是一样。所以，高丽朝廷大臣和贸易商人，都认为知杭州苏轼这个文人，是对宋外交和贸易上很讨厌的、很害怕的、很头痛的存在，在当时国际利害得失上，他是一个很麻烦的存在，而“苏轼”这一个文人的名字，对高丽朝野的印象，越来越更清楚而深刻，街童井妇也没有不知苏轼声华的。

三 高丽文坛为了改革骈文而需要苏轼流畅的古文

公元918年，泰封国将军王建，逐其国王弓裔之后，击灭后百济、受纳新罗的降服，到了935年，才建立了高丽国。王建在政治上，虽然灭亡新罗，而在文化政策上，犹继承统一新罗的文物制度。他将儒、佛、道三家思想作为建国理念，注力于崇文灭武之政策^[1]。所以，统一新罗时代崔致远等遣唐留学生，由晚唐文坛输入而流行的四六骈俪体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到高丽前期也未变，发展到第四代光宗实施的科举制度，用骈俪文体考试；其后累代好文君主与文士，不顾民生之疾苦，昼夜饮酒酬唱，越来越颓废的文风蔓延于文坛。徐居正《东人

诗话》卷下云：

高丽光、显以后，文士辈出，词赋、四六，浓纤富丽，非后人所及。……高丽光宗始设科，用词赋。睿宗喜文雅，日会文士唱和。而仁、明亦沿儒雅忠烈，与词臣唱酬，有《龙楼集》。

这段话，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在高丽前期文坛流行之文学作品，就是浓纤富丽的词赋、四六和国王与文臣昼夜酬唱而不顾民生陷于涂炭之状况。结果，上流支配阶层的文臣极度享受奢侈欢乐之生活，而老百姓和武臣，难免饥寒困穷之痛苦。如此不健全的唯美主义文学和社会阶层间之矛盾，使有志之士，不禁嗟叹，忧患之心油然而生。

在这时，由往返宋朝的使臣，传入宋朝文人排斥四六骈俪文而复兴古文的新文艺思潮的消息。在这消息当中，弱冠青年苏轼以“随物赋形”、“充满勃郁现于外”等文学观，写了一篇自由奔放的古文如《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等当时天下第一流的名人贤士，待之以国士之礼的风闻，颇能振动沉于浓纤富丽的词赋、四六文的高丽文坛。因此，对浮虚纤靡的骈文很不满意的高丽文人，才批评科举文（时文，场屋文）之缺点，而尊崇古文之优点和价值。高丽中期，所谓海左七贤中之一的林椿，在《与眉叟论东坡文书》（林椿《西河集》卷四）中曾经对苏轼文学有如下论说：

仆观近世，东坡之文大行于时，学者谁不服膺呻吟？然徒玩其文而已，就令有挦扯鼠窃，自得其风骨者，不亦远乎。然则，学者但当随其量以就所安而已。不必牵强横写，失其天质，亦一要也。唯仆与吾子虽未尝读其文，往往句法已略相似矣。岂非得于其中者暗与之合邪？近有数篇，颇为具体，今寄去，幸观之以赐指数，不具。

林椿写这篇文章在公元 1170 年左右（苏轼死后约 70 年顷），高丽文人不但闻苏轼之声华，而且很普遍地能看到苏轼写的文学作品。他们当中，有人玩赏苏轼之文词，有人模仿苏轼古文的豪放旷达、横截不羁之风骨来作自己的文章，如李仁老（1152~1220），高丽竹林高会的盟主，曾说：“杜门读苏、黄两集。然后语道然，韵铿然，得作诗三昧。”（崔滋《补闲集》）了解古文思潮之优点的林椿，辛辣地攻击浮虚纤靡的科举文的弊端：“近世取士，拘于声律，往往小儿辈咸能取，而宏博之士多见摈抑，故朝野嗟叹。吾恐兹弊已久，不可一旦

矫之。”（林椿《西河集》卷四《与黄甫若水书》）又云：“时所谓场屋之文者，读之，工则工矣，非有所谓甚难者，诚类排忧之说，因自计曰，由是而以为文乎，则虽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同上，《与赵亦乐书》）所以，骈俪之风的科举文，日益失势，而自由奔放的古文，好像燎原的火焰一般，很快掩袭高丽中期武臣时代之文坛。

第二节 高丽中期文坛接受苏轼文学的影响

如上所说，高丽前期文坛，是掌握在文臣的手里。当时好文的国王毅宗与文臣，昼夜饮酒酬唱，沉溺于浓纤浮丽的唯美主义艺术境界。他为了自己和几个词臣的享乐，召集军人和老百姓，盖起了“寿德宫”、“安昌宫”、“太平亭”、“观澜亭”、“怡养亭”、“欢喜台”、“美成台”等华丽无比的宫楼。然后，作池塘和假山，布置各种奇岩怪石，种植琪花瑶草而玩游^[2]。因此，民众受尽饥寒和服役的痛苦，好像奴隶一般。护卫国王和文臣的武臣，不堪忍受穷乏和文臣的贱待，而郁闷愤怒。不但如此，有一个很年轻的文臣金敦中，用蜡烛烧掉了年老的大将军郑仲夫的胡子；文臣韩赖在众人面前打大将军李绍膺的两颊。

文臣对武臣们的这样极端的侮辱行为，终究促发了武臣的叛乱。毅宗二十四年（1170），国王带着文臣去普贤院的时候，将军郑仲夫、李义方、李高等突然举起叛旗而号令说：

大抵带着文冠者，皆打杀！

由于这一次武臣叛乱，韩赖、金敦中等无数文臣的头，被戮于武臣的刀剑之下。武臣们扫荡文臣，废毅宗而拥立了明宗，揭开了那些丧失名分的武臣时代的序幕。

随着文臣时代变成武臣天下，文艺思潮也自然变化了。武臣治下的新进士类，很讨厌以形式为主的场屋文（科文），而喜欢苏轼流畅的豪放不羁的古文。他们为了出仕糊口，在一段期间，不得已学习科举文，而通过科举之后，则无论是谁，都废弃以往学习的科文，而开始学习苏轼的文风。看一看下面的几个事例：

一 刊行苏轼文集

到了高丽中期文坛，当时知识分子都要学习苏轼的文风，因此，苏轼文集乃是必不可缺的课本。

（下转第 79 页）

宋明刚倾情三苏文化

熊朝东

我与宋明刚先生神交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晤面于九十年代。

那时，明刚从部队转业地方，供职于乐山市委组织部。后来他自愿到文联工作，任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成为乐山市文艺界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其业余时间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发表有长篇小说《沉浮》。出版散文集《古道沧桑》、《人在旅途》、《远去的回音》、《在这片土地上》等。参与创作 20 集电视连续剧《大佛凌云》，撰写二十多个电视专题片的文字脚本，有的被制作成光盘发行。10 集电视系列片《话说乐山大佛》荣获 1995 年四川电视二等奖。这些文学创作成果使他成为乐山市较早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一。这期间，我乃眉山县委宣传部一名新闻干事，因常去参加市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工作会议，故能耳闻明刚大名，拜读其文章大作。虽无缘谋面，却已神交，印象深刻。

我们晤面在 1993 年 5 月的一天。

可能是我于 1989 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拙作《苏东坡传奇》，而被明刚所知。于是，他来眉山公干，特意抽时间屈尊寒舍，初次相见，握手言笑，故有老友相见之感。他极具亲和力的豪爽大度，乐于助人，善于鼓人斗志的品质，令我感动至深！二十多年过去，至诚挚友，不管从工作、生活、创作等方面，明刚对我多有教益帮助，难以忘怀！

1997 年 8 月，眉山设立地区，明刚调眉山，任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眉山是三苏故里，这里有着浓厚的三苏文化底蕴，明刚一下就被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深深感染，并倾情于这片土地。其思维灵感、创作激情，情不自禁地转向于探源三苏文化，将笔力伸向描绘三苏功业，以求向世人传递东坡精神的正能量，且一发不可止，成为他在眉山工作、学习、创作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了探源究理，工作之余，明刚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在阅读钻研三苏原著，查阅相关文史资料，深入查考眉山古代风物民情，实地考察三苏父子留存于故乡的遗迹遗址。于是，便有了一篇有份量的论文：《苏轼成才环境初探》。同时，他还利用节假日，自费走出眉山，去全国考察有关苏轼的遗址遗迹，大量收集图文资料，完成创作《天涯芳草——东坡足迹行》，并于 2001 年 7 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也就是在这一年，明刚还精心策划组织，筹备联络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聚会眉山。市委、市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于 8 月，在眉山召开了全国第十三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有 120 人与会，其中海外学者 40 人。著名苏学专家、四川大学教授曾枣庄在闭幕式上评价说：“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苏轼学术研讨会；是老中青三代研究成果卓著的学者与会最齐的一次盛会；是海外学者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可以说，是苏轼学会史上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将对苏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其间，明刚还撰写了大量有关研究三苏的文章。多次参加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并向大会提交论文。2007 年 5 月，明刚参与眉山市政协组织的“东坡足迹万里行”的考察活动，横跨 10 个省，行程万余公里，实地考察与苏轼有关的 16 个城市的遗址、遗迹、遗物 100 多处（件），拍摄了数千张图片，成为完成《千年英雄——苏东坡图传》的主要撰稿人，随后他又在《眉山日报》发表了长篇纪实文学《东坡足迹万里行》。反映了苏轼离开眉山后，在凤翔、杭州、徐州、颍州、扬州、黄州、儋州、惠州等地为官或贬谪之地的政绩、创作、工作生活及传说故事等，受到眉山人好评。

明刚先生倾情于三苏文化，不仅在于个人的研究创作，而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传承弘扬三苏

文化的组织工作上，不遗余力地发现新人、培养新人、激励新人，广泛团结新老苏学研究者与作家，为营造东坡故里的文化氛围，在眉山建区仅9个月时间，在他的直接组织下，成功召开了眉山首届文代会，陆续成立了地区作家协会、诗歌协会、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等文艺协会。同时，创办了《东坡》文艺报与《东坡文学》刊物，著名作家金庸为刊物题词：“拜读东坡文学，想象东坡风采。”著名作家王蒙题词：“在三苏故里办一本东坡文学，我相信定能从苏东坡的作品与事迹中获得灵感、创造新时代的潇洒、妩媚和深情、阔大的文学景象。”为繁荣东坡故里文学创作，搭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平台。紧接着明刚又积极谋划，与四川大学及省外、海外等地的苏学专家相互联系，在市委的支持下，具体策划组织创办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苏轼研究》，成为全国苏学研究领域中一份重要刊物，受到海内外苏学专家的充分肯定与支持，在一定范围产生重要影响，使得眉山的文化景象空前繁荣。1999年9月，明刚将眉山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集结，以《东坡作家书系》的形式出版，一共7本。极大鼓舞了东坡故里文学爱好者的创作激情。到2001年明刚又组织苏学研究者撰写了《三苏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共计12本，200多万字，内容涉及三苏的宦海沉浮、诗词文赋、书画艺术、人生阅历，可谓洋洋大观，影响深远，成为眉山建立地区后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项目，被载入眉山三苏文化研究的史册。这才是明刚先生倾情三苏文化的可贵之处，怎不令人感动至深。这实际上是一个作家、一个苏学研究专家无私的表现。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明刚退休之后，为着力弘扬三苏文化，传承东坡精神，他倾注一腔热情与心血。在2013年初，明刚更有惊人之举，他全方位构建创作长篇系列传记文学《苏轼全传》。这是他多年的夙愿。如今退休了，便有充裕时间来完成了。这可是一项令人振奋的文化大工程，是苏学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的一大创举，无疑具有划时代的历史、现实意义。这一创意得到原眉山市委书记李吉荣、副书记卓明安的充分肯定与全力支持，并由二位老书记牵头，亲自主持多次召开省内外有关苏学专家和作家参加的创作座谈会，为了吸取多方意见，明刚还到四川大学请几位苏学专家喝茶，请求指导。对眉山老作家他便登门拜访，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很快便拿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还写出了

《关于苏轼全传的写作问题》一文，在作者座谈会上专题谈了全传写作问题。并于2014年初夏，正式确定14位苏学研究者与作家（包括省外），分别担纲《苏轼全传》14卷本的撰稿。全传以苏轼宦游足迹为基点，全方位展示苏轼伟大的人生阅历。两年多来，明刚还做了大量的与作者协调联络工作，专门注册了QQ，对作者报来的写作提纲，编委会专题研究，了解进度，发现不足，并形成了“纪要”，发给作者。还将提纲编成简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作者，互通信息。逢年过节，还有给作者发短信或春节慰问信，始终与作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沟通，受到作者好评。苏轼全传预计2016年初出版发行。目前，创作已近尾声。

每当我看到明刚不辞辛劳，充满年轻人般的火热激情，奔走于创作者之间，总是劝他不要太操劳，这把年纪了，要注意身体。可他总是一笑了之。没办法，谁叫命运把他引领到了眉山这块孕奇蓄秀之地，而与三苏结缘呢！正如他自己所说：“东坡故里，是一片神奇而又让我钟爱的土地。我愿为它歌唱，愿为它奉献！”

二〇一五年五月一日

（熊朝东，眉山市东坡区新闻中心原总编、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清明凭吊苏洵墓

刘清泉

乙未清明，我们约请了眉山的几位学者前往苏坟山凭吊苏洵墓。

上午 10: 00，我们从旭光小区东门开车出发。过岷江二桥、上岷东大道，不久就见到苏洵墓的交通标志。我们的轿车便开上了七弯八拐的水泥机耕道，只有一个车道，若遇会车，就须十分小心。以往，我曾多次带外地客人前往苏洵墓凭吊、参观，很少遇到会车的时候，然而今天却遇到两次。

过了塘坎，进入松树林，就是所谓的“短松冈”了，道路从墓园后边绕到右边，在松树林里有一个停车场，那儿已经停放了五六辆轿车。

我们停车下山，步行从墓园右侧绕到前方上山进入墓园。路上遇三三两两的青年学生来此凭吊。过机耕道塘坎左转，塘边、山边种满了柑橘，橘花挂满树枝，橘香沁人心脾。从这里，可以远观苏坟山整体，它就像一把太师椅，山上树木葱茏，山下一汪水塘。其实，在未修我们刚才走过机耕道前，山沟里是没有水的。那条机耕道似一道堤坝将山沟筑断，因而形成了现在的水塘或曰水库。这虽然破坏了柳沟山的地貌，但此处也算有山有水，山清水秀了。顺着这个山沟下去，不远就是岷江。

下去，走过水塘边的那根田坎，通向苏洵墓的山坡上有一道长长的石梯，有石碑上刻曰“回音梯”。若在石梯上顿足，尤其在上半段，可听见明显的金属声回音，仿佛下面有空洞似的，很是让人称奇。据说，石梯下面有一条暗道，通往苏洵墓。墓室仿苏洵生前书房而建，室内储藏了七十二缸清油，常年点着油灯，照着苏洵读书。

回音梯上边有一牌坊，四柱三门，上下两层，飞檐翘角。牌坊正面，主门上有横批“景行行止”。记得前年 11 月，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几位学者来访，来到此处，管仁福教授说：“‘景行行止’

很容易读错音：第二字读 háng，‘道路’之意；第三字读 xíng，‘行走’之意。”我说：“《诗经·小雅》有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思是仰望高山，行走大道。‘景行’的本义就是太阳照耀下的大道，引申为光明的大道。”“‘景行行止’一般解释为：大道可供人们行走。”里柱对联为作家兼学者赖正和先生撰写并篆书：“诗如山文如水古今何人匹，气似虹节似玉中外谁个同。”外柱对联为作家徐康先生撰联：“百代文章惊广宇，四时香火慰寒泉。”牌坊背面，主门上有横批“自洁自好”。里柱对联为作家刘川眉先生撰联：“老泉安澜井，千纪不泯，托体同山阿；东坡断肠处，万载常青，追思共渊回。”外柱对联为：“一门三父子，千古两贤人。”

刚过牌坊，可见坟墓四周绿树成荫，其中参天耸立的樟树尤为引人注目。我们一行每人握一枝白色菊花，虔诚地向苏洵、程夫人墓走过去。待走到墓前，大家又排成一横排，在张忠全先生指挥下三鞠躬，然后依次将菊花放置到苏洵墓前。仪式结束后我说：“前两年带台湾学者江澄格来此凭吊，他问我，苏洵与程夫人合葬，为何墓碑上只有‘宋赠太子太师苏老泉之墓’呢？这是否是眉山本地的习俗呢？我无言以对。”张忠全先生说：“新刻的墓碑上有程夫人之名位，后来换成嘉庆年间的老碑，这上边却没有程夫人的名位。我也不知是何原因。”

我们拾阶而上，来到王弗墓、苏轼衣冠冢、苏辙衣冠冢凭吊。这三座墓在苏洵墓背后台阶上。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曰：“（王弗）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我感慨地说：“苏轼《江城子》乃千古第一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不知引发了多少人的共鸣啊！”赖正和说：“许多学者到眉山，都想来此领略一下‘明月夜，短松冈’的意境呢。”

站在台阶上，可见此地乃风水宝地。左右山梁若太师椅的扶手，而苏洵墓则在椅座之上，对面的浅山又可踏足。四周山上，松树亭亭，柑橘株株。

接下来，我们又去参观老翁泉。苏洵《老翁井铭》和《老翁井》均以安葬程夫人山丘之下老翁泉为题材，与之相关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往岁十年，山空月明，天地开霁，则常有老人苍颜白发，偃息于泉上，就之则隐，而入于泉，莫可见。”意思是很久很久以前，在山丘空寂、雨过天晴、风清月明的时候，远望泉井，就常常看见一位白发老翁，偃息（仰卧休息）于泉井之上，可走近看时，老翁即隐没于泉井之中不见了。山脚下的老翁泉声名远播，故把此山名之曰：老翁山。老翁山之名始见于苏轼《送贾讷倅眉二首》（其二）“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因老翁泉之故，这里成为苏洵、程夫人墓穴的首选，可是这里却与修文乡苏家祖茔相距甚远。因筑堤坝，此山沟积水为塘，因此重修老翁井时将井台提高至水面以上，设栈桥以通往水塘中央老翁井，靠塘边栈桥处筑一亭曰老翁亭。

站在老翁井畔，向停车场望去，只见塘边有游人垂钓，据说，那儿的人家，为游客提供炊具、柴火、作料、大米等，自炊而食，费用随喜。返回牌坊前那儿的坝子，见边上有几个人摆起小食摊子。我还以为是本地村民，一问才知是从眉山近邻夹江县远道而来的。问她：有生意吗？答曰：当然有，昨天我们的生意还蛮不错的。

返回路上，又遇会车，他们都是来此凭吊苏洵墓的，看来改善此处的交通，是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2007年6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苏洵家族墓地”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们来此凭吊、览胜、休闲，与新建公园相比，不是更有意义吗？

（刘清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上接第75页）然而，从中国买来的原书很少，手写本也有限，无法充分满足那么多读者的要求。高丽第一部新雕的宋人别集，就是李奎报门人崔君址刻的《东坡文集》，李奎报《全州牧新雕东坡文集跋尾》（《东国李相国集》卷二一）云：

夫文集之行于世，亦各一时所尚而已，然今古已来，未若东坡之盛行，尤为人所嗜者也。岂以属辞富赡，用事恢博，滋液之及人也，周而不匱故歟。自士大夫至于新进后学，未尝斯

须离其手，咀嚼余芳者皆是。其摹本旧在尚州，不幸为虏兵（指蒙古兵）所焚灭，了无孑遗矣。完山守礼部郎中君址，好学乐善，君子人也，闻之慨然，方有重刻之志。时胡骑倏来倏往，间不容发，州郡骚然，略无宁岁，则似未若于文事。而太守以为古之人尚有临戎雅歌、投戈讲艺者，文之不可废如此。以是邑之大也，这一段么么事，咄嗟可办，而若以彼区区戎丑之故，将姑息以俟太平，庸讵知后之来者，又因循姑息，便不成吾志耶。遂直断闻于上，上亦好文，欣然允可，于是当虏之未来，间农之未作，使之雕镂，不日乃毕，费不烦而力有余矣。非夫干事贞固，绰有余裕者，熟于此诗，成大事如此其敏耶？其为政之大体，亦可知已。君子予为门人，故托以标识，予亦嘉君之以他邑之亡书以为私忧，移之其邑，汲汲于补益学子，是以粗书本末以跋其尾云。时龙集柔兆卅滩辛月日，金紫光禄大夫参知政事修文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判户部事太子太保臣李奎报书。

李奎报（1268~1241），号白云居士，或云三酷好先生，高丽中朝武臣治下的最大文人，体现苏轼一类的词章性的古文体，做了无数的诗文，官至门下侍郎平章事，著有《东国李相国集》。看他所写的东坡文集跋文，则当士大夫和新进士流都认为苏东坡诗文不仅是“属辞富赡，用事恢博”的，并且是“滋液之及人也，周而不匱”。可是，散在全国各地的苏东坡文集，累被蒙古兵火焚烧，已为难得之书。于是，全州牧使崔址，毅然依“临戎雅歌，投戈讲艺”之古训，不管“胡骑倏来倏往，间不容发”的危急状况，而用“虏之未来”，“农之未作”的机会，使工人雕刻了苏东坡文集的木板而印刷颁布于当时的文坛。此书刻于高丽高宗二十三年，即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可惜这一高丽雕刻的初刊本和重刻本苏轼文集，现在已经失传。只是这篇文集跋文，使我们能想像当时苏轼文学对高丽文坛的影响是如何普遍而且切实。

注释

[1] 参考郑麟趾《高丽史·世家》卷一《太祖》条《训要十条》。

[2] 参考郑麟趾《高丽史·世家》卷一四《睿宗》条。

（洪瑀钦，韩国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

台湾李常生眉山寻访记

本刊讯（苏学文）5月11日，祖籍河北沧州、出生江苏常州、成长台湾台北的李常生博士不远千里来到三苏故里——眉山探寻苏轼的足迹。

李博士生于1949年，自幼钟爱于苏轼的诗文词赋，曾从事过公司企划、规划、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工作，担任过公司董事长。先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设计学院任教，已获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城市规划学博士学位，在读南京师范大学北宋史和苏轼史博士学位，现专注于北宋史、苏轼史研究工作。

为了搜集18个苏轼遗址遗迹地有关资料，并计划在20年后完成最真实的《苏东坡传》的创作、出版，李常生博士从2008年至今已花六年的时间追寻着苏轼的行踪，以编年的方式，以作品为依据，绘制出各地苏轼行迹地图，标注宋代城郭与现代地图的位置。有一些地方他已去过五次以上，这次是李博士时隔5年后第二次来到眉山。

5月11日晚，李博士晚饭后随即前往东坡湖畔、湿地公园、远景楼和古纱縠行。5月12日，参观了三苏祠，访问了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然后去蟆颐观和苏坟山寻踪。午餐后，驱车青神中岩寺，远眺岷江对面苏轼岳丈家王家大院和瑞草桥。返回路上参观了东坡区松江镇华藏寺，然后去三苏乡初级中学考察拨股祠（庙）遗址，最后去找寻据说有苏家“自留地”的三峰山。快到6点半的时候，才赶回城里。

眉山苏氏宗亲联谊会苏喜亮副会长和苏文军宗亲邀约了张忠全、方永江、刘清泉几位苏学专家共进晚餐，并相互交流、探讨。大家对李博士不顾疾病缠身，6年来自费近百万元亲自寻访东坡足迹的执着精神十分敬佩。

第二天傍晚，李博士发来短信告诉我，他上午独自租车去东坡区广济乡连鳌山看了苏轼年轻时（17岁）在那里留下的墨宝“连鳌山”三个大字。

（苏学文，眉山苏氏宗亲联谊会秘书长）

黄冈来眉考察政研结合的“眉山模式”

本刊讯（流水）5月5日，黄冈市考察团一行六人，在黄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雷电带领下，来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学习考察，以借鉴其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精神，挖掘东坡文化内涵，打造东坡文化平台，眉山政研结合的模式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表示将把眉山好的做法和经验带回去。

心香一瓣祭三苏

本报讯（熊莉）清明时节哀思重，三苏坟前祭文宗。4月5日是传统的清明节，我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组织部分苏学专家学者、特约研究员和爱好者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前往苏坟山祭祀三苏，献上一份哀思。他们洒扫墓园除其尘，手捧鲜花，深深鞠躬，默哀良久。

原市政协副主席、著名苏学专家张忠全领诵祭文：“乙未清明，馨香来祭。松枝摇曳，九泉有知，

雨丝柔滑，哀思绵长。文化立市，文脉传承，成就卓异，衷情相告：眉州大道，四门再造，交通文旅，巍峨壮观。湿地公园，水月主题，上善若水，月华为魂。东坡宋城，苏宅核心，景城一体，文渊深植……”他们又清理杂草蔓枝慰其灵，泪眼朦胧不忍离去，场面十分庄严肃穆。

（熊莉，眉山日报社记者）